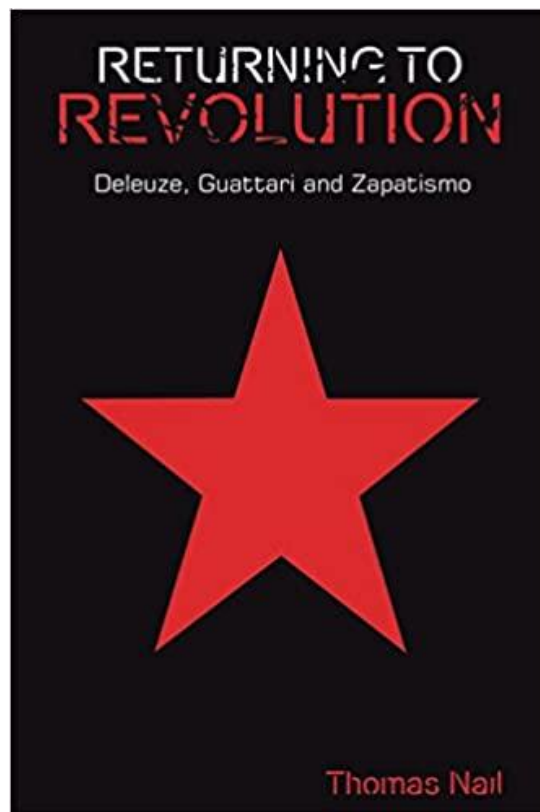


回到革命

德勒兹，瓜塔里与萨帕塔主义

Thomas Nail



2012

目录

致谢	5
文本备注	6
前言	7
导论	10
1. 方法论	11
德勒兹与瓜塔里	11
萨帕塔主义	12
配置, 转换器与贡献	13
2. 干预措施	15
德勒兹、瓜塔里和代表性	16
德勒兹, 瓜塔里与差异	17
德勒兹、瓜塔里与建构主义	20
走向建构主义革命理论	24
萨帕塔主义与代表性政治	25
萨帕塔主义与差异	26
萨帕塔主义与建构主义	28
3. 概论	30
1 政治史与革命实践诊断	33
导论	33
一、革命与世界史	34
连续的革命史	34
偶发事件的世界史	35
二、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拓扑学	36
什么是政治史?	36
历史拓扑学对革命实践的诊断	41

三、萨帕塔主义对痛苦的诊断	51
萨帕塔主义和领土代表性	52
萨帕塔主义和专制国家代表性	53
萨帕塔主义和法律国家代表性	54
萨帕塔主义和资本主义代表性	55
结论	57
2 干预与未来前路	58
引言	58
一、革命与政治干预	59
反对/否定	59
起义与新事物生产的革命条件	59
二、革命的时间	60
未来的前路	60
四种改变或“解辖域化”的概念	65
三、萨帕塔主义的先兆政治	70
相对消极的解辖域化:EZLN, 和平协议和生物剽窃	70
相对积极的解域化: 拉坎东丛林的第一次宣言	71
绝对消极的去领土化: 一场针对墨西哥政府的战争?	72
绝对积极的去领土化: 预兆和 Juntas de Buen Gobierno (善政委员会)	72
结论	74
3 政治团体与过程参与	75
导言	75
一、政治团体	76
代表机构政治	76
反代表性政治团体	77
二、革命的政治团体	78
革命性的抽象机器	79
革命性的实在机械组合	83
革命的政治角色	86
三、萨帕塔主义与参与性政治体的创造	92
革命状况: “萨帕塔, 1994 年”	93
革命的具体实践: 萨帕塔自治市	94

革命政治主体: The Compa	96
结论	97
4 政治亲和力 (Affinity) 与奇点-普遍联合	99
导论	99
一、普遍性政治亲和力	100
公民身份与结域民族国家	100
生物政治和普遍奇点	101
二、团结与奇点-普遍	103
奇点、通用、包容	104
德勒兹, 瓜塔里和游牧团结	105
横向性中继器 (Transversal Relays)	107
三、萨帕塔与 Los Encuentros Intercontinentales (洲际会议)	108
“一个适合许多世界的世界”	108
既不是公民身份也不是差异	109
四种团结	109
The Encuentros (邂逅)	110
总结	114
结论	116
一、方法与解释	116
二、困难和影响	117
三、未来研究方向	119
参考文献	120

致谢

我谨向以下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本书的撰写和编辑过程中提供的反馈和支持：特德·托德文、科林·库普曼、约翰·莱萨克和特雷斯·派尔。多年来，我与许多人就本书中讨论的主题进行了许多精彩而富有成果的讨论；我要特别感谢：Kieran Aarons、Neal Miller、Daniel Bowman、Daniel W. Smith、Sean Parson、Nicolae Morar、Greg Liggett、Greg Liggett 和 Oregon 大学英语系的理论组（尤其是 Tristan Siple, Eric Luttrell, Shane Billings, Josh Magsam 和 Melissa Sexton）。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我也非常感谢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与之合作的所有积极分子和集体，他们致力于直接民主的艰难工作：学生合作协会、卡斯卡迪亚森林保护和没有人是非法的（多伦多）。

接下来的许多章节都是在罗马咖啡馆（CaféRoma）中理论化和创作的，这是一家罕见的咖啡馆，那里没有互联网，只有古典音乐。我非常感谢这个空间。这本书也部分地通过美国富布赖特计划（US Fulbright Program）、多伦多大学和韦恩莫尔斯法律与政治中心的金融和学术支持，这些都为我提供了在这些章节中工作的方法、空间和时间。

我感谢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 Carol Macdonald，感谢她在本书编写的最后阶段给予我的善意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我最好的读者和妻子凯蒂·里德尔，感谢她在本书创作的各个阶段所做的贡献和陪伴。

文本备注

Gilles Deleuze（包括与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和克莱尔·帕内特（Claire Parnet）合著的所有作品的文本引用均按其英文翻译日期列出。然而，他们的页码首先根据原文法文的页码给出，然后再根据译文英文的页码给出。所有其他文内引用均为现存译本，如有此类译本存在。

前言

2011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范围内革命性的一年。在这本书完成后不久，历史上最大的全球占领运动在2011年10月浮出水面。这场占领运动是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在本书章节中所阐述的政治策略的实践和理论继承者。受“阿拉伯之春”启发，威斯康辛州的职业，反对紧缩措施的骚乱在欧洲和英国，希腊和西班牙愤怒的职业在宪法广场，占领运动已经蔓延到八十二个国家的超过2556个城市，和超过600个社区在美国(2011年“一起占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基础是，民众对个人和企业之间日益扩大的财富和权力差距感到愤怒，对政治代表未能解决失业率上升、房屋止赎、学生债务瘫痪以及社会服务资金大幅减少等问题感到愤怒。但是，正如一些理论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占领运动显然不仅仅是对贪婪的银行家和腐败的政客的抗议：它是一场持续的运动，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政治代表制度本身问题的回应(Hardt and Negri 2011; Žižek 2011; 格雷柏 2011)。

占领运动没有提出正式要求清单，也没有游说政党进行体制改革（尽管这样的改革可能不会不受欢迎），而是主要抵制作作为潜在合作的谈判。如果问题仅仅是腐败或贪婪，人们会期望听到改革和立法的统一信息。这一信息可以被政党政治家采纳，并在下次选举中动员起来。占领运动没有提出一套明确统一的要求，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对能够回应这些要求的政治代表形式本身有着更深的的不信任。此外，所选择的干预方法——“非法占领”——也应该表明正常法律渠道的崩溃，这些渠道本应响应人民的意愿。占领运动没有要求代表进行改革，甚至没有试图创建自己的代表或领导人，而是占领了公共空间，试图在协商一致的决策、平等和互助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直接民主形式。在那些不能为其成员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也不能倾听他们要求的社会中，占领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营地决定互相提供这些东西。他们创建了厨房、图书馆、诊所和媒体中心，向所有有需要的人开放。因此，占领运动表明，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当前危机的原因。它不仅表达了一个受欢迎的确认，我们不生活在最好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它也要求我们开始创建一些替代当前的系统现在，而不是等待政治代表或公司来解决他们制造的问题。

占领运动及其策略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正如理论家们已经很好地指出的那样，占领运动中使用的许多策略都起源于全球化运动(克莱因 2011; Hardt and Negri 2011; 格雷柏 2011)。特别是，横向和无领导的网络、协商一致的决策和平等地包括种族、阶级、性别、性和环境问题的多战线斗争是这两个运动的重要方面。但是，全球化变革运动最初是从哪里获得这些战略的呢？它是建立在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文献，在全球化运动和它的一个主要的组织团体之后，人们的全球行动，是最直接从第一次和全球最大反新自由主义聚会：the Intercontinental Encuentros

由萨帕塔主义者举办 (笔记从地方 2003;Khasnabish 2008;Curran 2006; 断 2007)。水平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由萨帕塔主义者在第一次“入世”时提出的;萨帕塔的原住民曾经 (现在仍然) 使用共识决策, 他们的斗争从根本上包括了所有的斗争战线 (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和环境)。考虑到这一明确确立的血统和恰帕斯 (近代历史上较长期的革命“职业”之一) 仍在进行的斗争, 令人惊讶的是,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还没有人明确指出这种联系, 或追踪其对当前斗争的战略影响。

同样, 还没有人深入探讨占领运动的理论起源。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奥·内格里 (Antonio Negri) 很快将占领运动描述为他们自己的“多元形式”概念的一种表达……以频繁的集会和参与性决策结构为特征” (Hardt 和 Negri 2011)。但是哈特和奈格里最初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的呢? 正如占领运动的实践渊源比全球化运动更深, 它的理论渊源也更深。人们已经认识到,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工作对一种新的革命哲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希望, 这种革命哲学可以重振当代政治思想。特别是 Slavoj Žižek 甚至说: “德勒兹越来越成为当今反全球左派的理论基础” (Žižek 2004: 但是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工作之所以成为争论的中心, 主要是因为 Hardt 和 Negri 的政治三部曲《帝国》(2000 年)、《诸众 Multitude》(2004 年) 和《联邦 Commonwealth》(2010 年) 的成功, 这三部曲将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工作作为其主要的哲学标准之一 (2010:172)。哈德和内格里转向德勒兹和瓜塔里, 从哲学角度阐述了集群的独特性如何能在一场持久的革命运动中得以维持。哈特和奈格里的书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畅销的政治哲学著作; 仅《帝国》一本书就卖出了 52,000 多本, 并在出版的第一年被翻译成 10 种语言 (Laffey 2002: 109), 齐泽克则称其为“21 世纪的共产主义宣言”。哈德和内格里对学术界和活动家的影响在会议、选集和期刊文章的数量不断增加, 致力于德勒兹对政治思想的贡献, 以及在学者和学生中对这些想法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但哈特和内格里只对他们承认的德勒兹观点的明确基础作了简短 (尽管数量众多) 的章节和脚注。事实上, 即使在更具学术性的独奏作品中, 人们希望能更持久地接触德勒兹的政治哲学, 哈特和内格里也更愿意通过阅读哲学史上的常见人物斯宾诺莎、尼采和马克思来更间接地接触德勒兹。与此同时, 目前关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学术书籍都没有将他们的革命概念作为中心主题, 也没有任何现有的书籍详细论述德勒兹和瓜塔里与当代革命实践的关系。因此, 这本书提供了第一次学术调查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概念, 处理在哈特和内格里的畅销书。通过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哲学进行详细的调查, 补充了哈特和内格里提供的理论, 这本书填补了一个空白, 并提供了当代革命斗争如占领的核心理论环节。

然而, 尽管全面探索当代革命同时发生和它的起源在德勒兹的理论和实践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这本书的优点之一是, 它是作为一组四个战略工具来进行这样一个当代劳动力。我必须承认, 在这本书的结尾, 我很兴奋地看到德勒兹、Guattari 和萨帕塔主义者在全球占领运动中所取得的战略成果, 以及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概述的革命战略的持续部署。因此这本书的目的是不

仅提供一个主题概念，吉尔·德勒兹和“革命及其萨帕塔主义者的当代革命斗争的关系，但在目前使用的诊断和指导理解当前以回到革命。

导论

我们必须试着思考一下革命的意义。这个术语现在已经被打破了，而且已经被拖到了很多地方，所以有必要回到一个基本的，尽管是基本的定义。一场革命是一种过程的本质，是一种使它不可能回到同一点的变化……重复会改变一些东西，重复会带来不可逆。一个创造历史的过程，将我们带离重复的同样的态度和同样的意义。因此，按照定义，革命是不能被编程的，因为被编程的总是已经在那里了(déjà-là)。革命和历史一样，总会带来惊喜。从本质上讲，它们总是不可预测的。这并不妨碍人们为革命工作，只要人们明白“为革命工作”就是为不可预知的事情工作。Guattari 2008: 258

我们今天正目睹一种新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并没有采取任何传统的形式：夺取国家、政党的政治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或先锋的领导。相反，考虑到这些策略在上个世纪的失败，再加上上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革命战略已经朝着更加异质和非代表性的方向发展。这本书的目的是因此映射一个大纲的新方向上两个主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法国的政治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许多人称之为“第一后现代革命者”，的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 (Burbach 1994, 1996; Carrigan 1995; 黄金 1994, 2001)。

对这一公认的年轻革命方向进行哲学审问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政治生活没有闲暇去等待革命后的哲学追问。如果哲学等到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革命已经来了又走了，它在革命过程本身的形成中是无用的。

因此，我们正处于这种回归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我们需要对革命的实际意义进行哲学上的质疑和澄清，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恰恰是由于这一事实。第二，自世纪之交以来，我们一直从左翼(尤其是改变全球化运动和世界社会论坛)那里听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我们没有听到的是，更积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世界是什么。在可能性的政治哲学之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另一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斯派的作品中找到这个世界的起源。

因此，本书的目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为革命战略提供哲学上的澄清和概述，这些战略既描述了并推进了构建国家资本主义真正替代品的过程；其次，通过关注其历史上三个有影响力和

象征性的人物，他们相互揭示彼此，以及这种更大的革命性回归：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斯塔。第三，更具体地说，本研究提出了四项战略¹，这些战略是这种回归革命的特征：

1. 政治权力的多中心诊断；
2. 政治转型的先兆战略；
3. 创建一个国家的参与性战略；
4. 基于全球共同团结的政治战略。

1. 方法论

德勒兹与瓜塔里

因此，为了发展这四种策略，我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中提取出与当前问题最相关、最具有主题意义的概念：革命。更具体地说，这本书通过四个指导性问题的展开，使我们能够解决当代革命理论和实践中争论的中心问题：历史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革命性的转变？如何才能维持和实施革命性变革的后果？革命如何相互联系，以产生一种新的全球团结？德勒兹和瓜塔里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一次写过几页关于政治革命概念的书。²事实上，本卷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在其作品中集中体现这一概念的长篇作品。因为他们对革命概念的使用是基于主题和问题的，所以我自己的方法论也将遵循：我在这里只关注革命问题。此外，这种方法允许最有效和集中的使用他们的工作，因为它处理一个概念，每一章，并提供了一个哲学平行于萨帕塔主义的政治实践。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不仅在概念上有利于这一努力，而且具有历史意义。1968年5月风暴后，德勒兹和瓜塔里不同于同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他们的作品始终公开地忠于革命的概念。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政治实验失败后，德勒兹和瓜塔里写出了他们最大的政治哲学著作《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一和第二卷（1972年和1980年）。这些年来，他们见证了Alain Badiou所说的“最后的伟大解放叙事：革命的政党国家”

¹ 虽然目前实行权利和物质团结的人也会同意，目前的不平等制度是全球团结的障碍，但不同的是，物质援助团结不会改变捐赠物质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萨帕塔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旨在改变物质生产和分配的条件。他们的政治哲学是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他们实际创建工人合作社和使用民主公平贸易实践具体表达了他们对私有财产、利润和慈善事业的拒绝。尽管他们相对贫困，但他们尽最大努力向古巴和巴勒斯坦等其他国家提供援助。

² 虽然法律本身可能存在结构上的排斥和多样性，但肯定有一定程度的调动这种结合。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担心的那样，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屈服于越来越多地运用这种例外论的诱惑。越是无法将无国籍人视为法人的证据越清楚，警察法令任意统治的范围越广，国家就越难以抵制剥夺所有公民合法地位并以无所不能的方式统治他们的诱惑警察。（Arendt 1979: 290）

(2010a: 101;2010 b: 67)。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一书中，革命被不断地抬高，并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党/工会官僚主义并列，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法国和全世界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日益保守和反动的 70 年代和 80 年代，德勒兹和瓜塔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他们最大的一项工作中，朝着一种不再服从于国家、政党或先锋队主义的政治哲学方向努力。如果我们想寻找当代革命序列的一些最早的哲学起源，就在这黑暗但富饶的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德勒兹和瓜塔里，也许比当时的任何主要哲学家都更多产，更有影响力，创造了与无领导和网络化的水平主义最一致的政治概念，这是当今革命回归的特征，在萨帕特莫、全球化运动和占领运动中都得到了体现 (克莱因 2011)。³甚至连齐泽克也承认，“德勒兹”越来越成为当今反全球左派的理论基础 (2004:xi)。但也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另一场革命正在兴起，不是在法国，而是在墨西哥东南部的山区：这场革命将越来越成为“改变全球的左派”的实际基础。

是的，德勒兹和瓜塔里从未写过关于政治革命的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广泛而始终如一地写关于革命的东西。如果本书采用了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哲学中的异类碎片拼合在一起创造概念的方法，那么这不仅是出于方法论上的紧密联系，也是出于这样做的实际需要。如果这本书选择从德勒兹和瓜塔里而不是从这个时期的其他政治哲学家那里提取这些概念，因为德勒兹和“官 (除了他们独特的影响改变全球左) 从未放弃他们的信仰，一个世界性的革命可能出现从最小的政治实验没有国家的代表，党，先锋或适当的阶级意识，事实上它确实与萨帕塔主义者。

萨帕塔主义

但是，如果德勒兹和瓜塔里很好地将这一新生的革命序列理论化了，为什么还要从萨帕塔斯派中提取任何东西来概括这四种策略呢？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我所说的最近的回归革命⁴，可以与通常被称为“改变全球化运动” (AGM) 的普遍兴起有一定的联系。在年度股东大会和人民这样的组织全球行动 (PGA) 和世界社会论坛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革命性的序列，序列本身并不是简化为这些群体的特点，部分原因是这些元集群由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子组。无论如何，1999 年的年度股东大会并非始于西雅图。大多数关于年度股东大会的历史研究都把它追溯到 1994 年，也就是萨帕塔起义的开始 (《无处》，2003 年;Khasnabish 2008;Curran 2006; 断 2007)。Zapatismo 和 the Intercontinental Encuentros 是第一个和最大的全球反新自由主义集会，并产生了几十个重要的团体，如 PGA (Khasnabish 2008: 238; 奥尔森 2005)。尽管他们显然不是唯一的灵感来源，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萨帕塔人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他们从战略上拒绝夺取国家或政党权力，他们创建了直接民主的基于共识的社区，他们关于全球

³ 即内在性平面；一台抽象机器。

⁴ 虽然该州当然可以修改法律，废除奴隶制，给予妇女和非土地所有者选举权等等，但它无法容忍自治。它必须排除所有寻求政治自我管理的人。

互助网络的愿景都非常明显，并对当今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持久的影响（Khasnabish, 2008 年）。因此，理解萨帕塔主义在理解今天正在进行的更大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⁵

但是，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新的革命序列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观点⁶，尽管关于一种新的革命序列的出现已经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经验主义的论点（而且是以比我在这里所能给出的更为完整的方式）。⁷因此，我衷心感谢这些作品；它们就像这部哲学著作的经验伴侣相反。⁸我想说的是，除了叙述过去十五年斗争的历史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创造一套新颖而连贯的战略（实践的和理论的）来定义这种新的革命序列的出现。但由于具体定位这些策略在甚至最活跃的组织 lastfifteen 年超出了目前的工作的范围，我想专注于两个最早的深入分析，最有影响力和最多产的来源，这个常常被实施的革命”：和萨帕塔主义者与德勒兹和瓜塔里。

因此，我试图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著作以及萨帕塔斯主义者的行为中提取出这些策略，并给予同等的质量重要性（尽管不可否认的是，我在本书中花了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我希望在 Zapatismo 的例子中证明，它有自己的思想，不需要哲学来为它思考或代表它的思想（Lazarus 1996；巴迪欧 2005；福柯 1977）。相反，萨帕塔斯提供的是其他活动家和哲学家所没有的，这是一个特别多产和概念上有创造力的地方，在这个新的和仍在进行中的革命序列的开始。许多人甚至称萨帕提莫为第一次“后共产主义”、“后现代”（黄金 1994）和“后代表”革命（托梅 2006；Proyect 2003）。因此，本书旨在提供一些新颖的哲学澄清，不是为萨帕塔派本身，而是为那些希望理解和继续萨帕塔派斗争的其他人。但是，由于这些实践只出现在 15 年来各种各样的著作和政治行动中，而从未出现在一个连贯的自我描述的宣言中，这种提取和创造性重组的方法对萨帕塔斯特派来说也是必要的。

配置，转换器与贡献

但是，如果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斯主义有共同之处的话，他们是我和他人哲学发展的早期和有影响力的概念来源（格雷伯 2002；Grubacic 和 Graeber, 2004）称之为现在的革命序列，他们在哲学作品中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方法论上基于通过提取和重组的概念创造？首先，我当然不想主张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斯派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影响。尽管这更多的是一个历史/经验主义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它也是极不可能的（也不值得尝试去描绘它们的分离程度）。据我所知，德勒兹和瓜塔里并不知道萨帕塔派起义的早期阶段（1994 年之前），萨帕塔派也不太可能在 1994 年之前阅读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作品。第二，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使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来解释，透析或理解萨帕塔主义者，正如一些学者所做的

⁵ “基于与原则的接近或距离程度的等级制度”（德勒兹 1994:60/37）。

⁶ 非表征民主或直接民主的主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融贯性不是来自于条件的统一（代表主体的愿望），而是来自于根本不代表主体的事件的集体变异。相反，它表达了一种集体主体性。

⁷ 见本书导言。

⁸ Encuentro 的包容性和平等主义预设立即将其与可能具有相似结构但基于领土种族、民族、性别、性别等先验歧视的种族主义或歧视性组织区分开来。

那样 (Evans 2010)⁹。就像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萨帕塔主义起义来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辩护一样。这种方法不仅预先假定了一种理论高于实践或实践高于理论的特权基础主义,而且还可能使欧洲中心主义和理论帝国主义的长期遗产永久化 (Spivak 2010)。第三,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在德勒兹和瓜塔里或萨帕塔斯派中发现所有政治生活或“政治”的哲学基础,部分是因为这个任务在概念上是极权主义的,但也部分是因为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而且只向我们揭示了政治存在本身的无根据和反基础的特征 (Lacoue-Labarthe 和 Nancy 1997)。因此,这本书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计划,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争论的政治反基础主义的观点。

相反,这本书建议把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斯派作为同样策略的平行起源来解读,这些策略现在已经成为 21 世纪革命和激进左翼运动的核心。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本书中概述的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蒂斯莫共同的四种策略并不是所有政治行动的典范。相反,它们只是四种(可能还有其他几种)过渡工具,在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中,这些工具已经并且很可能被运用到其他地方。我的论文并没有发现连接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斯的四个基本策略,也没有发现革命策略的四个基础。相反,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从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 (zapatista) 的著作中找到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四种最具历史和理论影响力的革命战略的起源。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 在世界上两个不同的地区 (法国和墨西哥) 和两个不同的领域 (政治和哲学) 制定了这四项共同战略,彼此之间没有直接影响。¹⁰两者都不是由对方建立的,也不是由对方派生而来的,但相互理解后,我们对两者都有了更好的认识。此外,这四种常见的策略也有助于理解当代运动,如西班牙的 indignados 运动或全球的占领运动 (the global Occupy movement),因为这些策略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四种策略以及萨帕塔和全球运动的遗产。

通过阅读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斯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理论行为在哪些方面是不明确的、薄弱的或过于笼统的,而实践行为在哪些方面将阐明、加强或指明如何将理论带向一个新的方向,反之亦然。当一个人碰到一堵墙,另一个人可能会突破,不是作为另一个人的替代品,而是作为两个异质行动的中继或集合:理论和实践 (福柯 1977:207)。德勒兹、瓜塔里和福柯曾使用过这种通过提取和重组有用的实践-理论体系来研究政治哲学的方法,我在本书中也沿用了这种方法。因此,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哲学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指向创造“适合于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概念。它必须将那些正在其他地方、其他领域或正在准备中的革命作为自己的革命”(德勒兹 2004:191/138; 又见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4:96/100)。因此,本书就把当前的革命作为自己的准备。

但这种采用和充分不是一种表现或相似的问题。知识分子并不是简单地站在革命斗争的前线,站在革命斗争的一边作为其代表 (福柯 1977:208)。无论理论应该指导实践,还是实践应该

⁹ 通过如此笼统地定义人性和新自由主义, Encuentro 不仅迫使当前世界和正在形成的新世界之间的当代局势分裂,它还如此笼统地定义了这个新世界,以致于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其中。明确地说,积极的普遍性不是由它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对或否定来定义的,而是由人权和萨帕提主义本身的建设性通用性来定义的。

¹⁰ 'Preguntando caminamos [Asking, we walk].'

指导理论，在每种情况下，它们的关系通常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总和 (1977:206)。与此相反，发展实践-理论中继的政治哲学的目标，不是要把其中一个放在另一个的基础上，也不是要更准确地描述或解释世界，而是要同时运用理论和实践来改造世界本身。

理论不导致实践，实践也不导致理论：两者都是构成革命战略本身的异质成分。因此，对革命运动的政治分析从来不是代表、解释或“为他人说话”的问题。相反，正如 Guattari 所说，“问题在于确定它们的轨迹，看看它们是否能够作为新的参考宇宙的指示器，从而获得足够的一致性，从而带来彻底的变化” (2008:328)。但是，正如 Guattari 继续说的那样，因为“没有一个通用的科学模型可以用来理解一种情况……”“在情况之前就知道”，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发展新的概念，以帮助阐明情况，而不是代表它 (2008:343,397)。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实践与理论结合 (我称之为“策略”) 的目的：提炼出四种常见的策略，这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当前的革命形势。

因此，如 Guattari 所言，如果所有政治生活都没有普遍的基础或范畴，那么政治哲学的目标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如果领导和批判的角色永远被政治基础的问题所束缚，那么参与政治哲学家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像其他人一样介入政治斗争，并对政治斗争作出内在的贡献。或者正如马科斯 (Marcos) 副指挥官所说，我们必须诚实，告诉人们我们不是来领导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的。我们是为了释放一个可以释放其他人的需求而来的 (Marcos 2001c)。或者，正如福柯在谈到他自己的哲学干预时所说，

所以，因为必须有一个必要的，我希望我们尝试的一个基础理论分析是很简单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你想挣扎，这里有一些要点，以下是一些力线，这里有一些收缩和堵塞。换句话说，我希望这些命令不超过战术指针。当然，这取决于我和那些在同一方向上工作的人，知道我们需要在哪些领域获得真正的力量，以便进行有效的战术分析。但这毕竟是斗争与真理的循环，确切地说，是哲学实践的循环。(2007: 3)

总而言之，除了上述三个目标之外，本卷的目标，遵循马科斯、马克思和福柯，不是解释世界，而是通过概述一些可能释放其他东西的革命策略来改变世界。因此，这本书成功的最终标准不是它简单地描述了世界，而是它将对那些从事当前改变世界的革命任务的人有用。

2. 干预措施

一般方法论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在这本书中关于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斯的工作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哲学干预？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阅读，背景和假设下，我建议借鉴这些政治思想家？在下一节中，我提出两种干预，一种是关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学术文献，另一种是关于萨帕塔主义起义的政治评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的结论是相似的：拒绝将它们解读为政治代表性理论或政治分化理论。相反，我建议将其解读为政治建构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说，将其解读为对创造一个新的集体政治体的贡献。我首先研究德勒兹和瓜塔里。

德勒兹、瓜塔里和代表性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过去 15 年反资本主义活动的增加，最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种关注下，革命的概念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保罗·巴顿甚至说，革命的解辖域化是他们整个政治哲学基础上的规范概念 (2000:10)¹¹在他的《德勒兹与瓜塔里: 欲望政治导论 (Deleuze and Guattar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Desire)》一书中, Philip Goodchild 将他们“对社会内在转型的关注 (革命欲望) 定位为他们政治哲学的唯一目的” (1996: 但是, 在这个共同的利益范围内, 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革命概念至少有两种有充分论证的解读。

一方面,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概念被解读为边缘化或未成年人逐渐被自由民主国家所包含和代表的过程。我们可以在英语学者保罗·巴顿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1968 年的翻译家, 《德勒兹与政治》 (Deleuze and the Political, 2000 年) 以及法语学者菲利普·门格 (Philippe Mengue, 2003 年《德勒兹与民主问题》 (Deleuze et la Problem de la démocratie, 2003 年) 的著作中看到这种解读。门格认为, 革命作为政治目标的真正目标, 应该被视为一个在民主国家下进行调解和代表的过程。孟格认为, 非调停、非代表性政治不仅具有高度的投机性, 而且实际上是不可能和不可取的。因此, 在孟格看来, 德勒兹最终是一位反民主的思想家:

微观政治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而是它拒绝一切调解和代表。它假装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暂且不谈这种论点在理论上或推测上的有效性问题——经验表明, 这种拒绝是绝对不可能的, 甚至是不可取的。事实上, 政治是与调解和代表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内在性的惰性 (doxic) 平面保证了这一点……舆论是政治的核心。
(2009: 172)

然而, 保罗·巴顿强调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其后期作品中发现的“生成—民主”的概念, 并认为, 尽管他们缺乏规范的政治立场, 但他们的政治哲学中隐含着自由民主原则。尽管德勒兹和瓜塔里经常批评现代国家民主, 巴顿认为《什么是哲学?》代表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政治思想的一个新转折” (2008:178)。具体来说, 它的规范性转向有利于现代自由民主的制度、权利和价值观。

虽然这一立场可能不是德勒兹和 Guattari 革命概念的主流解读, 但这一立场的作者肯定对这一概念的健康辩论做出了贡献。尽管我在许多其他领域都同意这些作者的观点, 但我发现这种观点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有点奇怪的是, 就像 Mengue 暗示的那样, 直接民主 (非代表性的、非调解的民主) 的历史实践是纯粹的推测。关于巴黎公社、西班牙内战、巴西无地农民运

¹¹ 爱德华多·佩列杰罗 (Eduardo Pellejero) 也认为,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工作可能具有政治上的一致性。他说, “要使这种新的 (革命性的) 感觉得到肯定, 就必须创造适当的组合。毕竟, 这一创造是赋予这一新的军事实践一致性的任务” (Pellejero 2010:107)。

动等历史的无数卷书 (更不用说萨帕塔主义者等许多土著民族的历史) 都证明了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非思辨性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有意义的区别, 但 Patton 和 Mengue 都没有提到。其次, 如果这些事件真的发生过, 就像 Mengue 所说的那样, 它们不可能只是推测。断言这些实验已经尝试过, 并且失败了, 这似乎已经表明, 有些人确实觉得它们足够令人向往, 可以开始它们, 也许会为它们而死。第三, 决定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可取的, 正是革命的目标。我觉得关闭这种可能性在政治上是可疑的。自由主义国家赢得了某种历史斗争, 这是许多政治哲学家的假设, 但这一残酷的事实与另一种更包容、更可取的政治组织形式可能出现毫无关系。最后, 鉴于德勒兹和瓜塔里对国家代表和调解的明确和一贯的批评, 人们不得不否认他们太多的政治工作和对国家民主的明确谴责, 以便使他们成为自由民主人士。此外, 这一举动剥夺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对政治哲学史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 一种非基础性的革命理论 (没有国家、政党、先锋队或代表性)。

德勒兹, 瓜塔里与差异

另一方面,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概念更常被解读为纯粹的政治演变过程, 不被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和调解 (领土、国家和首都) 所捕获。我们可以在美国和意大利哲学家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帝国》, 2000; 《诸众: 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 2004 年; 以及美国学者尤金·霍兰德 (Eugene Holland), 《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 精神分裂症分析导论》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 1999) 的著作。不像门格和巴顿所做的那样, 通过不可避免地将革命纳入自由的国家机器来定义革命的目标, 哈特和内格里从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借鉴了一种关于革命潜力或“差异性”的理论, 他们称之为“诸众”。而不是将革命行动建立在领土, 上帝, 国王, 政治家或首都等最初假定的政治团体的类比, 反对, 相似或代表上, 哈特和内格里提出了德勒兹式的政治创造力理论, 该理论在本质性上先于任何构成的或调解的权力, 无论是国家、人民还是资本。根据哈特和内格里的观点,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概念不应该被解读为一种可能性理论, 它被定义为主要被理解为“可能”或“可行” (如 Mengue 所说) 的理论, 而应该被解读为一种纯粹的“成为另一个人”的可能性。

在哈特和奈格里对斯宾诺莎-德勒兹政治本体论的版本中, “诸众”的概念, 不是作为全球少数主义运动 (代表他们) 的一种新的代表形式, 也不是“反对代表”的一种消极运动, 而是作为一种表达的潜力, 所有这些被主体化的群体都必须“反抗”, “创造新的东西”。但由于这种潜力既不是一个政治目标, 也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 而是一种纯粹的“革命”, 它允许在政治领域中出现新的条件、因素和机构的可能性, 哈特和内格里能够避免仅仅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理论发生在代表政治领域的限制。因此, 正如他们在其著作《帝国》(2000:11-23) 中所声称的那样, “维持帝国的大众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建一个反帝国, 一个全球流动和交换的替代政治组织。”哈特和内格里认为, 这种潜在的反帝国的例子是改变全球化运动 (2010:368)

和难民和移民的游牧，他们在今天的政治中仍然没有代表。它们自身的转变是“政治”的真正领域，永远向所有可能参与非排他性社区的人开放。

类似地，对于尤金·霍兰德来说，“具有革命性潜力的不是实体，而是过程”（2006:100）。因此，“精神分裂症是革命的潜力，而不是革命本身”（2006:100）。与世界上任何特定的存在或实体相对，内在的革命层面，按照 Holland 的观点，是“永久革命中的自由原则”（2006:123）。

现在，我当然认为这种解读更忠实于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革命理论的反代表性维度，我也想避免这种解读中的一些危险，正如最近的批判性学术所提出的。这些危险值得在这里详细叙述。自 1997 年以来，已有三本长篇著作致力于这一批判：阿兰·巴迪欧的《德勒兹：存在的喧嚣》（1997 年，2000 年翻译）；Slavoj Žižek 的《无身体的器官》（2004 年）；彼得·霍尔沃德的《走出这个世界：德勒兹与创造哲学》（2006）。从这些作品和其他几篇评论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批评，虽然对德勒兹（和 Guattari）可能并不公平，但确实概述了他们的哲学构成的几种危险：政治矛盾、虚拟的等级制度和主体无力。

(1) 政治矛盾

正如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75/53）中所说的，“肯定永久革命状态中的差异”，或者肯定“变革本身”是一种新的革命承诺，它逃避了先锋队主义和党国主义的先前问题，从而造成了变得矛盾的危险。¹²这样的转换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是非具象空间的自由，或者它可能提供一个‘破裂’开放”域的新话语权利和国家军事占领的，或者它可能只是复制一个同谋过程所需的旧资本主义的解域与新资本主义再辖域。齐泽克则经常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归因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2004:184）¹³但是，这样说，肯定转变的可能性就是肯定一种“纯粹意识形态的激进性”，这种激进性“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它的对立面”：一旦民主和话语的大规模节日结束，现代主义恢复工人和老板之间的秩序，就像巴迪欧和 Balmès 所做的那样，将会夸大问题（巴迪欧和 Balmès 1976: 83）。

更恰当的说法是，用保罗·维尔诺的话说，“诸众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它可以产生一种东西，但也可以产生另一种：矛盾”（维尔诺 2003:131）。因此，这种矛盾心理作为一种政治承诺的肯定，以及它在哈特、内格里和德勒兹的工作中所假设的“政治本体论的乐观主义和不认错活力主义”，根据布鲁诺·博斯蒂尔斯的说法，仍然是根本不足的（2004:95）。尽管诸众的纯粹创造力可能是全球从帝国解放出来的条件，但它也是帝国的再生产条件。波斯提尔斯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一致性来组织或激励任何特定的政治变革，这种“活力乐观主义”充其量只能

¹² “在物理学中，Ilya Prigogine 谈到了一些状态，在这些状态中，最细微的差异会持续存在，而不是相互抵消，在这些状态中，独立的现象会相互共振”（Deleuze 2006: 215/233）。

¹³ 偶然整体论认为社会世界是由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的实践构成的（虽然不是每个实践都与其他实践交叉），这些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形成了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参数，但是，这并没有提供一个基础，使我们能够彻底地或毫无疑问地了解这个世界。（1997 年 5 月 34 日）虽然任何人都可以参与革命事件，但肯定会有当地的表现和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解释，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萨帕提莫的例子。

保持政治矛盾、投机和自发的状态。展示政治的非基础或无根据的本质，对于有组织的政治而言，并不比欲望的创造潜力更有贡献。Bosteels 建议，“受试者的干预”不能仅仅表现出或认识到整个局势所围绕的创伤性不可能、空虚或对立”（2004:104），而是在巴迪欧之后，“为了进行干预，必须有一个政治组织作为赌注，使从中断到理想的轨迹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就是政治的一致性”（巴迪欧 1985:12）。

（2）虚拟等级制

除了第一种危险，即政治矛盾的问题之外，巴迪欧和霍尔沃德认为，德勒兹的革命概念还面临着第二种危险，即创造一种潜在的政治等级制度。在《德勒兹：存在的喧嚣》一书中，Badiou 详细论述了

与所有平等主义或“社群主义”规范相反的，德勒兹的思想概念是深刻的贵族式的。思想只存在于分层的空间中。这是因为，个体要达到被前个体的决定所控制的程度，并因此被“大一（the One-All）”的力量所控制——从一开始，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局部结构——他们必须超越自己的极限，忍受跨文化的挑战他们的现实被无限的虚拟所固定和分解，这是现实的真实存在。而个人并没有同样的能力。无可否认，存在本身是中立的，平等的，在一切评价之外的…但是“事物在这个平等的存在中是不平等的”（德勒兹 1994:60/37）。因此，根据“从权力的角度考虑事物和存在的等级制度”（德勒兹 1994:60/37）来思考是必要的。（巴迪欧 1999:12 - 13）

这一论点的政治要旨在于，如果我们把革命性的变化理解为实质的或潜在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支持或反对某些预先存在的权力，那么，与任何一种平等主义相反，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存在的等级制度，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种程度的纯粹的潜在转变。现实的政治人物越是放弃他们的具体和局部决定，并肯定他们参与到更大的差异过程中，他们就变得越强大。因此，如果审查任何地方政治干预的目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表明它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具体的决定，并可能“生成-与众不同”（作为虚拟性或潜在性），那么在这种潜在关系中似乎存在等级风险。

类似地，彼得·哈尔沃德（Peter Hallward）认为德勒兹的政治哲学“对这个世界的政治漠不关心”（2006:162）。Hallward 声称，“一旦社会场域的定义与其说是由冲突和矛盾，不如说是由贯穿其中的逃逸线”（2006:62 n16），任何独特的政治行动空间都只能包含在创造、生活和潜在变革的更一般的动态中。由于这些动态本身是反辩证的，如果不是反关系的话，德勒兹的哲学中几乎没有冲突和团结关系的空间（2006:162）。如果每个具体的、局部的，实际政治只是因为其实际被减去的情况在一个虚拟的事件，和每一个致命的事件在一个单一的事件（德勒兹 1990:178/152），绝对的专业’ telos 政治。解域完全不关心这个世界的实际政治（2006:97）。霍尔沃德认为，德勒兹将这种纯粹的变革潜力与所有实际的政治决定相违背，是在肯定一种不

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主义。通过提出这个问题的政治截然二元的战争机器或状态——一种纯粹的姿态,最后,在《启示录》的新人和一个新的地球,否则没有人,没有地球,德勒兹的哲学的政治方面相当于多一点乌托邦分心”(2006:162)。

(3) 主体性瘫痪

对德勒兹和瓜塔里革命概念的不同解读或许能够避免表征主体性的问题:它可以拒绝或肯定特定的欲望,但永远不会改变“欲望的自我”的本质。但它最终还是这样做了,只是冒着将自我扩散为无穷多的非个人驱动力的风险:一个处于永恒转变中的自我。这就导致了第三种危险,主体性瘫痪。首先,将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革命主体性理论解读为“一个人自身存在的简单事实作为可能性或潜能”(Agamben 1993:43)或者,正如保罗·巴顿所说,一个人的“批判的自由”——超越他目前能够做或做的限制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做或做那些事情的自由”(2000:85)——暗示了,正如波斯提尔斯之前的批评所暗示的,一种矛盾心理。它既是解放的能力,也是奴役的潜力。

第二,没有预先给定的主体性统一,多重性代理人如何在不同的政治决定之间进行考虑和区分?如果没有理性的表象屏障,或者政治话语的国家保障基础,争端或协议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像西蒙·托米(Simon Tormey)(2006:146)所说的那样,“生成-他者”并不是被解放的个体拥有的将自己构成自治奇点的能力,而是“自治”本身的定义”,那么政治危险,根据 Hallward,主体只是被更大的、非个人的转化过程所取代:“纯粹的自主性”。对主体性的矛盾和无法被定位的(unlocalisable)过程潜力(作为纯粹的多样性)的激进的肯定,似乎无助于分析参与式民主和集体决策的基本功能,它的核心仍然是今天的许多激进的政治斗争(看到斯塔尔,马丁内斯-托雷斯和罗塞特 2011 年)。当主体性理论仅仅被它的转化潜能所定义时,它被困在一种无尽的潜在变化的瘫痪状态中,不少于主体性的瘫痪。或者,正如霍尔沃德提出的这个批评,德勒兹“放弃了决定性的主体,而支持我们更直接地服从创造性生活或思想的命令”(2006:163)。

德勒兹、瓜塔里与建构主义

虽然这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影响长期争论的政治哲学,特别是他们的革命的概念,仍然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我建议第三个德勒兹和瓜塔里阅读的革命概念不落入危险的前两次的。我称之为“建构主义”阅读,从某种程度上借用了德勒兹和 Guattari 自己的作品。为了解释这种不同的解读,我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我展示了建构主义的概念是如何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作品中出现的;第二,我将这种方法与前两篇阅读区分开来;第三,论证其对本书论题的意义。

1968 年 5 月发生在法国的事件之后,德勒兹和瓜塔里首次尝试创造革命的概念。他们合作的第一本书是《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L'AntiOedipe(反俄狄浦斯)》(1972),作

为一个精神分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为了发展一个新概念的革命性的欲望索引不是原始的, 国家或资本主义力量 (在他们所有的家族和恋母情结的配方), 也不是阶级分析或先锋党组织与“效仿国家 (modelled after the state)”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裂症是他们对这一革命新概念的称呼。然而, 这些努力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家们立即指责德勒兹和瓜塔里对艺术的潜力过于乐观, “将阶级斗争的作用最小化”, “反对非理性的欲望”和“认定精神分裂症革命者”(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3:455/379)。在这本书出版后, 作者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澄清甚至修改《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概念 (后来, 甚至批评它们)。他们坚持认为,

革命者既不“疯狂”, 也不自我边缘化: 有人说, 我们把精神分裂症患者视为真正的革命者。相反, 我们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分子过程进入黑洞的过程。边缘总是激发我们的恐惧, 和轻微的恐惧。(德勒兹和帕内特 1987:167/139)

在某种特定的政治安排中, 欲望既不是非理性的, 也不是没有决心的:

我们说的正好相反: 欲望只有在被组装或加工时才存在。你不能在一个确定的配置之外, 在一个不预先存在但必须被构建的层面上, 去把握或想象欲望。(德勒兹和帕内特 1987:115/96)

革命的欲望不只是把社会炸成一个纯粹的流动:

在具体的社会领域, 在特定的时刻, 解辖域化的比较运动, 强度的连续体, 以及它们形成的混合流动必须被研究。(德勒兹和帕内特 1987:163/135)

尽管有这些限制, 但不可否认, 安提俄狄浦斯的革命概念仍然不发达。这些分裂逃跑的路线是如何为代表政治 (原始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 的历史提供一个稳定的选择的? 这些“欲望机器”是如何被组装成一场革命运动的呢? 它的具体特征是什么? 然而, 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1980年)之间, 他们的政治著作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强调不受限制的欲望的解辖域化, 到对具体政治安排 (建构主义) 进行谨慎和更清醒的转变, 这一转变成为决定性的。

尤金·霍兰德可能是第一个强调德勒兹和瓜塔里政治哲学转变的人:

正如解域化指定了永久革命的发动机, 而再辖域化指定了资本私有制强加的权力关系。解辖域化看起来“好”, 而再结域化看起来“坏”。但是在千高原上, 解辖域化和再结域化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荷兰 1991:58-9)

除了从“反俄狄浦斯”的“心理-社会”机器中去除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后痕迹之外, 《千高原》, Holland 声称, 引入了三种“解辖域化”——相对、绝对消极和绝对积极 (1991:62)。《千高原》不再为《反俄狄浦斯》(以及德勒兹之前的作品) 中那种对绝对解辖域化或潜在创造力的不加批判的兴奋提供价值, 而是发展了一种被他们称为政治集群的逻辑或建构

主义的更为清醒的任务。Holland 指出了《千高原》(1991:63)的“不那么革命和不那么浪漫”的特点,同时他也建议“任何对早期对“精神分裂症”的夸大或不加批判的热情的挥之不去的怀疑现在都应该通过非常谨慎的,对解域和无器官身体的细微处理(1991:63)。

《千高原》也标志着德勒兹早期个人作品的转变,自定义为“哲学与本体论的融合”(1990:201/179)。尽管我不同意德勒兹之前的作品可以被描述为完全“非政治”,但正如巴迪欧所言(2009b),事实上德勒兹几乎没有发展出政治概念,通常倾向于更多的本体论或美学概念。相比之下,《千高原》明显将政治置于本体论之上。针对彼得·霍尔沃德对“本体论活力论”和“超脱世俗政治”的指责,《千高原》主张(1)推翻本体论:用“与”的逻辑取代“是”的逻辑;(2)“政治先于存在”[avant l' être, il y a la politique]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37/ 25,249 /203)。因此,《千高原》应该更多地作为一个政治文本来阅读,而不是作为一个本体论文本,从而使其与德勒兹早期的个人作品以及巴迪欧(Badiou)和霍尔沃德(Hallward and Žižek)的许多批评作品拉开距离,后者几乎完全专注于他在《千高原》之前的作品。虽然这绝不能让我们忽视巴迪欧和其他人概述的政治危险,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发生在德勒兹和瓜塔里政治哲学中的建构主义转向尚未被认真对待(例如,针对连续性论点,霍尔沃德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其他许多人也含蓄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德勒兹的所有作品都是由一个单一的中心思想指导的,比如内在性、虚拟性、生命等等)。

然而,最近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政治哲学的研究开始更明显地转向始于《千高原》的政治建构主义方向。许多学者在德勒兹和 Guattari 后来的作品中注意到建构主义(也被称为图解、实用或制图)的存在和重要性。根据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的说法,“与早期的[千高原之前的]关注点相比,地形似乎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关注点似乎提供了个体发生的自然化或物质主义描述的某种连续性”(2006:176)¹⁴尤金·霍兰德(Eugene Holland)谈到了“《千高原》所赋予的设计一致性或构图的重要性,在这些平面上,逃逸线可以相交,变得有生产力,而不是旋转到虚空中”(1998:69)。Eduardo Pellejero 强调,“创造性的线条在组合中逃逸,使它们成熟,这不仅是可能和可取的,而且构成了这种新的军事实践的构成主义载体”(Pellejero 2010: 108)。Bonta 和 Protevi 也强调了“工作地图”的中心地位。用真正的干预来做实验”(2004:23)。德勒兹和 Guattari 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组合理论”(巴顿 2006:35),它“将绘制出复杂的地形和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新的生存模式将出现”(史密斯 1998:264),但即使是布鲁诺·波斯提尔斯也承认了由 Guattari 开发的“制图学的正式和政治理论”(1998:150)的“基本框架”的政治重要性。我们甚至可以在《帝国》的最后一章中发现,哈特和内格里承认,“然而,意识到移动群体的潜在自主性,只是指向了真正的问题。”我们需要掌握的是群众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并被重新定义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的”(2000:394,398)。的真正的问题不仅在于解辖域化,再结域化或创造性的生活与资本的死亡之手,而是建设性的

¹⁴ 条件一个革命性的政治体不仅是自我参照,声称目睹的政治自治权像' we 自主因为我们是自主的,但它也是最低限度的 real-abstract non-appearance(密码或学位零),正如我们在另一个萨帕塔主义者声称' we 见证,但我们无处不在”。

方式革命行动呈现一致性,一个承诺,一个组织,什么形式的对立,它产生在一个特定的斗争关系。

因此,尽管受德勒兹和瓜塔里启发的政治哲学中可能有政治危险的倾向,或多或少在某些作品中被强调,如果说德勒兹和瓜塔里以及他们在《千高原》之后的读者没有意识到天真地“估价”革命解辖域化的潜在危险,这显然是不准确的。¹⁵当然,革命可能发展得太快、太多,或者最终陷入一个完全没有一致性或联系的黑洞(边缘)。与反俄狄浦斯的主张“我们在解域化的方向上绝不能走得太远”[Jamais on n’ira assez loin dans la déTerritorialization, le décodage des flux](458/382)相反,《千高原》警告我们,我们实际上可以走得太远,因此必须清醒地对待革命斗争,谨慎和建设。

但学术意识、充满希望的姿态和脚手架很难构成一个全面发展的革命建构主义理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建构主义理论至今尚未有长篇著作问世,除此之外,这样一个项目还存在一个问题。Éric Alliez,在他的文章“反俄狄浦斯——三十年后”,已经最强调德勒兹和 Guattari 后来的建构主义文本的政治重要性,《什么是哲学?》(针对 Badiouian 对政治自发性的指控)¹⁶但问题是,什么是哲学?就像艺术(知觉),哲学(概念)或科学(功能)一样,政治甚至没有自己的适当的范畴!因此,阿利兹的著作《世界的签名》(The Signature of The World)专门讨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构成主义,绝对没有涉及政治。¹⁷

甚至曼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他在《社会新哲学》(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一书中对这种社会逻辑或他称之为“配置理论”的细节进行了最深入的研究,也表达了对这种项目的关注。他说:“德勒兹和瓜塔里作品中有关配置理论的篇幅相对较少,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即使在那些很容易找到配置定义的情况下,它们通常也不会以一种允许简单解释的方式给出。这似乎谴责了一本关于集合理论的书花了大部分篇幅来研究诠释学(de Landa, 2006:3)。但是,尽管德兰达的解决这个问题,阿尔贝托·托斯卡(Alberto Toscano)说,来的“归化(naturalise)”理论的多样性通过重铸的自体模型,就像如果德勒兹胡塞尔的继承人后设性的(metatheoretical)项目,现在应用于复杂系统的理论”(2006:86),目前的工作不会效仿。这本书的中心关注点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本体论的,而是政治的和建构主义的,对现存社会的革命性转变明显感兴趣。¹⁸但本部分只是框框了德勒兹和瓜塔里作品中建构主义转向的出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建构主义”定义为一个有意义的解释范畴,与前两个概念相比,并展示它如何有助于哲学上回归革命的概念。

¹⁵ 请参阅本章下一节“在混凝土机械装配的一致性内的解辖域化程度”。

¹⁶ 见第二章。

¹⁷ “这不是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个概念下,而是把每个概念与解释其突变的变量联系起来”(Deleuze 1995: 47/31)。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抽象机器横切了混沌的可变性,并赋予它一致性(现实)……它指的是前后一致的混沌”(Deleuze and Guattari 1994: 196/208)。

¹⁸ 这在第二章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走向建构主义革命理论

我所说的“建构主义”，并不是指传统上被理解为社会学和哲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即革命是人类思想、语言、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价值等所产生的副产品或“社会建构”。这些理论首先假定了需要解释的东西：思想、社会、文化和历史本身。德勒兹和 Guattari 将他们的哲学方法定义为建构主义，因为这种方法是关于创造性地诊断和将异质元素组装成一个一致的平面（见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93/73）。¹⁹但是，既然定义如此宽泛，而且这种方法在他们后期的作品中经常零星出现，人们几乎不得不做出某种解释或提炼的动作，正如德兰达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因此，我将提出两点：首先，我将这个方法的工作限制为严格的政治解释，特别是其革命层面；其次，我将这种建构主义方法分解为我所看到的四种不同而连贯的哲学活动，并试图将它们重新组合成四种与萨帕塔主义相平行的策略。

简单地说，这本书的问题是“回到今天的革命意味着什么？”简单地回答，我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为我们提供了几个有用的概念，这些概念回应了前面提到的革命的四个问题。为了回答如何理解革命所克服的主导权力关系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历史拓扑”的概念。在回答如何转变这些权力关系的问题时，他们提出了“非领土化”的概念。为了回答我们可以建立什么来取代这些权力关系的问题，他们提出了“政治一致性”的概念，为了回答谁属于这场斗争，他们提出了“游牧团结”的概念。因此，他们的革命的建构主义理论，既不是预先制定的乌托邦计划，也不是“社会建构”的影响、国家权力的夺取、进化的发展或革命性变化的潜力，而是异质元素或个体的承诺安排和分配，没有先锋队、政党、国家或资本：这是一种基于自治和政治问题自我管理的政治（见德勒兹 1994:206/158；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88/471）。

更接近巴迪欧，霍尔沃德，托斯卡诺和博斯蒂尔斯所宣称的政治概念，如“一致性”，“干预”，“承诺”和“团结”，我提出建构主义理论的革命是基于连接或有和异构的政治实践，打破了自由或被连根拔起（“deterritorialised”）通过彼此政治危机理论当前革命序列（然而新生可能）（见 Žižek 和 Douzinas 2010）。当前的革命序列，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托斯卡诺的观点，已经勾勒出了新的组织体制，新的主体性形式，与被接受的中介表现形式有一定的距离。[像]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在墨西哥……[促使我们]开始思考超越国家内部的代表逻辑”（2004:224）。因此，维持价格的造势 offlight”、“断裂”和“异质性”当他们摆脱或权力，没有积极的这样行组成一个新的自己的一致性，在这里，我同意的巴迪欧和其他人——“革命失败”的具体定义，因为革命斗争不能超出孤立的反对权力的爆发或权力内部的爆发。我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关于如何诊断、改造和创建通过相互的全球团结联系起来的新政治机构的凝聚力理论，我们就无法指望理解当前革命序列的哲学。

¹⁹ 这就是没有器官的身体的含义。这并不是说抽象机器的身体没有任何具体的器官，只是这些具体的器官并不是预先组织好的。没有静态的政治形象预先组织政治主体的机构。革命的无器官身体，在不断的参与性改造过程中，不断地对其器官进行重组。

因此，在我的阅读中，《千高原》的政治计划就是要对“革命的一致性”如何在共存的危险的背景下发挥作用并维持下去进行如此积极的阐述。这一正面的叙述将解决下列四个问题：代表过程在什么意义上对革命斗争构成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如何进行政治干预的？它们的条件、要素和作用是如何安排和分布的？他们如何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斗争联系起来？主要取材于《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我提出了一个关于革命的建构主义理论，它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不是将革命提交给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代表，或仅仅肯定一种政治潜力——否则。但是，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中，对这些概念的哲学阐述不足以发展我所概述的四种革命策略。需要展示的是他们在政治实践领域，特别是与萨帕塔主义的共同但平行的发展。

萨帕塔主义与代表性政治

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解读革命概念的方式一样，对萨帕塔斯塔起义的解读也有不同的方式。撇开那些完全反对萨帕塔派为尊严、土地和民主而斗争的人不谈，萨帕塔派的读者或多或少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这场起义是一场不完整或失败的斗争，因为它未能动员墨西哥人民推翻并夺取墨西哥政府（甚至未能为墨西哥土著人赢得重要的代表）。这一观点可以在阿根廷政治理论家 Atilio Boron（《拉丁美洲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作者，1995年）和英国巴基斯坦政治分析人士 Tariq Ali 在 2004 年的文章《拉丁美洲的反新自由主义》中找到。博珊认为，围绕萨帕提莫的后现代主义对多样性和地方自治的庆祝是左派普遍退出阶级斗争的征兆。对珊来说，民众运动，像萨帕蒂斯莫，不能忽视国家权力和代表权的斗争，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在那里，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间接形式经常破坏国家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萨帕塔斯党没有为阶级斗争或国家代表争取到任何实际利益，他们已经失败了（见珊 2003:143-82）。

同样，阿里（Ali）认为萨帕塔主义的口号——“我们可以改变世界而不掌权”——只是一个纯粹的道德口号，没有真正的革命力量。正如阿里所说，

我必须在此直言不讳——[墨西哥国家][没有]感到威胁，因为社会运动中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它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改变世界，而不需要掌权。’“这个口号不会威胁到任何人；这是一个道德口号。我敬佩的萨帕塔斯派教徒，当他们从萨帕斯游行到墨西哥城时，他们认为会发生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道德的象征，甚至不是道德上的胜利，因为什么都没发生。2004年（Ali）

这些说法肯定有些道理：萨帕塔人（1994年在拉坎多丛林首次发表声明）确实向墨西哥国家宣战，但未能动员墨西哥人民，而且从技术上讲，他们甚至无法与墨西哥政府达成改革派圣安德烈协议。这种批评并没有错，这是因为它们把革命成功标准归结为非常狭窄的国家代表性和阶级斗争的范畴。首先，如果我们要分析萨帕塔斯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考虑他们斗争的各个方面（媒体、团结、地方自治、民主、性别、种族和性取向，以及政治经济和国家）。萨帕塔

斯在一些地方赢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其他地方却收效甚微。其次，这些狭隘的批评涵盖了萨帕塔斯派最原始的政治贡献之一：不是他们如何能够在外部影响政治家和国家，而是他们如何在内部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治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连贯地组织了一个超过 2200 个社区（超过 20 万人）的社会。这些社区联合成 38 个“自治市”，每个自治市又分成 5 个地方自治政府，称为“Buen Gobierno 联合政府”（JBG）或“良好政府委员会”（Ross 2006: 194）。第三，尽管人们可以直接判断某个口号的有效性，但如果认为口号或符号本身不能动员全世界数百万人，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它们已经动员起来了，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这样做。就目前的口号而言，“不掌权就改变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口号，我认为，它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不管它的直接效果如何，这一口号继续表达了一种新兴的愿望，即没有国家的新政治。也许这一口号的力量是最好的，原因我将在未来解释。

萨帕塔主义与差异

另一方面，有些读者认为萨帕塔斯派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对所有形式的政治代表（父权制、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等）的强烈怀疑，以及他们对基于差异的政治共同体和团结的肯定（跨越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地理等等）。虽然关于萨帕塔斯派的大部分学者可能都属于这一类（尽管大多数人对萨帕塔斯派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走了多远存在分歧），但我想看看两个更哲学的支持者：Simon Tormey 和 John Holloway。托梅 2006 年的文章《不以我的名义：

德勒兹、萨帕塔主义和代表性批判（Not in my Name”：Deleuze, Zapatismo and the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认为，

扎帕蒂斯主义者的立场和哲学是。这本身就很不了不起，但也表明政治“领域”的基础发生了更普遍的变化，这一领域的问题和指向超出了“代表性”。几十年前，这一转变首先在哲学、伦理学和文学方面宣布，然后蔓延到黑人研究、女权主义、同性恋和同性恋研究，最近又蔓延到后殖民和亚殖民研究。它现在可以在有时被称为“新行动主义”的组织中感受和听到。（138）

但对托梅来说，他从德勒兹早期的著作《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and répétition）》（1968）中汲取了理论，萨帕塔斯党“作为一个坚持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权力”，而不是代表恰帕斯人民的群体……但与恰帕斯人一起，“不仅表达了反对所有形式的政治代表的要求，而且他们，像德勒兹一样，也“承认并庆祝差异，而不是否定……而是作为一种肯定，作为一种自身有价值的东西”（2006:142）。例如，马科斯并不代表萨帕塔斯派，但他本身就是一种多样性；他在旧金山是同性恋，在南非是黑人，在欧洲是亚洲人，在圣伊西德罗是墨西哥人，在西班牙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马科斯是每一个不被容忍、受压迫、受剥削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反抗，说“够了！”（马科斯 2001b: 101-6）。Difference-in-itself, 根据 Tormey, 也意识

到内部组织的萨帕塔主义者，其形式的直接民主“远远超出马克思‘巴黎公社’模型，立即召回和旋转拥抱要求代表听每一个“companero”出现的(2006:148)。

同样，霍洛威，在他2002年的书《不使用权力而改变世界：今天革命的意义》，认为萨帕塔主义者最中央的贡献之一是表达一个“尖叫”的否定、失调和不满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代表系统，霍洛威称之为“恋物癖(Fetishism)”(2002)：萨帕塔斯主义者的斗争不仅是针对国家和资本的，也是针对整个政治分类/代表性体系的。正如霍洛威所说，

我们不是作为工人阶级而斗争，我们反对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被分类(classified) classified。我们的斗争不是劳动的斗争，而是反对劳动的斗争。是分类过程的统一(资本积累的统一)使我们的斗争团结起来，而不是使我们作为一个共同阶级的成员团结起来。因此，例如，正是萨帕塔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分类的斗争对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而不是拉康丛林的土著居民是否是工人阶级成员的问题。(2002: 88)

但是萨帕塔主义不仅仅是对代表的拒绝；这是对恢复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潜力的肯定，是一种“力量”或新行动的能力。正如霍洛威所说，

尖叫是不够的。否定性，即我们对资本的拒绝，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出发点。但单纯的拒绝很容易被资本收回，因为它与资本对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控制相冲突。要让尖叫的力量增长，必须要有一种复原的力量，一种发展的力量。这意味着重新采取行动的方式。(2002: 127)

虽然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赞同这种解读，尤其是托米和霍洛威的解读，但我认为他们的重点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在哲学和政治上的不完整或不足。或许，除了少数例外，萨帕塔斯派对政治代表的主导结构和类别(包括基于工业发展和工厂劳动力的狭隘阶级分析)持批评态度(见Kingsnorth 2004: 29)。²⁰萨帕塔斯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并尊重构成全球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多样性差异，这也是事实。然而，对代表性的拒绝和对差异或“权力”潜力的肯定，几乎没有告诉我们萨帕塔斯特派提出了什么积极的哲学和政治选择。托梅和霍洛威都只花了短短的几页就将萨帕塔斯的内部政治组织(直接民主、共识、轮流自治、主体性、全球团结等)理论化，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的结论是，这些类型的组织(内部和全球网络等)都只是表达了萨帕塔斯特派对代表性的拒绝和对潜在变革(差异)的肯定。但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这种新型的后代表政治是如何构建的？它是如何工作的？它在哪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真正的政治选择？它创造了什么样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它们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萨帕提斯主义者不仅仅是“政治代表让我们失望，我们必须改变现状”这一哲学观点的实际例子，那么他们在哲学和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什么？

²⁰ 信仰，纯粹、直接、纯粹的个人信仰，作为工作假设重新出现；立即发展和检验信念的行动以实验、演绎、论证的形式重新出现；而普遍性、公理、先验真理等的机制，则是人类在预期公开行动的情况下，总是将其信仰的含义系统化，以期修正它们，从而避免不利因素，并确保受欢迎的结果。(杜威 1906:124)

也许许多针对德勒兹和 Guattari 革命概念的“不同读者”的批评同样适用于这里：政治矛盾、虚拟等级制度和主体性瘫痪。这些部分是米哈利斯·曼提尼斯在其著作《萨帕塔斯：恰帕斯起义及其对激进政治的意义（Zapatistas: The Chiapas Revolt and What It Means for Radical Politics）》（2006）中提出的受巴迪奥安（Gramsci）启发的批评。在研究了葛兰西、拉克劳和穆弗、哈特和内格里以及卡斯托里亚迪斯之后，曼蒂尼斯提出了一种受巴迪欧启发的激进主体性理论，这种理论以前在萨帕塔派学者中是缺乏的。尽管 Mentinis 提供了一份关于激进政治理论和 Zapatismo 的优秀调查，但他的立场与巴迪欧明确的矛盾情绪无法调和，后者认为 Zapatismo 是一个真正普遍的事件，因此认为 Zapatismo 没有真正的政治忠诚的主体。²¹学术界对萨帕塔建构主义的一些低估可能只是历史原因，因为萨帕塔斯塔花了很多年才发展出一种相对独特的内部政治组织形式。但这并不能解释最近的学者仍然致力于通过其“本体论的差异优先级”来定义萨帕提莫 (Evans 2010: 142)。无论如何，总而言之，差异本身或发展我们“权力”的潜力告诉我们的很少，关于如何建立一个革命战略，或萨帕塔斯特提供了什么概念的政治生活重组。

萨帕塔主义与建构主义

随后，我提议，就像我在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作品中所做的那样，对萨帕塔斯特的建构主义解读认识到他们不仅对代表性的对抗以及他们对政治差异的肯定是一个彻底包容的全球革命运动的先决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什么取代了代表，他们如何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重组或建立最大限度的政治差异。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建议在使用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建构主义哲学方法来理解萨帕塔主义起义，尽管这两种建构方法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相反，我的建议是，萨帕塔派已经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建构主义。哲学创造概念，政治创造实践。

2003年8月8日至10日，即1994年起义后近十年，以及马科斯及其集团首次进入拉坎多丛林后近二十年，萨帕塔主义者宣布了他们与良好政府委员会（Juntas de Buen Gobierno, 简称JBGs）诞生斗争的新方向。鉴于他们的政治精力和批评此前一直集中在与墨西哥政府的斗争和谈判上，准军事力量和公司（拒绝政治代表权的力量）以及通过替代媒体和异类斗争的全球集会（确认政治差异）确认其自主性和扩大其全球知名度，JBG的诞生标志着创造新事物的重大转折。虽然萨帕塔派当然没有将这一转变称为“建设主义”，但我用这一术语强调他们转向创造新的政治实践，如建立和维持自治市的自治、合作经济和环境管理。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扎帕蒂斯莫身上学到最多。

²¹ “解辖域化”的区别在于“一致性层面上异质成分的共同加速程度”，结域化是“组织层面上的编码程度和原始统一性”，再结域化是“组织层面上的编码程度和公理”。“和游牧民在一起……正是解辖域化构成了与地球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游牧民在解辖域化的基础上重新属地。是地球使自己不再结域化，以一种为游牧民提供领地的方式”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473/381)。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可以在萨帕塔人的公报中看到，这是自 1994 年第一次对墨西哥政府发动战争的宣言失败以来的第一次，在他们试图在全世界面前建设他们想要看到的世界时，对自己的批评。据宣布，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正在超越其在市政当局和地方政府中的决策权，妇女在参与 JBG 和其他领域方面没有受到平等对待，环境正在受到损害，毒品正在种植，人口贩运正在通过萨帕塔领土进行，五个卡拉科尔（萨帕塔领土的地区，字面上是“蜗牛壳”）发展不平衡（Marcos 2006）。因此，萨帕塔主义者必须扩大和增加他们对自己领土内权力的分析：从性别、环境、地方法律、合作生产等方面。

在进行这项“学习如何自治”的大型工程时，萨帕塔党较少关注与国家的政治改革，而是更多地关注于创造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在不推翻国家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在国家内部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治（以及与外部的其他人一起）。但其中最困难的一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政治机构，允许最大程度地包容参与和自治，同时尽量减少排斥和代表性。该组织的创建结合了土著传统、民众大会、共识决策和轮流治理（每 15 天更换一次职位，以确保每个人都学会如何平等地治理）。简而言之，他们创造了一种基于最大程度的政治参与反馈回路的普遍直接民主。虽然这肯定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但这是它的实践视野（参见 Marcos 2006）。

但是萨帕塔斯特党从来都不满足于当地的反抗，无论他们多么成功。虽然这些年萨帕塔主义者成为集中出现‘内部（inward）’，这个建构主义的中心目的之一（被误认为是内向的）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富有成效的发展基于公共财产（不是私人或公共）和与他人分享，不只是在半旋转（caracoles）里面，而是在整个世界里。自 1994 年以来，萨帕塔主义者一直在接受国际援助，但是 2003 年之后可以看到公报持续和小说努力提供物质和政治支持世界各地的斗争反对新自由主义（纺织品、玩具、玉米、公众代言，咖啡等等）（见马科斯 2006）。以前的团结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单向的（苏联国际主义、第三世界团结、国际人权，甚至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提供物质援助等等），萨帕塔主义者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全球团结模式，通过分享和鼓励其他人相互分享支持和援助，即使在他们所拥有的很少的情况下（就像萨帕塔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这种相互支持导致了一系列有趣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团结（见 Walker 2005）。

从 2003 年到 2006 年以及以后，拉奥特拉·坎帕尼亚（La Otra Campaña）（另一场运动）之前的这几年被误解为“沉默的岁月”，并在奥里萨德（orised）的指导下，部分原因是缺乏实证研究（与 2003 年之前的研究相比），但部分原因可能是对扎帕蒂斯莫的“新”兴趣减弱。但在我看来，从 2003 年开始，萨帕塔主义者最有助于对新自由主义革命替代品的建立进行哲学研究。我认为萨帕提斯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概念，这些概念回应了前面提到的四个革命问题。为了回答如何理解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以使革命成为可取的问题，他们提出了马科斯所谓的“超越抵抗”（Beyond Resistance, 2010:11）中所述的“痛苦诊断”（Diagnostico del sufrimiento）的实践。为了回答如何转变这些权力关系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建立善政委员会自治军（Juntas de Buen Gobierno.）的做法。在回答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代替它们的问题时，他们提出了曼德尔·奥贝德西恩多（mandar obedeciendo）（遵循带领）的做

法，在回答谁属于这场斗争的问题时，他们提出了全球恩库特罗（遭遇）的做法。总而言之，他们的建构主义革命理论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革命理论非常相似：既不是事先制定的乌托邦计划，“社会建构”的影响，也不是国家权力的夺取，也不是进化发展或革命变革的潜力，而是没有先锋队、政党、国家或资本的异质元素或奇点的承诺性安排和分配。这种政治，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所倡导的那样，是建立在自治和参与性的政治问题自我管理的基础上的。

3. 概论

以概念配置的方法论和作为一种建构主义阅读的宣泄，本书建议借鉴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者的工作，目的是提炼出一种新的革命政治哲学，有助于理解和激励当前的革命序列，尽管可能还年轻。特别是，它为政治斗争的有条件的必要性提出了四个具体的革命战略或战术指针：(1) 多中心诊断，(2) 预先转变，(3) 参与过程和 (4) 全球相互团结。因此，本书各章将依次提出并捍卫这些策略。此外，每章由三个主要小节组成。第一部分批判性地将拟议战略与其他两个战略区分开来：一个是基于政治代表性的战略，另一个是基于没有建设的政治差异性的战略。然后，第二部分借鉴德勒兹和瓜塔里哲学中的至少一个主要思想来帮助制定本章中提出的战略，第三部分借鉴扎帕蒂斯莫的至少一个主要政治实践来帮助制定拟议的战略。

第一章认为，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者的革命的回归可以通过一种诊断策略来描述，这种诊断策略的动机是相对拒绝所有以前的历史表现形式（父权制、种族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先锋主义等），并关注其内在的影响诊断。尽管这一观点明确否定了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的代表性解读，但它显然与本章前面描述的差异哲学非常相似。因此，这似乎相对没有争议。但我的观点包括这一拒绝的三个关键且未得到充分强调的方面：首先，这是一种相对拒绝，这意味着政治代表在政治生活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发挥着积极作用，即使只是以更具参与性的做法“避开”的方式。也就是说，即使在其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它仍然作为任何政治实践的内在历史潜力发挥作用。其次，我认为政治表征不是一个同质的哲学范畴，因为存在几种截然不同的表征类型。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如种族、阶级、性别、经济等，还表现在形式结构上，如编码、过度编码和公理化。第三，我认为，在每一种政治局势中，这些类型的相对代表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交叉和共存。我反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代表的必要历史出现，也反对它们仅仅是偶然和共存的出现，相反，我主张，借鉴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拓扑学以及萨帕塔主义者所说的痛苦诊断，他们回归革命的特点是，他们利用这些类型的代表性来理解待改变局势中的政治危险和机会。但是，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政治权力和代表性的矩阵呢？

在第二章中，我认为，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的作品中所发现的这种回归革命的特点，也是一种政治变革的先兆战略，旨在在旧的内部和旁边构建新的现在。相对于通过过渡、进步和代表性改革的进化过程实现革命转型，或者仅仅通过与当前的自发决裂实现革命转型，预先政治转型将作为主导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出现。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解域化理论以及萨帕塔主义

者对善政委员会 (Juntas de Buen Gobierno) 的实践, 我认为, 因此, 预备革命是那些能够维持新现状创造并将其与其他地方发生的斗争联系起来的转型类型。因此, 这种类型的政治革命既不完全依赖于其过去的决定 (及其预先给定的可能性), 也不完全依赖于其未来的潜力。相反, 它是一个改变过去和未来的新现实的构建主义。但是, 这些革命性的变革如何能够超越它们的相对自主权和预设而持续下去呢?

因此, 在第三章中, 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找到一个参与性战略, 以创建一个能够维持这些预先转变的革命政治体。一个参与性政治体并不仅仅是在政治行动的“更公正”领域基础上为政治生活创造新的条件, 政治行动的基本原则仍然由政治代表控制。参与性政治体也不仅仅旨在建立反机构, 其唯一目的是破坏所有形式的代表权, 等待新的、希望更好的东西出现的可能性。相反, 一个参与性和革命性的政治体是通过一个表达过程来建立和维持的, 其建立条件不断受到各种实践的直接和内在的高度变革, 人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部署的变革。特别是, 我在本章中指出, 这种参与式的“反馈循环”可以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千高原》与《什么是哲学?》的一致性概念中找到, 在萨帕塔主义者“遵循带领 (leading by obeying)”的政治实践中 (mandar obedeciendo)。我认为, 为了理解这种一致性的结构和功能, 以及在这个新的政治体中遵循带领的结构和功能, 我们需要了解它们的条件、要素和机构如何不同于代表性和反代表性机构。我通过借鉴德勒兹和瓜塔里哲学中的三个概念来论证这一点, 这三个概念对应于一贯革命制度的条件、要素和机构: 抽象机器、具体集合和人物角色。²² 正如这三个概念在“没有等级的秩序”关系中内在地相互转化一样,²³ 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 遵循带领也为萨帕塔主义的革命机构提供了平等主义框架 (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4:87/90)。但革命政治团体的参与性质仍然留下了一个问题, “这些新的政治团体如何能够跨越其根本分歧相互联系?”

因此, 第四章借鉴了前面的所有章节, 以论证我们可以在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找到一种基于这种参与性政治机构的全球团结的革命政治亲和力和战略。我认为, 革命的政治亲和力不仅仅是基于修改公民身份的具体标准或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将边缘化的要求重新整合到占主导地位的领土民族国家机器中。这也不是一个认识到所有存在物的普遍奇异性的问题, 而不是认识到它们的本来面目。相反, 革命的政治亲和力是一个团结的问题: 当革命的政治团体, 即那些仍然没有代表或被排除在政治亲和力主导形式之外的团体, 一个接一个地在彼此身上发现彼此独特斗争的超普遍性和互助性时。因此, 单一的普遍团结不是一个承认、慈善甚至根本不同的问题, 而是一个相互联合的差异或全球斗争中异质单一普遍事件的“偶然整体论”。因此, 本章的任务是避免排斥和普遍单一性的危险, 并提出一种政治团结理论, 取而代之的是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主义概念以及萨帕塔主义者的 Encuentros Intercontinentales. 全球实践中得出的。特别是, 我首先反对将“公民身份”和“差异”作为政治归属的理想模式, 因为前者在结构上具有排他性, 而后者无法从理论上建立多种共存条件之间的任何具体关系。第二,

我认为，与这两种危险相反，革命团结应该被定义为多个单一普遍条件之间的联合联系，而不是整体性。

最后，我对各章的相关成就和整本书的论点进行了重构和反思。特别是，结论解决了书末的问题：全球团结如何成为一个决策力量，从而使世界有组织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能够形成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必要的政治排斥的行动反力量，经济剥削还是反权力的集中？虽然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者提供了极好的资源，但他们只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基础，而这个问题在世界社会论坛一级目前的革命秩序中也尚未解决。这是真正摆脱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障碍，需要对目前正在出现的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和哲学实验形式进行进一步的哲学研究。

²² 《世界的签名》涉及道德，而不是政治。

²² “这不是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个概念下，而是把每个概念与解释其突变的变量联系起来” (Deleuze 1995: 47/31)。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抽象机器横切了混沌的可变性，并赋予它一致性 (现实)……它指的是前后一致的混沌” (Deleuze and Guattari 1994: 196/208)。

1 政治史与革命实践诊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发展出一种历史理论，即一种不可预测的、独特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也没有发展出一种政治实践理论。我在这里指的是政治行动主义、群众运动及其最终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实践，对于这些实践，我们没有概念，更没有连贯的理论，以便在思想中加以理解。列宁、葛兰西和毛只能部分认为这种做法。唯一一个认为政治实践的政治历史的理论家是马基雅维利。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需要克服，它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它又一次把我们送回了哲学。(阿尔都塞 1994:48)

导论

既然它已明显枯竭，又怎能回到革命呢？这是本书的中心问题。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范围，我在引言中提出，我对这个问题的哲学质疑集中在当前革命序列历史上对其发展有特别影响的三个人物上：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因此，为了阐明开始于二十世纪末的更大的革命序列，我还提出了四种不同的革命策略，以帮助我们澄清和发展这种新的革命政治哲学。这四种策略回答了关于革命四个重要问题，并与本书的每一章相对应。历史和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革命性的转变？如何才能维持和实施革命性变革的后果？革命如何相互联系，以产生一种新的全球团结？

导言不仅从整体上阐述了这本书的更大任务，还提出了一种方法来组合四种拟议策略，并提出了一种解释性干预，以确定它们在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的位置。除此之外，我还建议对德勒兹的文献进行有益的干预，Guattari 和 Zapatistas 将其解读为政治理论和实践，其目的不仅仅是改革政治代表性的过程，或者仅仅是确认其转变潜力的存在差异条件，但将他们解读为政治建构主义者，致力于创造国家、政党和先锋政治的积极替代方案。1.

基于我所提出的上述哲学框架，本章回答了上述四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今天历史与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作为回应，本章认为，受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影响的革命的回归，可以以政治历史的“诊断”策略为特征，其动机是相对拒绝所有以前的政治代表形式（国家主义、

资本主义、先锋主义等), 以及对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的内在诊断的关注。我的观点是, 不仅是对代表性的内容(种族、阶级、性别、经济等)的相对排斥, 而且是对它的形式的相对排斥。在任何政治环境中, 代表性的形式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交叉和共存。

为了捍卫这些主张, 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种观点首先拒绝了世界史的两个概念: 不同类型政治权力的必然和顺序出现的概念, 以及不同类型政治权力的偶然和共存出现的概念。我认为, 这两种观念都无法构想出替代代议制政治的可持续方案。接下来的两个部分提出了利用历史的另一种策略, 基于其特定的诊断能力, 以帮助识别内在的政治危险和革命实践的机会。第二部分认为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历史拓扑理论是这样一个多中心的政治诊断, 第三部分认为在 La Otra Campaña 中使用的萨帕塔“诊断痛苦”的实践也是这样一个多中心的政治诊断 (Marcos 2004b: 314)。

一、革命与世界史

在第一部分中, 我将多中心政治诊断的概念与两个相互竞争的普世历史概念区分开来, 这两个概念都无法构想出代表政治的持续替代方案。

连续的革命史

根据第一个概念, 世界史是不可避免的危机时刻向日益优越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延续。因此, 革命是一种进步的、进化的和目的性的力量。政治历史的作用是通过不同的瞬间或时代的连续流逝来实现的, 这一概念依赖于这些时代之下的统一, 基础或同一性, 这样它们就可以从彼此和它们所经过的基础上被区分开来。每个时代都是截然不同的, 但在历史本身的背景下与前一个时代有着因果联系。但是, 无论这种普遍的政治继承是目的论的、进化的还是进步的, 它仍然把革命定义为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转变, 其指导思想是了解它们之间潜在的历史连续性。根据这一理论, 革命运动是以国家朝着其预定目标连续不断地、日益精确地转型重复的方式进行的: 完美的国家形态本身、国家自由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等。

然而, 这一普遍历史继承理论所带来的问题是, 由于它假设了一种预先给定的身份综合, 以解释因果不同瞬间的过去, 因此它最终只会重复相同的历史政治预设, 而不存在外部变化或偶然性的可能性。这最终是一部关于国家及其俘虏非国家力量的普遍历史。它将历史定义为“x”的发展趋势, 其中“x”是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形式的完善。换言之, 继承的概念以给定的当前时刻为前提, 然后将过去和未来理解为当前时刻的重复: 作为其主要原因的影响。这就排除了一个偶然的革命事件可能破坏这种团结的可能性; 它可能会改变历史的前提(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其基本的关系法则: 相似性、代表性、获得国家权力等等)。因此, 历史继承可以允许改变, 但只能在预先设定的参数范围内, 新的政治事件不会改变这些参数。非国家权力可能存在, 但只能作为国家权力走向完善的发展阶段。

然而，这个革命历史理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非国家的历史新颖性的概念。除了夺取国家的目的之外，革命作为一种真正形式的权力的积极成分的问题还没有被认真对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的理论目标最终是反国家的，只是成功地用共产主义的党国主义取代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但今天尚未思考和实践的是一种新的非国家机构，它将取代党和国家。²

偶发事件的世界史

根据第二个概念，世界史是多种力量和偶然力量并存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就是变革本身的潜力。关于偶然性的普遍历史否定了历史进步、目的论、国家和根本的历史统一性的概念。不幸的是，仅仅是历史政治形式的偶然性和共存是不足以理解革命是如何产生的。解读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政治史概念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解读为偶然性和共存的世界史。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杰伊·兰伯特（Jay Lampert）提出了这一观点。兰伯特认为，

继承的世界史“假设”，“事件对它们相似的事件具有主要的因果影响；对待事件如果他们完全由之前的原因影响通过机会或随后的事件，和它读取事件目的论”（2006:7）。相对于继承，兰伯特认为相反，我们可能认为时间作为拓扑场域折叠和展开的。当对其自身折叠时，场每次呈现一个小正方形，它的其他部分移到后面——呈现但有背景。当再次展开时，礼物被重新组织，新的前景发生。瞬间总是在变化的拓扑上被重新表述；作为最小可能的观点，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总之，最小的点，以及它们的呈现顺序，取决于包围它们的一般域的折叠和展开。（2006: 16）

如果我们考虑‘世界的历史 [是] 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历史的必要性’，和历史事件作为所有‘在前的交叉路口，现在，和未来的事件（更多的前景，其他更多的末尾），那么就没有必要或行驶目的论，历史上进化和进步，只有不同的时间异质时刻的安排不断开放重新组合（Deleuze 和 Guattari 1983: 163/140）。根据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观点，

以资本主义的视角回顾历史是正确的，条件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守马克思制定的规则：首先，世界史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突破和极限，而不是连续性。因为它需要巨大的机会 [巨大的危险]，惊人的遭遇，这些可能在其他地方产生，以前，或者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为了使通量逃脱编码，并且，逃逸，将构成一个新的机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确定……总之，世界史不仅是回顾的，而且是偶然的、独特的、讽刺的和批判的。（1983: 163 - 4/140）

因此，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世界史概念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它从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但这个“终结”并不是它的最终结局。至关重要，它是不断推动超越极限的资本主义向新元素继续摆脱它，而且它独特的历史事件是基于或有遇到不表达相同的统一的条件。

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历史是普遍的，这不是因为预先设定的社会身份能够在其所有前辈身上看到自己，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将人从他们的“自然”或“适当”时空中分离出来，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些具有解域力的历史事件能够直接影响当前的宪法。兰伯特认为，绕过新自由主义政治史死路一条的道路就是“共存历史的革命潜力”（2006:140）简而言之，兰帕特认为，在德勒兹和 Guattari 宣称“不可判定是卓越的细菌和革命决定的地方”（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 590—1/473），[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新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不可判定的事情（LAMPART 2006: 169）。如果历史是普遍偶然的，历史上的一些或任何革命事件，现在或未来可能在任何时候突然复活（法国大革命，1968年5月，即将发生的事件等等），然后革命的概念永远不会被耗尽，“德勒兹历史学家”生成“将身体重组为战争机器的革命者”，并确认所有事件都是不可判定的共存新革命的潜力（2006年：111）。

虽然我认为兰珀特的叙述写得很好，也没有错，但我也认为，它对革命政治哲学的贡献，就像德勒兹和 Guattari 在《反俄狄浦斯》中所做的那样，根本不够。虽然偶然和共存的普遍历史确实可以在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哲学中找到，并且能够避免继承的问题，但是，对革命共存潜力的不可决定的肯定，最终仍然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巴迪欧在《流变与党（Flux and the Party）》（2004a）中对反俄狄浦斯的批评。简单地通过偶然的革命历史事件的重新出现来巩固或肯定政治形势的历史潜力使之“变得不同于它本来的面目”可能是一种解放，就像它可能意味着更古老的暴力形式的镇压的回归或者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市场机会。虽然普遍的偶然性历史当然承认革命的可能性，但它并不直接有助于它的澄清或实际的发展。

然而，在某些地方，兰伯特对德勒兹和瓜塔里历史哲学的解读似乎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可以继续发展一种基于政治事件偶然共存的革命理论。“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兰伯特坚持认为，“在特定的时间时刻被实现，意味着除了它同时展示了所有四种时间关系（领土、中央集权、资本主义和游牧），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所有这些都具体地描绘在一起”（2006:17）。兰伯特也许没有使用这种方法来理解革命实践的实现，但这正是本章的目的。

二、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拓扑学

什么是政治史？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历史，使非代表性的革命实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构建的呢？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这不能是出于必要性、进步和国家控制，也不能仅仅是偶然性和共存。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理解代议制政治历史的持久政治选择的方法。然而，认真考虑兰伯特的观点，在下一节中，我认为我们可以使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拓扑理论作为对革命实践的多中心诊断。这样做，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真正革命性的政治历史的使用，不受代表权和不可决定的偶然性的肯定。尽管《反俄狄浦斯》一开始就有，但我相信，要阅读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历史理论，将其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诊断，最好的资源可以在《千高原》一书

中找到。虽然德勒兹和“官不直接描述他们的历史拓扑理论作为‘多中心 (multi-centred) 政治诊断’，也不使用它的唯一目的评估革命斗争的积极力量，我认为这样做会解决我们的困境，帮助我们评估建立革命实践的危害：具体地将四种时间关系放在一起 (见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42/435)。3

为此，在这一节中，我将概述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中描述的三个历史政治过程，并认为这些过程有助于诊断革命性变革的危险和机遇。尽管德勒兹和瓜塔里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一场革命是由结域编码、国家编码或资本主义公理来运作的？这些对革命实践构成了什么危险？

但是，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历史理论应该被用作政治诊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原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人也提出过这种观点，我在自己的阅读中引用了他们的作品 (Bell and Colebrook, 2009)。然而，我读到的独创性之处在于，我特别关注革命实现的问题，以及它作为一种积极的 (不仅仅是潜在的或不可决定的) 权力形式所面临的危险。

然而，在这一点上，读者可能会想知道德勒兹和瓜塔里从哪里得到了这三种政治过程，为什么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理解当代的革命回归。首先，领土编码、中央集权过度编码和资本主义公理化的政治过程不是从天而降的。德勒兹和瓜塔里花费了绝大多数的反俄狄浦斯运动和千高原的大部分时间，通过借鉴各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政治历史的具体实践和事件中提取这些过程的一般特征。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这些政治进程并不是外界强加于历史和政治生活上的普遍范畴。但它们也不仅仅是可以简化为它们所要描述的具体经验现象。例如，统计主义者的过度编码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状态，也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必然的普遍范畴；正如福柯所说，这是一个“统计的过程” (2008:77)。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这三个政治权力过程没有固定的本质或普遍性，独立于构成它们的偶然性和具体效果。事实上，它们本身只不过是效果，是一个永恒过程的可移动的形状，因为它们是不停改变、移动或变化的交易。但在这些变化中，每个过程仍然具有“先验经验主义”的一般特征 (见 sauvagn2010)。也就是说，它们是先验的，因为它们描述了各种现象发生的条件，但它们也是经验的，因为它们是真的，单一的，可变的，历史上偶然发生的。然而，偶然性也意味着它们可能在历史的不同时刻以不同的组合出现或消失。4

其次，相应地，我们应该使用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历史拓扑学理论来理解历史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像兰珀特正确批判的政治历史，历史拓扑学能够理论化具有当代回归革命特征的新颖和非具象过程的可能性。反对以国家为基础的历史统一性，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兰珀特，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基于革命潜力的偶然性的政治历史。如果我们想要思考革命的回归而不是建立在国家，政党或先锋代表的目的性政治发展的基础上，那么我们需要能够把历史看作是偶然的和拓扑的。德勒兹和瓜塔里是如何成功完成这一任务的，这是一些学术著作的主题 (见 Burchill 2007)。然而，我在这一节中提出的论点超出了对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的范围，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将德勒兹和 Guattari 解读为仅仅提出了一种潜在的和拓扑学的历史

理论。相反，我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历史哲学不仅仅是拓扑学，而且应该被用作政治权力的诊断，以构建积极的革命实践。我们应该使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拓扑学，而不仅仅是对世界及其变革潜力的准确描述；我们应该用它来建立另一个积极取代代表性政治的世界。

在描述这些过程的一般特征并论证它们作为对革命实践的多中心政治诊断之前，我想强调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历史拓扑理论的四个中心特征，这些特征指导我的论述。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政治史是 (1) 拓扑的，(2) 内在地应用于“事件的过程” (1987:307/251)，(3) 政治过程的混合，(4) 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政治代表的危险。

(1) 政治史是拓扑学的

数学家黎曼 (Riemann) 将复数从其谓词状态中根除，并使其成为名词“multiplicity (多样性)”，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它标志着辩证法的结束和多样性类型学和拓扑学的开始。(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602/482-3)

从数学中，拓扑场的概念是由多个异质点组成的单个表面，这些点通过其表面上的折叠或形态连接在一起 (就像一张折纸)。不依赖于线性的连续性或辩证法，拓扑形状通过折叠自己进入新的关系网络而移动和变化。Sierpin'ski 的海绵，没有切线的 von Koch 曲线和 Mandelbrot 的分形都是几何中拓扑域迭代的例子。⁵

因此，政治历史的特定拓扑理论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方式，将政治事件考虑为同时具有几个重叠和偶然的趋势，每一个或多或少的程度。例如，也许一个政治事件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但也有强烈的宗法规范的领土或宗教倾向，这种倾向微弱地表现为跨越国界的非民族团结。这种异质性不是矛盾或排斥的问题。从拓学的角度来说，这里不存在中轴或“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只有相对混合的政治倾向相互叠加，没有固定的中心或必要的关系。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所有这些政治倾向都是拓扑结构的轨迹，在这里定义原始社会，在那里定义国家，在其他地方定义战争机器 (1987:537/430)。因此，从拓扑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政治倾向或类型确实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们占据不同的位置，但它们也可以偶然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共存的空间本身将它们折叠在一起。如果政治事件像一条直线上的连续点，那么一个点不可能直接影响另一个点，除非通过因果统一的中介链。然而，如果政治事件是一维折叠表面上的异质点，那么任何事件都可以通过空间邻近性在任何组合中直接与任何其他事件联系起来：没有中介或因果统一。⁶

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这种政治共存的结果是，这些方向在所有社会领域和所有时期都平等地存在。它们甚至发生了部分合并” (1987:446/360)。所有的政治类型同时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融合和共存，它们积极地相互排斥和防止即将发生的事情，同时也为它们的替代提供了条件。例如，德勒兹和 Guattari 认为，在原始社会，亲属关系积极地预期国家会夺取他们的剩余储备和已被破解的资本流动，但也积极地通过 potlatch 和与其他部落结盟 (婚姻、嫁妆)

的具体实践来阻止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一种不存在的未来的“预感”或行为，对已经在行动的现在，即使“未来”的形式还没有经验地存在。

原始社会不能在没有预见到帝国或国家的形成之前就阻止它的形成，他们也不能在没有预见到帝国或国家已经存在的情况下进行预测。如果被占领的东西不能共存，不能在原始社会中抵抗，也不能以城镇或战争机器等新形式逃脱，国家就无法实现占领。(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42/435)

因此，他们说，“抵抗也是在期待”[Conjurer, c' est aussi anticiper] (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37/431)。即使是当代物理学和生物学也发展出了类似的“反向因果关系”概念，这些概念没有终结性，但证明了未来对现在的作用，或现在对过去的作用 (Prigogine 和 Stengers, 1997 年)。

(2) 政治史应用于事件的过程

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拓扑学或“投机制图学”……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存在模式的清单' (Stivale 1998)，或者是为了提供一个生物的详尽分类。这样的清单将假定存在的一个更高的统一性或整体，从而派生出它的普遍性。德勒兹和瓜塔里说，只有当政治史“停止表达隐藏的统一，成为考虑中的多样性的一个维度”时，它才停止代表一种政治局势，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1987:33/22)。也就是说，革命的情况并不预先存在它的拓扑结构，它“必须被制造” (德勒兹和 Guattari 1987: 13/6) 或通过诊断劳动本身来表达，这样人们就不能将它与存在的领域区分开来 (Stivale 1998: 219)。因此，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地图和领土之间没有区别。”这意味着没有转置，没有可译性，因此没有可能的分类。这里的模型化是存在的生产者' (Stivale 1998: 219)。

例如，当德勒兹和 Guattari 描述原始社会中信用和债务的亲属关系或摩西的游牧者的沙漠漫游时，这些不是人类学或历史的主张，意味着代表或真实地引用一些过去的“事件状态”，无论准确与否，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误解的那样 (米勒 1993)。具象人类学和历史预设了人类和时间的先验统一，这样，一个点可以通过继承和身份代替另一个点。相反，德勒兹和瓜塔里利用人类学和历史学来孤立某些政治概念，这些概念适合于政治，但只能在哲学上形成 (见德勒兹 1989:365/280)。这种政治概念与局势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构成局势和表现局势。

因此，历史拓扑并不询问特征是否准确地代表了事态的真相，或者它们的含义、意义、象征或代表。相反，它包含了他们如何工作和他们做什么的实际层面。因此，拓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 建构主义本身被它所改造的事物所改造。

(3) 政治史是政治过程的混合体

但是，如果政治历史不是单个 telos 的持续演变，也不是共存的纯粹潜力，而是共存历史事件中“一致性配置”或“非常异质元素的整合”的偶然、多重和折叠组合，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时间：有限的政治序列、追溯性解释、日期、原因和崩溃的准历史现象（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414/335）？如果历史上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共存的，那么我们如何区分不同的拓扑混合的“生成-块茎”呢？

每一种情况，或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生成的障碍”，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类型的混合，或多或少是预期或阻止的。例如，不同的政治进程可能会通过不同的历史-政治继承模式在一种情况下造成转变的障碍：族谱和谱系的地域继承，国家继承——预先给定的法律和暴君的不共存，以及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上的公理交换而实现的继承共存因此，继承的存在并不是时间的统一性，而是政治拓扑中更主要的折叠网络的次级效应。

这些“混合政权”，德勒兹和 Guattari 说，“假设这些从一个政权到另一个政权的转变，过去的，现在的，或潜在的（作为新政权创造的函数）”（我的斜体）（1987:181/145）。也就是说，因为所有的政治事件在任何特定事件中都是潜在的或实际上活跃的（必须被阻止或促成），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必要的继承，但可以产生一个继承的效果。基于阈值和邻域的政治拓扑结构（这里是国家主义，那里是领土形态，等等）通过历史折叠解释了不同的“序列”。完全不同的时空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序列”来维系在一起的，这些“序列”被赋予了一个历史名称和日期来标记它们的配置。然后根据拓扑异质性构造序列。因此，日期和名称并不指代或代表过去或未来的政治事件，而只是一个“序列（sequence）”的创建的标记。

保罗·巴顿（Paul Patton）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反，没有单一的发展逻辑支配着用这些术语理解的历史方向。所有事件都是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事物被改变或重新解释以服务于新的目的”（2000:56）。与其问一个政治事件如何进一步阐明一个预先设定的“历史终结”，我们应该问，在一个给定的事件中，什么是相对的阻碍、预期和混合的政治过程，未来的事件如何改变过去和现在的事件，过去的如何改变未来的？也就是说，这一事件的政治预期和镇压的相对混合是什么？我们如何在创造建设性替代方案的同时避免代表性的危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使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拓扑作为诊断，以避免阻碍基于身份的普遍历史（只将差异理解为同一差异）和普遍历史的矛盾心理，而普遍历史仅仅肯定了革命共存的潜力。

(4) 政治史帮助我们避免政治代表的危险

作为一种战略，政治史的目标是帮助确定革命实践所面临的危险。

“提出问题后写反，一个总是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解码的动作，解辖域化的运动，是革命的积极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不会重新创建人工形式曲解或家庭，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各种类型的代码和领地。（德勒兹 1972）8

为了有效避免德勒兹和瓜塔里所称的“社会代表性秩序”，政治和拓扑历史必须能够区分类型，并取消选择那些孤立、自毁或试图捕捉所有其他价值模式的类型（1983:312/262）。要求承认其单一问题原因的运动的偏执狂、合法和代表性国家主义对公民的臣服、技术资本主义市场生产对全球的奴役，以及无法创造新的替代品的逃避这些危险的路线，可能落入革命纯度、毒品或玩世不恭的黑洞，这些都是共存的潜在危险。

但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政治绝不是一门必然的科学。”它通过实验、在黑暗中摸索、注射、撤退、前进、撤退来前进。决策和预测的因素是有限的’（1987:575/461）。由于历史拓扑学的实践，正如他们所定义的那样，是情境的组成部分，任何“识别”“什么类型在这里发挥作用”都是有效的，并且受到决定行为的影响。因此，历史拓扑决不是公理的或形式上不受它所作出的决定的影响。相反，它在实验性反馈回路中的每一点上都是相互转换的，总是处于危险之中，需要谨慎。因此，革命不是不受约束地释放欲望，不是自由，也不是有“正确计划”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冒险的实验，需要谨慎和承诺来对行动进行实际性诊断：要么在最后一个维度上增加一个维度，要么在最后一个维度上进行折叠。

革命既不是对国家权力的渐进式战略攻击，也不是偶然地让事物变得不同于它们本来面目的绝对潜力。更确切地说，革命形势是一种不同的历史/政治力量所特有的预期和预防的张力。它是对政治代表的力量和危险同时并存的新时空或连续事件的诊断性创造。它不是一种根本的外部力量，而是一种折叠在情况内部的外部力量：正如 Guattari 所说，它是，或者可以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反资本主义力量”（1996:89）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拓扑学概念来创造性地诊断革命实践的积极力量（而不仅仅是潜在力量）呢？

历史拓扑学对革命实践的诊断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论证了两点：第一，非代表性革命的出现被两种普遍历史理论所阻止。如果历史是在政治代表中达到高潮的连续时刻的统一，那么非代表的革命性新颖性是不可能的。如果历史实际上是偶然时刻的共存，那么革命性的新事物是可能的，但也是矛盾的。其次，我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史概念为这两种理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因为它是（1）拓扑的，（2）内在地应用于“事件的过程”，（3）政治过程的混合，（4）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政治代表的危险（尽管这些危险的具体细节将在下一节中讨论）。在下一节中，我将论证，这种历史拓扑图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革命战略的象征，这种战略是基于对革命实践的诊断。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详细研究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结域编码、国家过度编码和资本主义公理化）所描述的每一个政治过程，并展示了每一个过程是如何诊断一种对革命实践构成危险的代表性过程的：（1）结域代表性带来了偏执和微观法西斯；（2）国家代表性带来了恐惧、机械奴役和主体化的危险；（3）资本主义代表性带来了全面战争的危险，以及一种新形式的机械奴役。

(1) 领土代表性

领土政治表征是德勒兹和瓜塔里从“原始社会”实践中提取出来的一个概念，其特征是所谓的编码、灵活的分割和流动。但是，他们问，‘当这是一个关乎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时，为什么要回归原始？’(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254/209)。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Deleuze 2006: 163/177)一书中，从反俄狄浦斯运动中做出了一个更具有政治意义(但却不太受关注)的举动，那就是将他们的政治类型学扩展到一个更广泛的“集会的一般逻辑”(une logique générale)中，之前他们的政治类型学仅限于性欲和经济领域。德勒兹认为，《反俄狄浦斯》中原始主义、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力比多和经济序列的特征，在《千高原》中变成了各种组合的一般政治和拓扑特征。在此之后，目前的方法只提取了这三种逻辑中最基本和可转移的方面，而没有将它们的起源与它们在《反俄狄浦斯》中出现的狭窄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在拓扑学上，正如我所展示的，所有历史政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过去和在现在或将来都可以发挥作用。

(1.1) 编码、灵活分割和巡回

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领土代表性的特点使用多声部编码、灵活的分段和巡回领土。杰森·里德(Jason Read)认为，这些都是基本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社会“传统、处方和规则影响商品的生产 and 分配、声望和欲望”在政治局势中得以体现(2008:142)。它们是社会生活的“自然”准则。领土进程通过抑制解码流(无法解释的)和(重新)将他人呈现为编码流(有意义的)，表达了在特定情况下对人和物的预先给定、基本和适当的限制和使用。因此，代码被自然化为“与过去有关，与记忆铭文有关，”事情就是这样做的，它们总是这样做的”(2008:142)。根据反俄狄浦斯的说法，这些“性质不同的移动和有限代码链”(1983:294/247)由三个基本动作构成：(1)“选择切割”允许某些东西通过和流通；(2)“分离切口”阻断了部分循环；(3)重新分配剩余部分，开始新的代码链。

德勒兹和瓜塔里说，编码的过程不是基于主要的编码，而是从“未编码或已解码的流”的领地压制开始的：一种地球本身固有的原始混沌。在存在任何社会规范或传统之前，有一个更主要的“分离”(1983:177/152)，“整个生产过程被记录下来，劳动的力量和手段被记录下来，代理人和产品被分配”(1983:164-5 / 141)。面对这个本质上混乱和支离破碎的世界的“可怕噩梦”(1983:164/140)，各领土人民压制这些非编码的流动，并在这种混乱中写下他们自己的领土代表性(1983:164/140)。

第一个区域编码合成(连接合成)试图通过从这些非编码流中进行“选择切断”来避开这种混乱，允许其中一些通过，而另一些被阻塞。这种对非编码流的主要压制完成了两件事：它通过取消某些流的选择来避开一个绝对混乱的世界，它将进入循环并连接其他需要编码的流。通过标记这些非编码流的分离，连接合成能够将它们序列化并定性地组织成一个身份，“编码存量”，或者德勒兹和 Guattari 所说的“整个身体上的铭文”或“社会”。选择的“入口极”在这里启动了亲缘关系，遵循谱系或世袭的等级编码序列：亲属代码、崇拜代码、交流代码、交换

代码、位置代码 (崇拜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垃圾的地方)。一切事物都有其适当的准则: 适当的革命时间, 适当的人民进行革命。

第二种区域编码合成 (析取合成 the disjunctive synthesis 或“分离切割”) 也完成两个任务: 它阻止这些连接附加自己的政治机构 (通过代码禁令, 限制等等), 这样有限的代码存量就可以在一个性质不同的区域内流通, 它分离剩余或‘ 剩余的能量’ 以开始新的代码沿着链。这些是城镇的边界, 对亲属关系的禁止, 以及对种族、民族和性别身份的边界。革命先锋队也同样脱离无产阶级群众, 走在他们的前面。这些是析取综合所产生的限制。

第三领土编码 (连接的合成或合成’ redistribution 其余的) 融合的病房所有编码成一个定性的股票通过产生残渣, 但也开始一个新的行代码通过重新分配剩余结盟与不同的代码行。有许多不同的机制可以防止代码融合, 并通过与其他代码行联盟来重新分配剩余代码: 送礼 (为了获得声望而赠予财富), 斗争 (巡回抢劫和盗窃消除积累), 嫁妆 (赠予财富和与其他亲属结盟), 礼物和反礼物, 等等。

这些代码、血统和领地“形成了一个相对柔软的分割结构”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255/208)。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1987:254/208) 中说, 规范和领土代表性将我们从四面八方分割开来。“房子是根据它的房间分配的用途分割的;29、街道, 按秩序成城; 工厂, 根据工作和操作的性质” (1987:254/208)。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

在巨大的二元对立之后出现了多个二元部分: 社会阶层, 但也有男性、女性、成人、儿童等等, 圆形部分, 在越来越大的圆圈中, 越来越宽的圆盘或冠状面, 如乔伊斯的“信”: 我的事务、我的邻居的事务、我的城市的事务、我的国家的事务、世界的事务和线性部分, 沿着一条或多条直线, 每一段代表一个情节或“过程”: 一旦我们完成一个过程, 我们就开始另一个过程, 永远在家庭、学校、军队和工作中进行。学校告诉我们, ‘你不在家了’; 军队告诉我们, “你不再上学了。” (1987: 254/208)

有时片段属于个人或组, 有时个人或组同时属于多个片段, 并根据透视图而变化。区域分割常常在混沌分裂和静态融合两极之间留有余地。它们在异质元素之间具有相当大的沟通能力, 例如一个部分可以在许多方面与另一个部分相适应, 而无需事先确定基本领域 (经济、政治、司法、艺术等)。它们具有独立于任何结构的属性和关系, 并具有连续的活动, 因此分段性始终是过程中的分段性, 通过外生物、分离物和合并来进行操作。

最后, “通过在每个行动周期 ((itinerancy, itineration) 结束时切换领土”, 并在每个行动周期内重复一个趋向于其边际或极限目标的时间序列, 原始的政治分布创造了“过剩和匮乏的不均衡” (见德勒兹和 Guattari 1987: 548 - 50/440)。也就是说, 每当一个领土被划界时, 就会通过这个划界或“分离”的过程产生一个外部或盈余。这种过剩或信用然后重新分配到另一个行 (通过一个联盟), 它将再次产生盈余等等永远不均衡: 使其功能障碍的能力的一个重要元素功能 (“只有当一个社会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时, 它才能正常工作。” “‘c’ est pour fonctionner

qu' une machine sociale doit ne pas fonctionner bien' ”)(1983:177/151)。但是，用它来诊断一种积极的革命性实践又意味着什么呢？

(1.2) 革命实践中领土代表性的错误和危险

作为一种诊断工具，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偶然性，领土代表性揭示了革命实践中的两种错误和两种危险。德勒兹和瓜塔里说，“第一个错误”是“价值论的，是相信一点灵活性就足以让事情“变得更好” (1987:262/215)。

基于基本群体身份表征的柔化改革，只有当它们实际上没有改变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时，才会显得具有变革性。也就是说，如果革命运动产生了他们自己编码的 (因此受限的) 价值观、本质意义和分割的领域，他们可能会通过合法化自己的身份/价值观而显得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但是，通过将他们的文化作为一种编码身份来表现，他们更容易融入到国家的过度编码或有利可图且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更大过程中。

“第二个错误”，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是心理上的，好像分子的 [领地的] 是在想象的领域，只适用于个人和个体之间。”但在这一行和另一行的社交实感是一样多的。” (1987:262/215) 也就是说，领土社会斗争可能不是国家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社会假想者”，可简化为心理或现象学上的假想者的案例。分段分配是真正的政治代表，即使它们不是由国家代表。12 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柔软分段的第一个危险是“偏执狂”的清晰。也就是说，

没有共振的相互作用。我们被困在一千个小偏执狂、不言而喻的真理和从每个黑洞涌出的澄清中，不再形成一个系统，而只不过是隆隆声和嗡嗡声，让任何人和每个人都失去了自我任命法官、正义分发者、警察的使命，社区党卫军。(1987: 279/228)

偏执狂是一种危险，革命运动可能成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新领土主义”：帮派、团伙、少数民族、边缘和“部落主义”，这些“继续肯定分割社会的权利”，但往往会持续存在于国家内部。这些新领土通过假定它们自己的问题、运动或身份具有编码的清晰性而保持相对独立。然而，独立的单一问题的斗争所提供的清晰度最终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替代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

这些现代古建筑极其复杂多样。有些主要是民间传说，但它们仍然代表着社会和潜在的政治力量 (从多米诺骨牌玩家到通过外国战争退伍军人的家庭啤酒)。还有一些飞地，它们的古老主义既能滋养现代法西斯主义，也能解放革命的力量 (少数民族、巴斯克问题、爱尔兰天主教徒、印第安保留地)……(社区的属地性，大群体的属地性，“帮派”)。其他的则由国家组织或促进，尽管它们可能会反对国家并给国家造成严重问题 (区域主义、民族主义)。(1983: 306 - 7/257 - 8)

这些团体的革命潜力不应被忽视。但是，政治孤立和单一问题的改革运动，没有更大的革命视野，很可能只是证明国家资本主义规则的例外 (见 Žižek 1997)。

革命实践中的第二个危险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微观法西斯主义”。经过编码的革命运动、团伙、帮派、宗派、家庭、城镇和社区可以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重建国家官僚层面的等级制、独裁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父权制、种族主义、古典主义等准则和片段都可能重新出现。

这些微型法西斯主义不会放过任何人。”德勒兹和瓜塔里警告我们，左翼组织不会是最后一个秘密制造微型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摩尔层面上很容易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甚至看不到你内心的法西斯主义者，你自己用个人和集体的分子维系、滋养和珍惜的法西斯主义者”（1987:262/215）。灵活的细分可能会破坏僵化的国家细分，“但它分解的一切都会在自己的层面上重新组合：微观俄狄浦斯、微观权力形态、微观法西斯主义”（1987:251/205）。

但是，当这些分割的过程开始在一个国家的过度编码过程中产生共振时，革命性的实践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2) 国家代表性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描述的第二种历史政治过程，我认为可以用来诊断革命实践，那就是国家代表。正如领土代表在融合和分裂的两极之间运作一样，国家代表也在两极之间运作：专制和司法。国家的第一极通过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过度编码”的过程将编码的领土带入同心圆的共振，而国家的更发达的司法极点则通过法律和“社会服从”来约束这些领土。前者创造了土地、工作和金钱的公共存量，以赚取租金、利润和税收；而后者创造了私有财产和法律契约，以便在具有对称关系的公民之间水平地流转土地、工作和金钱。国家的专制极点以过度编码和严格分割为特征，给革命运动带来两种危险：恐惧和机械奴役，而国家的司法极点则带来社会屈从的危险。我逐一考察国家的每一极及其对革命实践的危险。

(2.1) 专制国家极点

专制国家表征的特点是对领土编码的过度编码和对领土柔软段的刚性分割。这些多余的代码可能开始形成一种不受限制的积累（农业、社会、政治等），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维护，而不是通过通常会与其他代码块结成联盟的领土代表产生的多余代码。这种特殊的积累体随后会对这些领土作出反应，并使它们围绕着一个中心的超越点产生共振：暴君。旧社区和团体的延伸从属随后被专制者对其神的直接从属所取代，而横向联盟则被专制者与他人民的新联盟所取代。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

过度编码使得不同的点在一起产生共振，这些点并不一定是城市的极点，而是非常不同的秩序点、地理、种族、语言、道德、经济和技术特性。它使城镇与乡村产生共振。它通过分层运作；换句话说，它形成了一个垂直的、分层的聚集体，在深度维度上跨越了水平线。在保留给定元素的过程中，它必然会切断它们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这些元素成为外部元素，它会抑制、减缓或控制这些关系；如果国家有自己的电路，它是一个内部电路主要依靠共振，它是一个区域的复发，从网络的其余部分隔离本身，即使为此甚至必须施加更严格的控制关系，余数。（1987: 539 - 40/433）

因此，国家编码的特点是集中积累，不同秩序点的强制共振，“[en étendant] 在所有方向上布局一个可分割的均匀空间”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272/223)，并通过其垂直和冗余中心 (顶部)，扫描所有的半径。暴君或皇帝的形象，正如他在《千高原》中被称为的那样，是“唯一的和卓越的公共财产所有者，盈余或存量的主人，公共职能和官僚机构的来源” (1987:533/427-8)。国家是一种纽带或结，它使多语政治派别摆脱领地，迫使他们进入一种过度编码的新体制。

正如有三种柔性分割一样，Deleuze 和 Guattari 也描述了适合于分层过程的三种刚性分割：二值分割、圆形分割和线性分割。二元柔顺分割由多个二进制定义，这些二进制总是由第三个二进制 (两者之间的联盟) 决定，而二元刚性分割是自给自足的，并确保一个部分的流行程度高于另一个部分 (层次结构)。然而，圆形柔化段并不意味着相同的中心，而是多个中心 (圆形但不完全圆形)，圆形刚性段形成了围绕旋转轴的同心圆的共振，汇聚在一个单一的累积点。线性柔性分段通过“正在进行的分段”、线形 (但没有直线) 和柔性形态结构发挥作用，而线性刚性分段通过围绕其通过的主要分段几何组织的均质分段发挥作用：空间 (space) 或时空 (spatio)，而不是地点 (place) 或领土 (territory)。

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全球整体，但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暗示着一个并列的、叠瓦状的、有序的子系统的配置：一个整体的微观政治结构 (教育、司法、经济、家庭、性)。正如福柯类似地观察到的，静态 (statistatification) 最普遍的特征在于围绕一个主权机构组织这些微观政治艺术 (福柯 2007:11-12)。因此，等级制度不只是简单的金字塔形，它是微分的，因为领土和国家分布是“不可分割的、重叠的和纠缠的……”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259-60/213)。

(2.2) 国家代表性对革命实践的危害

我认为，专制国家代表至少会给革命实践带来两大危险：恐惧和“机械奴役”。专制政权制造了分裂的普遍恐怖和偏执，只有通过超凡的团结才能解决：“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让主管来决定。Deleuze 和 Guattari 说：“细分越严格，我们就越放心。”国家常常宣布“紧急状态”，以便中止正常法律，制止骚乱、示威或潜在的革命。国家对人民起义的反应越暴力，人民在国家的保护下就越“安全”。革命本身也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党国机器，使每个人都成为一台巨型机器的一部分。德勒兹和瓜塔里说，“当人类自身是机器的组成部分时，就存在奴役”，而机器是在更高统一体的控制和指导下，由人类自身和其他事物 (动物、工具) 组成的 (1987:570/456-7)。俄罗斯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革命转变为国家机器的例子。

(2.3) 法律国家极点

在国家过度编码过程的另一个极点是城邦的司法极点，由其主题变化和社会服从的危险来定义。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虽然专制国家当然包括城镇，但这取决于该国对外贸易垄断的程度，城镇分布往往“在该国过度编码自身引发解码流时自由释放” (1987:541/434)。他们说，东方帝国创造了大量库存，贸易城镇 (如古雅典) 可以利用这些库存，而不必建立自己的

库存 (1987:539/432)。因此, 通过这种自治, 或者通过从亚洲生产的专制国家形式中解放出来的公司和商业网络, 司法城镇的分布形成了主体连接。

由于专制的僵化的分割会释放出被解码的工作人员的流动, 这些工作人员是收税、租金和利润、维护法律和治安所必需的, 因此, 法律联合会利用并产生这些流入城镇的流动, 但又会使它们无法汇聚在一起。主题连接是城镇固有的权威或法律结构, “站在如此多的结或编码” (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64/452), 并作为与国家共振的独特焦点。然而, 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营地、防御工事和“边界线”, 取代了之前正在发展中的领土部分。因此, 帝法经历了一次变异, 成为主体性、规训性和契约性的法律。与相对统一的帝国极点不同, 第二个极点呈现出最多多样化的形式。但是, 尽管个人依赖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 它们总是标记着限定的和局部的连词”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563/451)。

(2.4) 法律代表性对革命实践的危害

当更高的统一性构成了人类主体, 与现在的外部对象 (可以是动物, 工具, 甚至是机器) 相联系时, 就有了服从。人不再是机器的组成部分, 而是一个工人, 一个用户。他或她受制于机器, 而不再被机器奴役。(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70/457)

司法主体化的过程将人视为外部机器的主体, 而不是巨型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革命实践的风险要么是服从于司法代表, 将其作为反抗专制国家的一种形式 (诉讼、人权、法律代表等等), 要么是在自己的自治领土上重新建立司法代表 (人民司法、毛主义人民法院等等)。法律、契约和惯例约束和培养公民。这些法律然后由地方革命官员执行。

个人是合同的使用者, 是动物、工具和机器的工人, 而不再只是巨型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是机器的使用者, 因为他们是法律主体的前后一致性而结合在一起。但这种服从的平等主义自命和人性化不应掩盖地方权力、等级和司法代表纪律机构的集中化, 以迫使主体之间的协调。

(3) 资本主义代表性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描述的第三种历史政治过程, 我认为可以用来诊断革命实践, 那就是资本主义代表。德勒兹和瓜塔里用编码和微型法西斯主义来定义领土表征, 用过度编码和机器奴役来定义专制表征, 用主题变位和社会从属来定义司法表征, 他们用公理化和机器奴役的新形式来定义资本主义表征。

(3.1) 公理系统

德勒兹和瓜塔里通过公理化的过程来定义资本主义表征。一个公理, 他们说, 是一个独立或脱离的点, 迫使不合格的元素成为同源的数量关系 (1994:130/137-8)。他们说, 公理不是理论命题, 而是“作为组成部分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组合的操作陈述” (1987:575/461)。也就是说, 德勒兹和瓜塔里并不把“公理化”这个词当作科学的“隐喻”; 社会公理 (Social axiomatics) 不是从科学的、数学的或逻辑的公理 (axiomatics) 推导出来的, 14 而是相反的: 它就是真正

不言自明的是社会机器本身，它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和它的目标，取代了旧的编码，并组织所有被解码的流，包括科学和技术代码流（见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3: 299/251）。

所以代码决定了流动的性质（地点的类型，商品的类型，活动的类型）并在这些不可通约的，限定的，流动的，有限的代码和超编码（以及主体连接）之间建立间接关系（联盟）通过经济外力量（政治或法律）捕获并重新编码这些流动，资本主义公理在纯不合格（解码）的流动之间建立了严格的经济上的一般等价。

然而，德勒兹和瓜塔里说，公理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因为它与资本主义本身是一致的。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是后代或结果，它仅仅确保了公理的规范它监督或指导公理的饱和和相应的极限扩大（1983:300/252-3）。资本主义公理学创造了被剥夺其品质的社会过程的非数量化的有限表征。它们相互独立，加、减、乘，形成或多或少的饱和市场，创造财富。

与其他政治类型一样，两极也形成了资本主义分配。资本主义在一个极点不断解码的东西，在另一个极点公理化了（1983:293-4/246）。德勒兹和瓜塔里给出了构成资本主义公理化的“解码流”的几个例子。对于自由工人而言，解码意味着：（1）通过私有化使土壤变得贫瘠，（2）通过家庭解体而丧失消费手段，以及解码工人有利于工作本身或机器（工业生产）。对于资本而言，它意味着：（1）通过货币抽象实现财富的解域化，（2）通过商业资本解码生产流，（3）通过金融资本和公共债务解码国家，以及（4）通过工业资本形成解码生产资料（1983:266-7/225）。

虽然地域代表性“意味着”合格的劳动与特定数量的抽象劳动（创造给定人工制品所需的劳动）相对应，国家交换引入了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正式联合了“部分对象”（商品和服务），其超编码价值由非资本主义（帝国或司法）决定，既不解码或取消交换的程度，资本主义。

德勒兹和瓜塔里举例说，在罗马，可能存在着财产私有化，通过巨额财富的形成来解读金钱，通过征用和无产阶级化来解读生产者。但是，尽管有这些被解码的条件，它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在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政权中加强了封建办公室和关系（1983:264/223）。资本主义进一步。一方面，它通过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私有化，自由贸易，广告，劳动力和资本的解放，帝国主义，解码了定性关系；而且，在另一极，它公理化它们为“市场产品”。

然而，在这里，关键是不要犯 Slavoj Žižek 的错误，即认为所有的“解码流”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贡献（Žižek 2004: 184）。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得出相反的结论：解码后的流必然是革命性的。对解码流配置的斗争是一场革命性的斗争，远不能预先决定。革命实践努力将被解码的流动统一起来，而资本主义努力将它们“绑定到一个世界公理中，这个公理总是反对带有新的内部限制的被解码的流动的的革命潜力”（Deleuze 和 Guattari 1983: 292-3/246）。这场斗争的细节将在第三章详细阐述。

因此，资本主义由两种被解码的流动构成：一方面是摆脱农奴制、能够出售其劳动力能力的裸劳动力流动，另一方面是独立于土地财富、能够购买劳动力的纯资本流动。第一种“起源于简单的流通，货币发展为支付手段（固定日期到期的汇票，构成一种货币形式的无限债务）”（1983:272/229），并作为“收入”分配给工薪族购买产品和服务。第二种是记在公司资产负债

表上的货币，它是以汇票而不是货币的流通为基础的。这第二种货币构成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无限债务。

金融资本不是将先前存在的货币用作支付手段，而是银行自发创造的一种瞬间创造性流动，作为欠自己的债务，是一种从零开始的创造，在全身的一个极端掏空了负货币（作为银行负债输入的债务），而在另一个极端，则是一种积极的货币（银行为生产性经济提供的信贷），“一种具有突变力量的流动”（fluxápuvoir 突变体），不进入收入，也不分配给购买，一种纯粹的可用性、非占有性和非财富。（1983: 282/237）

这种通过外汇和跨境流通的所谓无国籍货币群体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普世组织，在许多方面不受政府决策的影响。例如，仅在美国流通的货币中就有 96% 是金融资本。这些钱并不是以具体的支付或交换货币的形式存在的，而是银行（向其他银行或其他投资者）以特定利率贷出的信贷或投资货币。这些投资资本在任何特定时刻的“价值”取决于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投机、欲望、预测、利率、股价等，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地预测。在任何时候，美国银行都被要求拥有不少于其总金额 3% 的款项作为支付款项，用于分配银行取款。¹⁵

这种货币类型之间的二元论——“支付手段的形成和融资结构，货币管理和资本积累融资之间的二元论，交换货币和信用货币之间的二元论”（德勒兹和 Guattari 1983: 271/229）——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但这种不合格的货币流动如何被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量化呢？

如果把资本主义公理仅仅定义为“解码流的抽象量化”，那将是对德勒兹和瓜塔里分析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量化金融资本的创造性流动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困难：“没有人确切知道在这个投机性的、不存在的货币总量上的界限在哪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领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量化是基于不合格劳动力流动和不合格资本流动之间的“差别结合”。也就是说，简单的“量”作为独立术语（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变量关系，具有了独立性。无数的量化不再取决于被交换的条件的独立性质，而取决于这些具体条件。正如公理保持“独立”和“脱离”于它们的社会或数学证明一样，资本主义市场也独立于它们的资格来决定商品的数量价值；也就是说，它“自然地”决定了它们。

因此，当资本不再是联盟资本（两个限定条件之间的变量关系）而成为从属资本（抽象数量的独立决定）时，资本主义机器就开始了。在从属资本中，“货币产生货币，或价值剩余价值”（1983:269/227）。资本主义的“差别结合”，正如德勒兹和 Guattari 所描述的，正是这种“差别关系”的公理化，“Dy 来源于劳动力，构成可变资本的波动，Dx 源于资本本身，构成不变资本的波动（“不变资本的定义绝不排除其组成部分价值变化的可能性”）’（1983:269-70/227-8）。该关系是差分的（dy/dx），因为两个术语都已解码且不合格。但德勒兹和瓜塔里用同一个分析单位衡量（量化）这两个数量级，即不存在的（不合格的）金融资本和可变的（不合格的）劳动力，声称资本主义公理学是“纯粹的虚构，一种宇宙骗局，就好像我们要用米和厘米来测量星系间或原子内部的距离一样”（1983:273/230）。

这些“宇宙小说”是无止境的利润积累的基础。与由劳动能力和劳动能力创造的价值之差定义的法典中的剩余价值不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外溢”是由两种内在流动(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来定义的。劳动能做什么和它能卖什么之间的差别就是它的利润。但是，通过对劳动和资本的完全解码，并将它们不可通约的关系公理化，资本主义能够产生“过剩”或利润，而不受某些代码(或品质)所造成的限制。“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公理化，并在世界市场上流通。根据资本主义公理，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利润积累已经从任何外部限制中释放出来。

(3.2) 革命实践公理的危险

公理化的第一个危险是它利用了一台世界性的战争机器，该机器旨在根据对行星资源的开发重组整个世界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战争显然遵循着与资本主义相同的运动”(1987:582/466)。金融资本在公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意味着现有资本的贬值和新资本的形成，以国家作为实现模式的战争机器的速度体现出来，“积极促进世界的再分配，这是开发海洋和行星资源所必需的。”资源。战争的力量总是使系统饱和，这是它的必要条件“[La puissance de guerre venait toujours sursatures La saturation du systemème, et La conditionnait (战争的力量总是超过系统的饱和，并制约着它)](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82/466)。国家不再占有战争机器，而是构成了一个战争机器，它们自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战争机器。德勒兹和瓜塔里说，随着各国增加军事、科技支出以吸收或补偿公司的巨额剩余价值，它们发现自己的新目标是恐怖或解域的绝对“和平”。

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以有组织的不安全感对抗“未指明的敌人”。革命实践的危险在于，这台战争机器与国家不同，没有可以“推翻”的中心。因此，资本主义抵抗必须采取与仅仅夺取国家完全不同的形式。

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危险是，作为目的享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抽象财富及其以消费以外的形式实现的唯一目的。当专制国家有反生产的皇帝来消费剩余时，资产阶级的内在领域就没有这种外部限制，而是把反生产整合到生产本身之中。它建立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奴隶制，一种前所未有的征服。不再有主人，只有奴隶在指挥其他奴隶，社会机器的奴隶。资产阶级设置示例，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

他吸收剩余价值为目的，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与自己的享受：完全奴役比最低的奴隶，他是第一个仆人的贪婪的机器，资本的再生产的野兽，内化的无限债务。‘我也是奴仆’——这是主人所说的新话。(1983: 302/254)

司法国家主义的社会屈从与市场对国家的机械奴役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机械奴役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国家和资本家都只是没有人控制的更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过剩的盈余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享受，而只能通过其他机制吸收。革命实践的危险在于被这个过程所奴役。

在回答“历史和革命的关系是什么?”，我在上一节中曾说过，我所称的“回归革命”，受德勒兹和瓜塔里政治哲学的影响，较少用必要的历史继承理论（无论是按时间顺序的还是辩证的）或纯粹偶然的历史决裂理论来描述，而是对多重共存的政治危险进行历史-政治诊断，然后被革命实践所取代。德勒兹和瓜塔里是第一个为诊断分析理论奠定哲学基础的人，该理论基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政治形式的拓扑混合。今天，政治斗争的领域不再像国家、无产阶级、资本等等那样，由一个单一的或中心的人物所支配，不能引导一切革命的分析。

更确切地说，它更像是“一幅有史以来人们所相信的一切的杂色画”（1983:42/34）。因此，挑战在于理解并避免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政治代表过程，并创造新的东西。但到目前为止，这一章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质疑。在下一节也是最后一节中，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萨帕塔主义找到多中心政治诊断的平行实用发明。

三、萨帕塔主义对痛苦的诊断

萨帕塔主义是最早也是最持久的非代表性革命之一，他从“不存在单一的斗争战线”的角度来诊断政治权力。因此，萨帕塔主义者回归革命的特点是，在对政治历史进行多中心诊断的基础上，对权力进行实际分析。这种分析的动机是相对排斥所有以前的历史表现形式，无论是在形式（编码、过度编码和公理化），还是在内容（父权制、种族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先锋主义等），以及对其内在诊断的关注。萨帕塔对这些过程的排斥和诊断通过马科斯在 La Otra Campaña 中使用的所谓“痛苦诊断”的实践得到了证明。在这场运动中，萨帕塔主义者走遍墨西哥各地，倾听和关注人民的问题和苦难。萨帕塔，与中间派或先锋队分析相反，他们围绕一种特权的方法/科学、地点或斗争的维度，而是提供一种包容性的交叉分析，这种分析不一定特权于任何单一的方法、战线或斗争的地点。在马科斯看来，

革命是一个包含不同方法，不同战线，不同层次的承诺和参与的过程。这意味着所有的方法都有其作用，所有的斗争战线都是必要的，所有各级的参与都是重要的。这是一个包容的过程，是反先锋和集体的。革命的问题（注意小写字母）不再是组织、方法、独裁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所有那些认为革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他们的成就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人。（马科斯 2004 b: 164）

甚至萨帕塔人自己的起义也形成了一个“混杂的历史配置”。想想他们从墨西哥历史（Emiliano Zapata 1910—1917 农民起义）历史中选择的一些方式，损坏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些组成部分（红星，用语“同志”等等），他们自己的土著历史的一些组成部分（共识决策、自治村庄网络等）以及未来的一些组成部分（非新自由主义未来的承诺）构成了他们自己政治事件的历史大杂烩。在下文中，我认为萨帕塔主义者使用了一种实用的诊断方法来理解和抵御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平行历史拓扑中发现的三种共存的政治危险：领土编码、国家过度编码和资本主义公理化。

萨帕塔主义和领土代表性

到 2004 年，萨帕塔人已经输掉了许多战斗，但他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尊严和自治。正是在这个时候，萨帕塔人也将其关键诊断转向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形式。他们开始研究他们的运动创造政治代表形式的各种不同方式：不是在国家或首都的传统层面，而是在领土层面。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对自己的革命实践进行多中心或交叉诊断。”“有两个错误，” Subcomandante Marcos 在 2004 年的一份公报中说，“似乎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政治工作中（并且与我们的原则明显矛盾）：一方面是妇女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政治军事结构与自治政府之间的关系”（Marcos 2004a）。这两个错误/危险在历史上一直被革命运动所忽视，部分原因是它们是更灵活的非国家社会力量，被辩证和叛乱历史理论所忽视。萨帕塔主义者拒绝了唯一重要的革命实践是国家、无产阶级等的历史进步这一前提，他们试图诊断和阻止领土编码的过程。但早在 1983 年 EZLN 抵达萨帕塔主义之前，萨帕塔革命中的父权制问题就已经存在于土著社区。

在扎帕蒂斯莫之前，妇女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强奸或早婚导致的性虐待十分普遍，家庭暴力居高不下，生育大家庭毁坏了妇女的身体，并通过家务使她们承担了繁衍后代的重大责任。此外，他们还被期望减少食物摄入量，以便丈夫和孩子能够吃得饱饱的，尽管即使这样也无法阻止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简言之，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实际上是奴隶。（雅库布 2000）

这种父权制使用地域编码的过程。从地球的解码流中选择（族谱上）某些父权和子嗣的等级编码的男性股系，并在某些地方通过暴力（家庭或其他）分离，以创造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基本种族、性别和空间边界/身份，以及土著民族的不同血统。然而，在没有形成所有这些代码的完全融合的情况下，剩余的代码（一个未婚女性）随后被用来通过包办婚姻在男性分支之间形成巡回联盟。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男人通过女人建立自己的联系；通过男女分离（这总是从属关系的结果），联盟将来自不同从属关系的男性置于联系之中。预先给定的男性权力和暴力的线性编码在每一个新的联盟中被重复和呈现。

但是，通过允许女性“叛逆者”和“指挥官”，EZLN 的政治-军事结构（绝不是完全平等的）通过允许“年轻的土著妇女到山区去，更多地发展她们的能力，创造了这种父权制和联盟的相对解码，[造成] 社区的后果（Ramírez 2008:312），并给予她们”选择伴侣而不[被迫]结婚的权利”，”担任组织领导职务和在革命武装部队中担任军职的权利”，以及解放阵线的”妇女革命法”所规定的其他权利（解放阵线 1994 年）。这些法律正越来越多地通过新的妇女联盟（工艺合作社、妇女委员会等）在自治乡执行。然而，对某些父权传统的解码有创造一套新的先锋队军事编码的风险，因此出现了第二个领土错误或危险。

这些组织通过分离、选举和剩余选择来运作：他们分离一个被认为是专家的先锋队；他们选出了有纪律、有组织、有等级的无产阶级；他们选择一个残余的次无产阶级去排斥或再教育。（2004 年德勒兹:278/198）

正如德勒兹所警告的那样（而且民族解放阵线非常清楚），居住在山区的民族解放阵线指挥官的分遣队（特别是从 1983 年到 1993 年）负责选举/招募 campesin@s 从需要纪律、组织、等级划分的村庄到 EZLN，然后创建剩余的 campesin@s 在不断扩大的循环分割中被排斥/再教育，有可能产生新的军事法规，破坏萨帕塔人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正如马科斯所说，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民族解放阵线应该陪伴和支持人民建立自治。然而，伴随有时会变成管理，建议变成命令，支持变成阻碍。我之前已经说过这样一个事实，即等级、金字塔结构不是土著社区的特征。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政治、军事和秘密组织，这一事实仍然破坏了应该而且必须民主的进程。（马科斯 2004a）

萨帕蒂斯莫的父权制和军国主义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微观法西斯主义的两个例子。微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可以在革命性的实践中被诊断出来：“一切 [柔化的分割和编码] 被 (在国家层面上) 拆除的东西，都在自己的层面上重新组合起来: 微俄狄普斯、微权力形态、微法西斯主义”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251/205)。Zapatismo 作为一场革命运动，也有可能成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偏执狂”的牺牲品，成为一场为争取土著权利而进行的严格的种族斗争。割裂的社会、土著人民、帮派和少数民族，没有“共同加速”或超越其个人事业 (土著人权利等) 狭隘的“不言而喻的界限”的团结，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国家消灭，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国家的“轰鸣声或嗡嗡声”。作为一场具有交叉诊断意义的革命运动，萨帕塔通过将他们的斗争普遍化，并使之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斗争，拒绝了这种偏执狂，包括参与这场斗争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萨帕塔!”¹⁶ 但是，集权化的过程对萨帕塔主义起义构成了什么危险呢？

萨帕塔主义和专制国家代表性

除了对地区编码进行诊断外，Zapatistas 还对国家过度编码的危险进行了重要的、直言不讳的诊断分析。它对他们革命实践的繁荣有什么外部和内部的危险？墨西哥政府行政部门中的专制国家代表（过度编码）旨在迫使土著“活动”投入工作，从其社区榨取税收，通过强制迁移和向大型土地所有者 (Latifundista) 重新分配土地，使其领土 (州、城市、街区和自治区) 形成同心的政治共鸣，成为可交换和可出租的土地，并建立外汇储备，将其兑换成货币 (比索)，大部分由政府扣留 campesin@s。虽然现代墨西哥国家肯定不仅仅有专制成分，但其专制成分或多或少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有可能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奴役在工作模式中。因此，国家代表权通过强制方式创造了土地、税收、工作和交换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私有化和全球流通这一特定资本主义公理的出现是必要的，与国家的工作模式不同。

根据萨帕塔的说法，任何国家，只要集体行动成为中央行政权力的代表或相似之处，就会对革命斗争构成类似的危险和被俘获的威胁。就墨西哥而言，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 (由大地主控制，通过制糖，咖啡和橡胶生产) 创造了一种不受限制的积累，需要一个专门的 (政治军事) 机

构来管理它，用专制者或总统的直接领导取代旧的多直系社会。因此，墨西哥的行政系统在一个单一的等级和超越的统一体下，形成了一组非常多样化的点（地理、种族、语言、道德、经济和技术）。

墨西哥政府不是通过反对对不同的领土代码进行过度编码来获得领土，而是通过统一一系列叠瓦状的微政治系统。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大型公共工程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国家的等级制度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由无数编码的领域垂直地维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萨帕塔主义将这种危险视为一种外部危险，因为国家过度编码，尽管它在法律上声称要谈判（对 San Andrés Accords 的背叛），17 不能接受解码流或编码流，这些流与它的中心统一没有共鸣。因此，国家的目标是消灭它们，或将它们作为中央机器的从属部分带入共振。18

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由州政府指挥的准军事乐队和州警察发动了袭击，造成 6000 多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Ramírez 2008:162）

在 1998 年的这七个月里，暗杀、恐吓、数十人被捕、酷刑和监禁、军事和准军事骚扰、数千人流离失所、烧毁自治乡是家常便饭。（Ramírez 2008:175）

然而，萨帕蒂斯莫也面临着中央集权主义过度编码的危险。无论是在早期（1983 年）的先锋战略中，以军事推翻墨西哥政府并以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常见的革命方式夺取政权，还是在后期（1994-2007 年）的战略中，在不成为党派或政党的情况下干预选举政治，Zapatismo 都冒着过度保守的风险。虽然萨帕塔主义者真正夺取国家权力的可能性很小，但复制过度编码过程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正如马科斯所说，可能发生在 EZLN 上的最坏情况是……将会掌权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马科斯，2001 年 1 月 1 日）。

每一个先锋队都想象自己是大多数人的代表。我们不仅认为这是错误的，而且认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公然的篡夺。当社会力量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很明显，先锋队并不是真正的先锋队，它所代表的那些人并没有在其中认识到自己。（马科斯 2001 c）

根据马科斯的说法，墨西哥的州代表制和严格的分割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偏执的恐惧，他们担心如果土著居民获得自治权，国家安全就会崩溃。政府威胁说，只有僵化的政府部门不占上风，战争才会继续。政府声称，这种恐惧只有在每个人都服从于政府精心策划的机器奴役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但这只是美国面临的危险的一半。萨帕塔主义也面临着被置于国家司法权之下的危险。

萨帕塔主义和法律国家代表性

尽管萨帕塔主义者早期对在墨西哥各地建立土著人民的合法权利和代表权很感兴趣，但他们仍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满足和/或重新定义他们的要求，就可能仅仅被纳入国家的司法规范。

马科斯将司法国家描述为“包含人民斗争和他们的要求，并通过司法规范来规范这些要求的满足和/或他们的重新定义的方面”（马科斯 2004b: 311）。一旦革命的要求得到满足，革命就结束了，它被过度编码，成为另一个法律主体。

此外，墨西哥专制/联邦政府的过度代码无法完全捕捉到的东西（自治农民运动、地方法律、个人合同、国家工作人员、税务人员和当地牧场主），萨帕塔主义的其他非官方权力渠道，如准军事集团和首领（当地自封的老板和地主），能够对该地区固有的法律结构进行重新编码。更灵活，更多样化，更个性化，这些国家的记录焦点都是不断与农民和土著运动协商的过程，没有给予他们自治权，制定地方法律，比如不允许 campesinos 在圣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的街道上行走，骚扰和虐待的名义萨帕塔主义者社区’ tax 配置”，法律制裁的准军事组织负责 Acteal 大屠杀（当联邦军队 200 米开外没有）（拉米雷斯 2008:164），和基金当地既然农夫

交付的一些基本要求和调解自己的需求。他们通常是年纪较大的男性，参与当地的商业活动，并以调停者而闻名，通常能获得一些地方政府的资金。许多人是 PRIistas，大多数是腐败和暴力的，他们都认为自己“为人民服务”。事实上，它们有助于遣散和镇压农村斗争，对地主来说是无价的。（雅库布 2000）

但是，在市政厅、私人财产所有者和地方执法机构中发现的这种法律调解和民主主张，不应掩盖司法代表的真正纪律机制，这些机制是为了迫使萨帕塔主义（Zapatistas）等革命主体进行协调（录音）。

萨帕塔主义和资本主义代表性

萨帕塔对资本主义的政治诊断，并不比他们对权力的其他分析更具有中心意义或基础性。萨帕塔社群中父权制和军国主义的地域编码，国家主义者对恐惧、战争和中央集权的过度编码，以及法制化和地方管理的司法编码，都是同等重要的危险，需要在其革命实践中加以诊断和避免。正如他们所说，“所有战线都很重要”，而不仅仅是反对国家权力或资本主义的战线。也就是说，他们确实有资本主义代表的诊断。

在萨帕斯，之前的（1876 年）非创新的地方资本形式（私人牧场主和棉花、糖和咖啡大庄园）将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合作社（公共生产单位）变成了收入微薄的日工（也就是说，上世纪 70 年代，新积累模式（自由/不合格的劳动力和流动解码资本）取代了季节性就业的劳动者或债务劳动者（比奴隶高不了多少）。随着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国界中解放出来，转变为高度流动的金融资本，投资从北美和墨西哥的工业中心地带涌向环太平洋经济体（Yakubu 2000）。

此前在萨帕塔需要极少量准奴隶劳动和大片土地的当地农民和牧场主现在正在出售他们的土地，为该地区作为水力发电、石油、生态旅游、专利基因技术和铀用于国内和国际积累的新的资源让路。（雅库布 2000）

虽然它可能只是这一积累的一小部分，但 Zapatismo 自己已经在几个方面变成了一个市场，这是它非常清楚的：作为一个革命的旅游目的地，作为一种文化商品，作为革命媚俗的内容销往世界各地（甚至由那些不同情 EZLN 的人），如萨帕塔娃娃，海报，t 恤和避孕套（“为那些崛起的人”）(Kersten 1997)。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过程用一只手解码（土地、家庭、工作、财富、国家和生产），20 它们不断地用另一只手公理化。通过将 Chiapas 先前加密和加密的关系私有化，并将它们全部出售或在世界市场上投资，它们的“品质”或“独特的特性”已经完全相对于一个跨国普世组织的投机投资模式（它们自身相对于抽象的“市场力量”）(Yakubu 2000)。资本主义代表，作为这些被解码的流动的不合格的 campesin@ labour, Lacandón 丛林，河流，文化（参与式民主，萨帕塔主义抵抗等等）和被解码的金融资本流动（世界股票投机，银行金融，另一方面，国际投资等等）将两者固定为一个抽象的“微分”量化或公理等价，以实现利润的唯一目的。

“萨帕塔战争”是墨西哥国家如何通过“积极参与开发海洋和行星资源所需的 [萨帕塔] 再分配”而成为“实现国际资本的模式 [或公理]”的一个例子（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82/466）。

就萨帕塔而言，在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交汇点上，州和首府高度交织在一起。正如马科斯所说，全球范围内的土著人口（超过 3 亿人）所处的地区拥有地球上 60% 的自然资源。重新征服这些领土是资本主义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富恩特斯 2007）。墨西哥国家现在少一个专用的战争机器（常备军），而是形式仅参与更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战争机器旨在确保公理化的非限定流，油、水、生物起源的代码和萨帕塔主义者抵制文化的交流在全球市场。21. “新自由主义”，正如马科斯所说，“是对灾难的灾难性政治管理”（马科斯 1995）。然而，德勒兹和瓜塔里所称的这种资本主义机械奴役的新形式，并没有从萨帕塔的“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屠杀、人道主义危机和生态破坏中获得多少乐趣。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公理化剥夺了所有其他享受的编码价值的资格，除了一个先决条件，即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奴役的表征：抽象的财富积累。萨帕蒂斯莫面临着外部资本主义对萨帕塔的资源开采战争，但同时也面临着文化产业对其抵抗的内部挪用。

但在这里，读者可能会想，如果萨帕塔主义者突然拒绝使用他们之前的多中心诊断方法（例如，如果他们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这种对萨帕塔主义的分析是否会遭到严重破坏。因为我并不是说萨帕塔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典范，而是说他们创造的实践可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动员这些实践，而不必遵从他们斗争的“权威”。无论萨帕塔主义者是否继续使用，多中心的政治诊断仍然是一种曾经有用的做法，而且可以被其他人进一步采用。

结论

在当代回归革命中，历史与革命的关系是什么？简而言之，我认为政治史被战略性地用作一个多中心的政治诊断，以发展一种非代表性的革命实践。为了捍卫这一观点，我引用了两位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具有影响力的早期人物：德勒兹和瓜塔里，以及萨帕塔。德勒兹和瓜塔里是最早为分析压迫的连锁形式而发展哲学基础的人之一，这种分析基于多重、异质的政治权力轴的拓扑结构，在内容（阶级、种族、性别等）和形式（编码、过度编码、公理化）。与基于国家的政治主体及其表征的继承和必然性的普遍历史相反，政治拓扑将历史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折叠和重新折叠的表面。事件不是由时间或辩证的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由时空偶然性和彼此之间的接近联系在一起。没有统一或同一性，政治历史因此能够产生非代表性的革命政治形式。然而，除了单纯肯定革命的历史潜力之外，我的论点是，这种历史的拓扑图应该作为一种诊断，用来评估革命实践本身所面临的危险。

实际上，萨帕塔主义是第一个和最持久的非代表性革命努力之一，从“不存在单一的斗争战线”的角度来诊断政治权力。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类型的权力威胁到他们的自治和自决，而是历史上几个不同进程的混合，以重组的形式共存，包括外部和内部的斗争。没有单一的前线或轴心来推动权力的运转，也就没有单一类型的边缘化主体，也就没有单一的轴心或轴心来辨别历史的方向、批判或目的论。需要诊断和重定向的多样性是不同类型的。我的观点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预言力，也没有确定的世界史，萨帕塔主义的革命已经变成了偶然的、不具代表性的、灵活的，就像一个折叠的拓扑形状。萨帕塔的农民起义可以发生在过去，直接民主可以发生在未来，两者都可以直接影响到现在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Zapatismo 是对过去的创造，同时也是对未来的怀旧。

这些论证分三部分完成。第一本概述了两种普世历史理论（继承性和偶然性），并提出了质疑，说明了这两种理论都未能构想出替代代表性政治的可持续方案。第二章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拓扑学中，依次提出了革命历史概念的四个基本特征。然后，我扩展了这一理论，认为它应该被用作一种政治诊断，这种诊断基于三种偶然的、共存的、可重组的政治过程：领土编码、国家编码和资本主义公理化。每一种类型依次发展，以显示它们如何影响革命实践。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展示了萨帕塔是如何在他们的“痛苦诊断”的基础上进行多中心政治诊断的。然而，仍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具体的革命性干预过程来改变这种表征过程的折叠交叉。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2 干预与未来前路

与历史不同，生成不能用过去和未来来概念化。生成革命者仍然对革命的未来和过去的问题漠不关心；它在两者之间传递。每一个变化都是共存的一部分。(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358/292)

引言

在第一章中，我认为政治史应该作为一个多中心的政治诊断来建构一种革命实践。但是，革命性的事件是如何从这种表征过程（编码、超编码、公理化）的多价交叉中出现，并维持某种新事物的？这些过程是如何被“其他方法”阻止的？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历史拓扑概念以及我提出的多中心诊断概念都没有回答这个重要问题。虽然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拓扑理论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诊断政治代表的三个过程的工具，但它无法解释这些过程是如何被革命性的干预所取代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政治安排是由多个共存的过程（呈现不同程度）组成的，就像对事件的内在诊断所识别的那样，那么该如何改变局势？我们如何评估这种干预的风险？谁和什么在干预，他们干预的依据是什么？

因此，本章分为三节。在第一节中，我认为，当代革命的回归既不是由对先前存在的政治弊病（代表性过程）的简单反应来定义的，也不是由与主导地位的绝对叛乱决裂来定义的。在第二部分中，我认为当代革命的回归是以一种转变为特征的，这种转变是通过对事件的预兆、联系和浓缩的仔细劳动而产生的，它将安排中似乎不存在和不可见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存在和可见性。这一革命性干预的过程带来了一个新的当下世界的存在，这不是因为过去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新未来“即将到来”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在一个“将要到来”的未来中构建一个新的当下。我在这里的论点是，这种预先设定的策略能够提供一种替代反对派和暴动提出的变革方法的方法。为了帮助制定这一预先战略，我借鉴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两个概念：艾涌 Aiôn（未来时间）和解域化（他们的变革理论）。在第三节中，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借鉴了扎帕蒂斯塔在创建和维持布恩·戈比尔诺军（善政委员会）方面的实际部署。

一、革命与政治干预

反对/否定

政治干预可以通过反对或否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安排来创造变革。考虑到定义政治主体和客体领域的特定编码、超编码和公理的混合，反动势力可以进行干预，但必须首先接受即将改变的政治问题的预先给定参数：他们必须先验地接受他们所反对的事物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以这种方式，革命干预和变革旨在改变这种统一。他们通过接受提出政治问题的条件，然后改变其关系，干预合法政治进程（领土、法律、经济等）的内部发展和转变。

在更传统的革命斗争中，对立的干预可以从夺取国家机器并将其官僚、法律和军事机制重新用于其他目的的目的论命令中看到。然而，在这些斗争中，保持不变的是对集体社会组织最初参数的认同：等级制度、军国主义和国家官僚主义。在更多的社会民主斗争的情况下，这种法律和经济进程的内部改革反对现有的代表机制，不是从不同的非代表的角度，而是以纠正政治上的错误代表为目的。其变革性干预的目的是越来越准确地表达尚未表达的差异。虽然这一战略可以作为更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阵线或层面，但它本身只接受政治生活和代表性的特定条件。

然而，这种对立的干预始终是一种内在的差异：一种对立的差异被纳入到国家机器、经济市场或新身份的统一之中。因此，革命性的反对派可以创造政治变革，但这种变革必须是代表制度内部的变革：一次新的选举，一个新的更环保的资本主义市场，或者一个新的、更民主的国家机器。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干预倾向定义为，在不改变政治问题本身的基本条件和坐标的情况下，修改一个现有的对象和身份领域。

起义与新事物生产的革命条件

在《事件、生成和历史》一书中，保罗·巴顿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革命反对派的方案。“（革命）远不是一个特定的预先存在的事件的现实，”巴顿争辩道，“（革命）是“偶发事件”的爆发，纯粹的偶发事件或变成：绝对的解辖域化”（巴顿 2009:43）。我们并没有简单地将革命事件定义为对现有政治条件（身份，主体，权利，私有财产等）的反对或内部改革，这些政治条件会预先设定在一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新形式的集体行动，巴顿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提供了一种基于差异或解辖域化的革命理论。

德勒兹将纯粹事件定义为每一事件逃脱其自身实现的那一部分。这种意义上的纯粹事件是历史思想的最高对象。这是必须从历史的观点来思考的问题，但同时，这是永远不能或永远不能彻底地思考的问题，因为它只是通过实际发生的事情来给予我们的。（2009: 47）

根据巴顿的说法，革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无条件的、不可想象的（本质上）差异，“这就是存在事件的条件”（2009:42）。就实际的政治斗争而言，最高程度上展现了这种“解释学的崇高”。他们意识到与现有理解框架的潜在突破”（2009:43）。它们构成了一种“纯粹的外在性和变形”（2000:114）（绝对解辖域化），与事物状态及其表征过程不同。巴顿认为，革命或纯粹

的变革、革命和自我形成的事件必须被视为“新事物出现的源泉或条件”，而不是预设现有的政治条件（2009:50）。

类似地，正如丹·史密斯在《德勒兹与新事物的生成》中所说，“如果同一性（A 就是 A）是首要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同一性已经被预先给定，那么原则上就不会有新事物的产生（没有新的差异）”（2008:151）。因此，史密斯继续说，“对于德勒兹来说，新事物的条件只能在差异的原则中找到”（2008:151），“与暂时构成个人的能力相比，分解和摧毁个人的能力并不弱”（德勒兹 1994:56/38）。巴顿和史密斯从德勒兹早期的作品中准确地发展了“差异性”这一重要概念，我相信，这个概念不仅无法解释革命干预和政治变革的理论，甚至还可能因为肯定政治行动无条件的矛盾和非关系的“外部性”而阻碍它。通过将革命作为“改变本身”（自由的改变和非自由的改变）的无条件的（真实的）潜力，或巴顿所说的“关键的自由”（2000:83），激进的政治仍然乐观地与一种最终冷漠和矛盾的差异原则联系在一起：偶然的时间构成不少于个人的毁灭；或自发的起义。

然而，我认为，当代回归革命，不仅仅是对“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肯定。如果革命肯定纯粹的事件性，“作为每一事件逃避其自身实现的那一部分”，在历史之外，它最终（以其纯粹的形式）从所有实际和具体的政治关系以及不同的政治事件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 John Protevi 在他对 Peter Hallward 的《Out of this World》（Protevi 2006）的评论中所反驳的批评。虚拟作为一种精神领域，并不是抽象地停留在现实之上。就革命是“在现实和反现实之间的一般变革运动”而言，它与任何确定的准因果政治事件及其单一的具体后果无关。它仍然无法概念化任何地方政治干预的多个中间阶段。我不同意具体的革命斗争是激进的，只有当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实际关系，并且“只”肯定了他们在一个纯粹的变成现实的变成虚拟的过程中成为他人的能力。

二、革命的时间

未来的前路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变革，使非代表性的革命实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构建的？不同于革命干预是基于反对的观点，不同于革命干预是一种纯粹的“事件”的形式，所有的事件都是这样的，在下一节中，我将论证第三种观点。为了理解当代的革命回归，我们需要分析发生在表征过程（在第一章中发展）和所谓“事件性”或“绝对解辖域化”的纯粹外部性之间的四个中间和具体阶段。我认为，在预先给定的事实、形势及其历史（过去）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以及它们转变“即将到来”（未来）的根本无条件的潜力之间，有四个由革命事件分配的政治转变中间阶段。

在这四个政治转型的中间阶段中，第四阶段尤其描述了定义当代革命回归的革命转型类型。这第四种革命变革具有先兆性，发生在未来的前时代。但是前未来的目的不是创造过去和未来

的“纯粹的生成”，或者使其中一个相对于另一个有特权（前事件相对于后事件，反之亦然）。相反，我在这一节中提出的是一种革命干预策略，它解释了革命沉淀的概念及其后的后果。我在这里的目的也是要把预言理解为一种由概念和实践两部分组成的革命性战略。因此，为了帮助发展这一战略，我借鉴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解辖域化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四种变化模式。第一种改变是他们所说的“相对消极的解辖域化”。这是一种能够摆脱政治代表性（编码、过度编码和公理化）过程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暂时的，并且以阻碍进一步变革的方式进行。

第二种变化是他们所说的“相对积极的非领土化”。这种类型的变化成功地在政治代表过程中创造了一个无法决定的紧张点，它可能导致革命，但也可能导致纯粹的权力改革。第三种类型的改变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绝对消极的非领土化”。这种类型的改变在表现过程中造成了根本的破裂，但却无法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起来，并进入了一条孤立的自我毁灭的线。第四种变化是他们所说的“绝对积极的非领土化”。这种类型的改变不仅能够打破权力，而且也能够连接到其他这样的断裂，并在未来创造一个代表政治的集体选择。

(1) 未来的前路不是生成的事件

我认为，革命的先兆过程发生在未来的时代，也就是说，作为一件将要发生的事件。但是，创造未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结合，根本不应该被理解为这三次综合。如果我们把革命性的转变定义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甚至是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96-168/70-128)中所描述的差异，那么革命性的未来将是所有变化的绝对条件。也就是说，革命性的未来将会是区别的原则。因此，革命将不会有实际的、具体的存在或政治力量来为相互竞争的政治代表进程提供替代方案。1 革命将仅仅是变革的潜力，而不是任何实际的、积极的政治力量。简而言之，如果革命是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纯粹成为的事件”，那么只有一个矛盾的事件决定了所有类型的政治权力。

真正不同的革命事件，它们有自己的行动条件，行动和组织，因此不可能存在，而只会作为一个单一的永恒事件的结果：起源，“存在的事件”。2 继其他许多人也认为“《感觉的逻辑》是德勒兹澄清事件概念的最值得注意的努力”（巴迪欧 2009a: 382）之后，阿兰巴迪欧找出了我认为是德勒兹革命干预理论的重大危险：如果所有转变的条件本身是一个事件，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只有一个事件的无休止的修改。在《世界逻辑》中，巴迪欧认为，如果，正如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中所说，对于所有事件，只有一个事件；发生的事和说的事都是同一种液体；不可能、可能和真实都是同一的存在（德勒兹 1990:211/180），这样一个本体论的条件成为条件和条件，为真正的分离、破裂和变化留下没有空间（Badiou 2009a: 385）。

正如巴迪欧所说，如果事件总是过去和未来的综合体……“表达式中的一个成为”或无情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之间一个世界的结束和另一个的开始”，它表达了时间的永恒和持续的本身，而不是所需的分离或分离思考世界上的一个决定性政治变革（2009:382 - 3）。最终，德勒兹的

事件被理论在两极之间, 都是能够占出现新的革命性的礼物: 要么现在被完全分裂成未来和过去, 因此不存在, 要么现在是所有未来和过去的永恒合成, 因此是一切。

然而, 德勒兹的早期作品《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可能对“事件”和“生成”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发展, 但我还是追随托斯卡诺 (Alberto Toscano) 的观点, 认为《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 也是如此

与 [德勒兹] 早先对实现条件的关注相比, 地形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关注似乎为个体发生的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描述提供了某种连续性。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上展现的个体化 (individuations) 并不是产生个体 (engender individuals) 的那种; 相反, 它们横穿已经构成的个体, 将它们引向非人格化的化身, 一种多样性与另一种多样性的组合。(2006: 176)

在《千高原》(Badiou 和其他批评家很少引用的作品) 中, Deleuze 和 Guattari 不再特权于所谓的“事件本身产生的本体论条件”, 而是从“政治先于存在”的原则出发 (1987:249/203), 取代了早期的“结构和起源”理论 (1987:326/266) 和战略理论、政治关系和集群逻辑 (德勒兹 2006:163/177)。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要证明”自在差别”或”纯粹变易”是存在论条件和”存在的单一事件”,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后期作品则发展了一种复杂的政治逻辑 (或建构主义), 即各种类型的集群构成了政治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转变程度。由于缺乏政治类型学和仅在《千高原》中才发现的更微妙的变化理论 (解域化), 我也为《感觉的逻辑》和《差异与重复》仍然存在一些启发, 我相信, 并非毫无帮助或“前政治”, 只是完全不足以恢复基于未来的革命干预概念。3

***** (2) 未来的前路既不是事件前的, 也不是事件后的

正如革命性的未来不能被理解为未来和过去的绝对综合 (“生成的事件”), 它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事前或事后的干预。在他的文章《什么是政治事件?》伊恩·麦肯齐 (Iain Mackenzie) 区分了理解政治事件出现的两种方法: 德勒兹 (Deleuze) 提出的一种是事前方法, 巴迪欧 (Badiou) 提出的是事后方法。最后, 麦肯齐得出结论, 德勒兹的“发生前”方法比巴迪欧的“发生后”理论更有说服力, 因为它不需要一个主体来奇迹般地提名事件 (麦肯齐 2008 年:2)。不管真假,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于, 麦肯齐和其他人对政治转型问题的描述方式。

从德勒兹的角度来看, 与巴迪欧对革命事件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事件通常发生在我们最不清楚的时候。然而, 正是由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的影响, 才产生了意义; 我们可以说, 意义的可能性是在我们背后进入这个世界的。(麦肯齐 2008:15)

麦肯齐认为, 在德勒兹看来, 只有当我们最不自觉或最不客观的时候, 我们无法控制的一大堆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才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造成与 (实际) 事件状态的脱节。不需要任何积极的沉淀、建设或事件的监视, 德勒兹式的潜在力量的预先发生将突然从我们背后升起, 并将我们从过去的实际预先决定中分离出来, 走向“即将到来”的革命未来。根据保罗·巴顿 (Paul Patton) 的说法, 德勒兹的事件前奇点远非可被简化为可识别的、划时代的转移, 而是“分子的”、“不可识别的”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 (2000:108)。

这与 Alain Badiou 的后事件哲学相反，后者主要关注的是结果、忠诚或“真理过程”，这些只发生在事件发生或消失之后。正如巴迪欧所说，“自我归属”，或“事件网站”，“一旦出现就会自动失效。”一个网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术语：它只是以消失的形式出现。问题在于记录出现’ (2009a: 392) 的后果。巴迪欧对事件“追溯”和“事后承诺”的明确特权引起了批评 (霍尔沃德 2003; Bensaid 2004; (2005 年 3 月)，认为这种对预先条件的明确否认导致巴迪欧进入了一种类似宗教神秘主义的事件奇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预先事件的主体”，一个人无法预先最终促成事件，甚至无法找到它们的先兆，那么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的，似乎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所有保持一致的是对过去事件的好战的忠实的臣民。然而，这种困境导致了像 Adrian Johnston 和 Nick Srnicek 这样的人试图在 Badiou 的工作中补充这个预先发生的缺点 (Johnston 2007; Srnicek 2008)，我想从不同的方向继续。

正如巴迪欧本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德勒兹的“前”和巴迪欧的“后”事件理论之间的明显分裂“暴露了事件概念的最初模糊性” (2009a:382)。无论采取哪种立场 (面向未来的事件前或向后看的事件后)，我们似乎最终肯定了政治事件的一种神秘主义。或者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待无形的、不期而遇的和自发的潜力在我们背后神秘地带来真正的革命变革，或者，神秘事件“总是已经”发生了 (就我们是它的主体而言)，我们只需要“走出去”，并对其后果保持战斗忠诚。这种描述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稻草人或是问题的两极分化，也许我已经过度强调了以证明文献中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但即使是德勒兹和巴迪欧最慷慨的读者也承认这两种暂时性之间在强调上存在着真正的差异 (Johnston 2007; Srnicek 2008)。

因此，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比这要微妙得多。前事件的痕迹存在于巴迪欧 (《存在与事件》和《世界逻辑》) 中，正如后事件的痕迹存在于《德勒兹》和《感官的逻辑》 (《千高原》) 中一样。但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没有抓住重点。“痕迹”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对德勒兹、瓜塔里和巴迪欧政治干预的时间性在事件发生前和事件发生后的理解甚少。我想说的是，德勒兹、瓜塔里和巴迪欧都有一个基于未来的政治干预理论，这个理论还有待充分研究 (巴迪欧 2005b: 201-11; 巴迪欧 2009:357 - 80; 德勒兹 1990:74 - 83/58 - 65; 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284-380/232-309)。因此，尽管德勒兹、瓜塔里和巴迪欧都曾在某一点或另一点上明确地指出，革命事件不会凭空出现，4 有待详细发展的是，这种革命干预的理论，这种理论显然与这种立场相一致。这就是本章的目的。

(3) 未来的前路是新的现在

为了提出一种革命预兆的理论和实践，我首先指出要避免未来的两个危险的方面：一方面，过去和未来在“事件”的“纯粹的生成”中融合在一起，革命的现在已经消失，另一方面，过去和未来被划分为前和后的世界，而现在被无限地划分为一个空的或不存在的的时间。前者是错误的，因为它把革命事件等同于一切事件的绝对条件。第二种观点失败了，因为它在任何特定事件的中心都假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起源。相反，我所提议的是一个未来的概念，它作为一个

新的当下时刻，在政治和时间代表的其他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新的当下时刻不是一个无限分裂的时间，而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时刻，它既预示着一个新的未来，又追溯着一个新的过去。正如德勒兹所说，这是一个全新时空的创造（德勒兹 1995:239/176）。

在《感觉的逻辑》23 页的最后几行中（关于 Aiôn），德勒兹区分了三种现在：（1）被颠覆的存在（空虚和无限分裂），（2）被实现的存在（扩散到一切中），（3）作为一个全新的过去和未来的“准原因（quasi-cause）”的第三个现在：一个现在的过去和现在的未来（1990:196/168）。”德勒兹说，毫无疑问，似乎艾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存在，因为在艾涌身上，情况总是分为未来和过去。但这只是表面现象（1990:196/168）。事实上，第三个现在（前方的未来）是一个真实的“准因果”条件，新的过去和未来在旧的历史中内在地转化。但这种新的现在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后果如何具体分配而不具有代表性？它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转变的中间程度？它与政治局势以及不同代表过程的类型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在《感觉的逻辑》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答。

事实上，德勒兹和瓜塔里直到 1980 年才能够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当时他们合著了《千高原》，这是他们的第一部建构主义著作然而，重要的是要区分，在《感觉的逻辑》7 中引入的未来未来的第三现在的概念中，这样的现在能够成为一个既不扩散也不分裂的新世界的“准因果”或真实条件。一旦这个“时刻”出现，它不仅重新设定了新的现在的政治局势，也重新设定了新的过去和未来的政治局势。因此，革命既不是一种反抗，也不是一种虚无的起义，它是一种预兆，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与旧世界平行的新世界。这种预示发生在未来的前面，因为它不假定一个它所反对的预先给定的过去，也不假定一个它所希望达到的仅仅可能的未来。正如德勒兹所说，革命性的预示是未来的前方，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空（1995:239/176）。它创造了它想在现在看到的过去和未来。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这就是预感的积极意义：不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惰性希望，而是那个特定世界在当下的直接行动。

为了给尚未存在的事物的“预感”的概念以积极的意义，有必要证明尚未存在的事物已经以不同于其存在的形式在行动。（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537/431）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说法，这种被构建的过去和未来在现在中的真实行动是德勒兹和 Guattari 所称的“新古语”和“前未来主义”（1983:309/257）。如果时空是由各种偶然的、异质的过程通过折叠和态形联系在一起拓扑平面，如第一章所述，那么革命性的干预就不是辩证地或发展地出现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通过在时空中不同的点之间创造一种新的折叠或联系而出现的：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新安排。因此，今天的革命不是夺取国家，而是从下往上创造更好的东西。

在我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绝对积极的非领土化概念的发展中，我将回到革命先兆和未来的概念。但未来前区别的概念合成的过去和未来，从一个完整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分裂，现在的问题是理解这个革命性的征兆和危险中所起的作用将面临更大的政治转型的过程。为了做到

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四个小节中，我引用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转型理论，或者他们所说的“非领土化”。

四种改变或“解辖域化”的概念

变化的概念可以说是最核心概念之一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工作，虽然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和术语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是安全的说，有两个概念在他们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概念对于理解转换：“生成”和“解域化”。的巧合，这一章最集中不仅致力于这两个概念组成的最大章千高原 (99/77 页)，但也是唯一在这本书的概念未来部署前 (Aion):1730: 日趋激烈，生成—动物，生成—不可察觉……

鉴于这两个概念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作品中具有明显的中心地位，我提议从他们身上汲取一种革命转型理论，它为战略对抗和革命“事件”以及未来的综合和分裂概念提供了替代方案。此外，我的论点是，在未来的革命干预理论，或者我所说的战略预测，如果不理解非领土化理论中关于变化的四个概念，就无法理解。在接下来的四个小节中，我将发展本节开始时简要概述的四个变化概念 (相对消极、相对积极、绝对消极和绝对积极的去领土化)。之后，在本章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个主要部分，我认为萨帕塔斯派在军团 (Juntas) 中部署了一种革命预兆的实践。

(1) 相对消极的解辖域化

第一类变化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相对消极的非领土化”。这是一种能够摆脱政治代表过程 (编码、过度编码和公理化) 的改变，但只是暂时的，而且这种改变会阻碍进一步的转变。一种相对消极的“去领土化”是一种规范化的内部转变，以确保表征过程的进一步扩张。认为权力永远是完全的或同质的，这是错误的。相反，事实恰恰相反。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代表权力只有通过其内部的崩溃才能发挥作用：相对消极的非领土化。

例如，在区域编码的过程中，有一些特定的限制和边界来定义一个社会的适当限制：如何使用事物，如何引导欲望，在哪里进行活动，等等。因此，一个编码的领域是什么，只是由于它在哪里绘制其代码的分离限制。一方面，它连接了定性的代码，而另一方面，它分离了尚未编码的余数或剩余。但由于地域编码是基于对“未编码或已解码的流” (绝对非地域化) 的主要压制，总有一些东西在给定的代码块的限制之外逃逸。当每个编码区域接近其边界时 (在此之后它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它将经历一个内部转变，将剩余部分连接和重新分配到另一行代码中 (通过联盟)。“通过在每个运营期结束时切换区域”区域编码变为巡回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549/440)：正在创建多个二元节段。也就是说，它代表社会生活自然法则的力量只能通过过度和不足的永久不平衡发挥作用 (1983:175-6/150)。因此，相对消极的解域化 (稳定的

功能障碍)是其功能能力的基本要素。元素在结构上被排除在外,只是在以后重新整合到新的层次结构下。

抽象机器过度编码也通过内部分解和转换发挥作用,但方式不同。国家主义反对对绝对非领土化的主要不稳定流动进行结域编码,它本身就是一个非领土化的、未编码的领土存量的剩余部分,这些存量变成了一个集中的积累点(土地、工作、货币等等)。这个累加点反过来又在定性的区域代码上执行了一种相对消极的去领地化,去除它们的异质性,并将它们分层成一条垂直的、分层的线,在一个中央覆盖编码装置中被机器奴役(Deleuze和Guattari 1987:533/427-8)。但是在保留给定的编码元素时,状态必须切断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这些元素成为它的外部。反对仅仅以剩余部分开始新一行代码的领土流动,国家形式的相对消极的非领土化旨在摧毁所有剩余部分或“一劳永世”地捕获它们。但由于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由于第一章中讨论的政治历史中无穷无尽的偶发事件),国家正不断进入越来越暴力的安全状态、紧急状态和内部变化:相对消极的非领土化。因此,国家是偏执狂,并最终无能为力。但是,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1987:279/229),“正是它的无能[失权]使得权力[pouvoir]如此危险”。一个国家部署的权力和安全越多,它就越无能为力;它越虚弱,就需要更多的力量来保护它,以此类推。

这既是他们权力的原则,也是他们无能为力的基础。权力和无能非但不是对立的,反而在一种迷人的满足感中相互补充和加强,这种满足感在最平庸的政治家身上尤为常见,并定义了他们的“荣耀”。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短浅中得荣耀,从自己的软弱中得力量。(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275/225)

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公理化是最适合于内部转换的快速和流动过程的代表性过程,即相对消极的解辖域化。资本主义公理化以非集权性和不完全性为出发点,与需要如此多的“紧急状态”和偏执的法律中止的偏执和极权主义的彻底捕获或毁灭的驱动相反。与限定的代码和将代码带入单一共振的超代码不同,公理的作用是直接共轭不限定的和已解码的流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在其相对消极的“非领土化”中走得最远。在一端部署积极解码的定性关系通过私有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贸易、广告、解放劳动力和资本,帝国主义等等,和其他极配合他们是抽象的数量在世界市场交换(德勒兹和“1983:293/246)。8在专制国家有反生产的皇帝来消费和攫取剩余的地方,资产阶级的内在领域就没有这样的外部限制;它把反生产整合到生产内部。由于公理化以偶然性、变化和非领土化为前提,它也使市场自身内部不可避免的破坏或饱和成为其不断扩大的限制的条件(1983:292-3/253)。

(2) 相对积极的解辖域化

德勒兹和瓜塔里描述的第二种政治变革被定义为一种真正的政治代表的转变,这种转变凌驾于次级再领土化(代码、超代码和公理)之上,但却无法与其他积极地去领土化的元素联系起来,或创造出一种新的安排。因此,相对积极的“去领土化”本身只是一种单纯的肯定,即边

界上的政治代表制主导政权逃脱了某些东西。这种变革，终究是不足以维持革命斗争的。因此，仅仅因为某些东西脱离了政治代表，就认为它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政治变革是实验性的，需要与他人保持持续和坚定的联系，才能成为革命。

这是因为没有人，甚至连上帝都不能事先说两条边界线 (bordures) 是否会串在一起或形成一根纤维，一个给定的多重性是否会跨越到另一个给定的多重性，或者即使给定的异质元素将进入共生，是否会形成一致的或协同作用，易受转换影响的多样性。没有人能说出这条航线将经过哪里：它会让自己陷入困境吗。或者它会屈服于另一种危险，例如，变成一条废奴、歼灭、自我毁灭的路线，啊哈，啊哈？我们都太熟悉逃逸线的危险性及其模糊性。风险总是存在的，但总是有可能幸运地避免它们。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判断这条线是否一致，换句话说，异质性是否有效地在共生的多样性中发挥作用，多样性是否通过通道的形成有效地转化。(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306-7/250)

因此，相对积极的非领土化是一种边界现象，一种“到达和通过边缘的东西”，它的作用是政治代表的双面限制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299/245)。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成为的政治”是如此“极其模糊”，这条边界被一分为二：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异常”元素存在，在事态中无法解释，但仍可视为例外；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例外个体”存在，将新世界信息日益增长的联系联系在一起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302/247)。当它不再是与多数有关的可定义的配置时，它揭示了进一步联系的可能性和不可避免的合作的可能性 (1987:356-7/291)。

(3) 绝对负面解辖域

德勒兹和瓜塔里所描述的第三种政治变革被定义为绝对超越领土、国家和资本主义代表的所有边界的真正变革但这样做不仅无法与其他非属地化的势力建立联系，并创造新的安排，而且它的非属地化速度太快、太多，并变得自我毁灭。最终，它会加强政治代表的过程。因此，激进的政治变革不仅仅是模棱两可的。这可能太轻描淡写了；这很危险。德勒兹和瓜塔里警告说，保持分层——有组织、有意义、受约束——并不是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如果你把地层扔到疯狂的或自杀式的坍塌中，这会使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 (1987:199/161)

当一条“逃逸线”或某种程度的政治转型“使 [改变] 成为一场没有其他目的无限运动”时，这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法西斯主义 (1987:525/421)。10 只要我们不严格地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范畴中狭义和字面上的指代，各种法西斯主义都可能存在，因为它们表现出某种“自我毁灭的激情”。当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把战争看得比自我保护更重要时，就有一种微观的法西斯主义，就像希特勒最后时期的纳粹德国那样。希特勒在一份电报中宣称：“如果战争失败，国家就会灭亡。”“在这里，”德勒兹和瓜塔里说，“希特勒决定与他的敌人联合起来，彻底毁灭他自己的人民，通过消灭生命维持系统的最后剩余资源，各种民用储备 (饮用水、

燃料、粮食等)”(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282/231;1 - 15 Virilio 1993.; 阿伦特 1979:326)。当集群或个人孤立地崩溃时,就会出现分子法西斯主义:“农村法西斯主义、城市或邻里法西斯主义、青年法西斯主义和退伍军人法西斯主义、左翼法西斯主义和右翼法西斯主义、夫妇、家庭、学校和办公室的法西斯主义”(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261/214)。这是一种对各种破坏的普遍渴望,“其唯一的结果就是死亡”(1987:201/162)。

因此,那是因为你无法抵达……融贯性平面,通过广泛的分层(destratifying)“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他们的工作中首次提出,在政治变革的过程中“注入谨慎”而不是智慧(1987:175-6/150)。

(4) 绝对积极的解辖域化

绝对积极的非领土化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描述的第四种、最后一种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革。这是一种转变,它不仅摆脱了政治代表的绝对限制和边界,但也与越来越多的其他绝对积极的非领土化分子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最终集体目标是通过一个新世界的构建,对当前政治进程的交集进行内在的转变(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179/142)。但如果认为这种激进的转变是一种虚无的奇迹或绝对的他者/政治代表之外,那就错了。德勒兹和瓜塔里非常清楚,前面的变化类型已经表明,绝对的非领土化已经被假定为所有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固有地面临的绝对内部限制。

因此,绝对积极的解域化绝不是超越性的、对立的或仅仅是潜在的,而是一种内在的、创造性的过程,它利用了所有不可避免的崩溃和排斥。它这样做不是为了发展一种新的政治代表形式,也不是为了稳定旧的政治代表形式,而是为了创建一个新的非代表性社会团体。

但是,说绝对积极的“解辖域化”仅仅是所有这些异质崩溃和排斥的联系,真的足够吗?根本不够。正是这一举动,将绝对积极的非领土化解读为所有政治变革的先验条件:本质差异、潜能或纯粹成为。虽然彼得·霍尔沃德的书《走出这个世界》可能是这种“神论”结论的最极端表述,但它应该向我们表明,这种立场的风险,以及将绝对积极的非领土化视为一种真正的、具体的革命力量的必要性。因此,我提出以下另一种解读。

绝对积极的解域化并不是所有革命性变化的单一先验或本体论条件。德勒兹和瓜塔里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说“政治先于存在”,“融贯平面并不预先存在分解它的解域化运动,吸引它并使它浮出表面的逃逸线,构成它的生成”(1987:330/270)。相反,在代表性政治进程(或德勒兹和瓜塔里所称的“组织平面”)的交叉点上,非常具体、单一的要素被逐出、边缘化和解域化。然后,这些奇异元素“组合成块[生成]”(1987:328/268),基于一个拓扑接近区,该拓扑接近区标记了它们在给定情况下的相互归属(1987:335/273)。

每一个相关的“生成-块茎”都是由内在的故障和情况中不可代表的元素组合而成的,它们远没有形成一个泥泞和不一致的集群,它们不具有与另一个相同的力量或甚至是解辖域化的速度;在每个实例中,指标和系数必须根据被考虑的块来计算,并与一个抽象机器的突变有关”(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377/306-7)。德勒兹和瓜塔里非但没有肯定这种模糊和

矛盾的转型潜力，还坚持“分块”的政治计算、非领土化权力的比较和配置(德勒兹和帕内特 1987:175/146; 参见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378/307)。因此，这对这本书的整个主题至关重要，“在具体的社会领域，在特定的时刻，解辖域化的相对性运动，强度的连续体，以及它们形成的混合流必须被研究”(德勒兹和帕内特 1987:163/135)。

绝对积极的去领土化具有先兆意义，因为它遵循特定事件的内在后果，并与表征过程平行。维持的问题，如瓜塔里所说，“是如何确保奇异过程——几乎转向到不能传达的是由阐明他们在工作，一个文本，与自己或他人的生活方式，或发明的生活领域和自由创造的(2008:259)。换句话说，绝对积极的非领土化不只是为事件奠定准备基础，它还“抓住了形势的[不可代表的]元素”，并“构建了自己类型的实践和理论参考，而不依赖于全球力量，无论是在经济、知识、技术，或种族隔离，以及被传播的声望”(2008:62)。

回到本章的中心论题，当代革命转型，根据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斯派的观点，发生特定的出现预示的新现在(内部和与旧)‘重写和再认识的全部潜力，以分层形式已经存在’(“2008:252)以及“在现在上创造未来”和“在过去上创造现在”(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537/431)。(德勒兹和“1987:537/431)。这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反向伤亡”。他们认为，未来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脱轨或褶曲，在未来出现之前，未来已经对“现在”起了作用，因为未来就像一个限制或门槛，不断被过去试图保存自己的行为所阻挡。但是，一旦新的礼物出现，它就被视为一直在它的路上(1987:537/431)。如果从组织层面来看，革命的奇点性似乎“不知从何而来”，那只是因为它在改变政治条件之前无法看到或代表解域化的前期工作，而在这种政治条件下，解域化是可以被看到和理解的。但是，从革命斗争的角度来看，正在出现的事件，似乎和将要发生的事件一样，是完全一致和可以理解的。根据 Guattari 的说法，这种先兆性的劳动，在于检测分子生产力的轮廓、指示器和晶体。如果有一种微观政治要实践，它包括确保这些分子水平不总是屈服于吸收它们的系统，中和系统，或内爆或自我毁灭的过程。它包括理解生活生产、艺术生产或任何你想要的产品的其他组合如何得到充分的扩展，从而使权力的问题找到回应。这当然涉及到一种新的响应模式。(2008: 339)

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新的革命现状由此是从战略上的斗争中产生，这些斗争把革命描绘成了“否定性的轮廓(negative outline)”。“但要实现它，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解码流，一个整体的广义结合，溢出和推翻之前的仪器”(1987:564/452)。也就是说，它必须导致其他元素跨越一个阈值，从而使它们各自的解辖域化结合在一起，即共同加速。这是……绝对的、积极的非领土化”(1987:179/142)。未来的前方不仅是一种逃避，而且是“新武器”的创造(德勒兹和帕内特 1987:164/136):“伟大的斗争机器的创造”(Guattari 2008: 210)。需要明确的是，这种革命斗争只从现状来看是寄生的。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寄生在人民意志上的是政治代表，而人民的意志首先必须存在，然后才能被(错误的)代表。

然而，为了避免我冒着赞成纯粹地下的、难以察觉的革命变革的风险，我应该强调——因为有些人经常忘记——绝对积极的解域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组织层面变得难以察觉：这有太

多的法西斯可能性。预言性的革命干预的目的是使一切从组织的层面上“一片片地”变得难以察觉，以便创造“融贯性平面，而这恰恰是难以察觉的东西被看到和听到的地方”（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308/252）。我们的任务不是去享受不可能的和看不见的革命理论，而是通过改变可见的主导条件来“将不可见变为可见”（1987:326/267）。它既不是通过对立的破坏，也不是通过凭空创造，而是“通过结合，通过延续其他的线条，其他的片段，一个人创造了一个可以覆盖第一个世界的世界，就像透明一样”（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343/280）就革命而言，这个新世界变得更受欢迎，也更强大。

三、萨帕塔主义的先兆政治

如果认为萨帕塔派或其他任何革命政治斗争都局限于表达一种单一类型的政治变革，那将是错误的。正如在前一章中我们所看到的，萨帕塔斯派如何使用交叉诊断来评估他们斗争的外部和本部的危险，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他们在上述四种方式中选择了何种程度的干预。因此，萨帕提莫发生在所有四种类型的政治变革的一个特殊的交叉点上，尽管最终，我认为，他们最大程度的干预是在未来的前兆。

相对消极的解辖域化:EZLN，和平协议和生物剽窃

权力从来不是完全的或同质的，因此变化、功能障碍和崩溃是社会秩序任何交集的不可避免的方面。萨帕塔斯特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他们的政治局势，他们总是冒着改变的风险，他们不仅会中立或拉拢，而且会转变为实际上扩大政治代表权力的改变。例如，考虑到维持恰帕斯土著生活的父权文化的领土代表守则，解放阵线在这一编码过程的限制下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干预：制定《妇女革命法》。允许妇女（不分种族）参加抵抗、工作和获得公平工资、受教育、选择伴侣、选择子女数目、免于性暴力等等（1994年EZLN），他们能够打破父权制和强迫婚姻联盟（在某种程度上）的编码线。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危险是，仅仅是部署一种相对消极的非领土化，这只会加强前沿军事机构（解放阵线），并开始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分支，军事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由男人和男性价值观主导。正如马科斯所说，

伴随有时变成管理，建议变成命令，支持变成阻碍。我之前已经说过这样一个事实，即等级、金字塔结构不是土著社区的特征。民族解放阵线是一个政治、军事和秘密组织，这一事实仍然破坏了应该而且必须民主的进程。（马科斯 2004a）

从1994年到1996年，萨帕塔主义者曾试图与墨西哥政府协商和平解决方案，但他们干预了过度编码的国家机器，这也冒了相对消极的解辖域化的风险。

在[圣安德烈斯 San Andrés]协议中，政府承诺在宪法中承认印第安人民的自治权，扩大他们的政治代表权，保证充分利用司法系统，并建立一个保障政治权利的新法律框架，法律权利和文化权利。政府还承诺承认土著人民是公共权利的主体。（拉米雷斯 2008: 138）

但是，不仅仅是与墨西哥政府的谈判使萨帕塔主义者的干预变得相对消极（尽管赢得这些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一场有意义的胜利，即使是通过国家司法程序）。使他们相对消极的另一个事实是，政府谈判并同意了圣安德烈斯协议，但从未付诸实施。在这些年的谈判中，萨帕塔主义者试图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和平协议的冒险或激进的行动或报复。然而，与此同时，在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准军事部队以及军队和当地警察升级了对恰帕斯州萨帕塔和土著社区的袭击（包括谋杀、暗杀、骚扰和军事搬迁）。整个和平协议进程只不过是暂时的解辖域化，允许墨西哥国家妄想而无力的灭绝和完全占领企图。

最后，在受到骚扰和搬迁后，萨帕塔人被迫越来越远地回到拉坎东丛林 (Lacandón Jungle)。随着食物、建筑材料和水变得稀缺，萨帕塔人越来越多地与丛林发生相互解域化：他们更多地依赖他们对森林、野生动植物的传统知识，而最终他们吃得更少，并试图不破坏丛林生态系统。但这种解域作用很快转变为相对消极的解域作用，因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NGO) 指责土著人民“加剧了拉坎德翁丛林已经存在的砍伐森林压力” (O’ Brien 2000)。警察、军事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被引入，不仅是为了保护丛林不受土著人民的侵犯，也是为了保护日益增长的私人公理化的土著知识、植物和植物的“生物政治市场”，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保护以及土著人民自己的行动开辟的动物和旅游业，其环境“损害”需要保护科学家和/或生物勘探者“修复”。

相对积极的解域化：拉坎东丛林的第一次宣言

然而，也有可能革命干预真的将政治生活从中间分裂开来，迫使人们采取或不采取行动。例如，1994年1月1日的萨帕塔起义标志着墨西哥政治生活的真正界限。正如萨帕塔主义者学者约翰霍洛威所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生效之日，萨帕塔主义者“闯入了一个否认他们存在的世界”。来自土著社区的武装人员强行占领了恰帕斯州的7个城镇和500多个私有牧场 (Holloway 和 Peláez 1998: 1)。从墨西哥政治和政治家、企业、有投票权的公民等的主要指涉者的角度来看，萨帕塔主义者肯定“似乎”从无到有“突然出现”。因此，萨帕塔主义者的存在绝对处于大众政治可理解性的边缘。谁是“萨帕塔主义者”，他们呼吁“对墨西哥政府进行革命战争”的含义是什么？Lacandón 丛林的第一次宣言是对墨西哥政治彻底解辖域化的第一次呼吁。

致墨西哥人民：

我们，充实而自由的男人和女人，意识到我们宣布的战争是我们的最后手段，但也是唯一的手段。多年来，独裁者正在对我们的人民进行一场未宣布的种族灭绝战争。因此，我们请求您的参与，您决定支持这个为工作、土地、住房、食物、医疗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正义与和平而奋斗的计划。我们宣布，在我们人民的基本要求通过组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政府得到满足之前，我们不会停止战斗。加入萨帕蒂斯塔民族解放军的叛乱部队。-EZLN 总司令部，1993年12月31日 (Marcos 2004b: 642)

这场全民革命战争的最终号召将政治现实一分为二。一方面，仍然有可能将一月起义视为当前政治世界中的暂时反常（尽管不能立即恢复）；另一方面，这也是墨西哥各地为争取大众和直接民主¹¹而展开的革命战争的第一个明显表现。但将这一事件明确标记为相对积极的去领土化是，当面对这种最终的局势分裂时，墨西哥人民（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了支持萨帕塔主义者的斗争并容忍墨西哥政府作为谈判者的继续存在。在和平协议中。因此，在墨西哥各地没有足够的民众动员去领土化的联系，该事件在没有与日益去领土化的元素或替代机构建立的大规模联系的情况下，基本上仍然是名义上的。这种类型的政治干预也许最好的例证是建立反制度：肯定像萨帕塔一样的革命斗争并希望保护它的制度，但也通过争取权利、和平协议、谈判和法律改革的斗争来实现在代表性政治中。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特定革命的可能性被承认，但最终通过妥协和代表的调解形式被阻止。

绝对消极的去领土化：一场针对墨西哥政府的战争？

但这些革命性的失败并不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除了无法连接到足以维持革命斗争的其他去领土化载体之外，干预也可能导致自杀。例如，EZLN 无疑必须认真评估墨西哥人民对与墨西哥军事和准军事力量有关的《拉坎东丛林第一宣言》的支持程度。谁是“墨西哥人”？成功推进到该国首都、战胜墨西哥联邦军队、在我们面前保护平民并允许解放区人民自由和民主地选举自己的行政当局所需的最低支持是什么？’（马科斯 2004b: 642）？我们军队的实力如何？我们准备好在战斗中死亡了吗？

当民众的支持主要是反对革命战争时，民族解放阵线不得不决定要么继续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他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为此进行训练），要么投降，要么采取其他手段。如果他们选择对墨西哥政府发动一场不受欢迎的军事战争，并且知道他们可能会失败，那么很明显，革命法西斯主义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¹²

因此，我们可以在 Zapatistas 的第二份宣言（1994 年 6 月）中看到墨西哥人民坚持“进攻性停火”和呼吁“和平和公民动员努力”反对政府。这开启了墨西哥和世界各地民众动员工作的新长期战略。马科斯清楚地意识到任何革命运动都面临着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他写道：我们不想用武力强加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想创造一个民主空间。我们没有看到以往游击战争的经典意义上的武装斗争，也就是说，武装斗争是组织一切事物的唯一途径和唯一的全能真理。在战争中，决定性的不是军事对抗，而是对抗中的政治。我们参战不是为了杀人或被杀。我们参战是为了被倾听。（马科斯 2009）

绝对积极的去领土化：预兆和 Juntas de Buen Gobierno（善政委员会）

然而，也许最有趣的是，当政治干预不仅逃避权力的二次再结域化，而且设法与其他人联系起来，通过创造一个新世界来改变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条件时。例如，尽管他们最初未能煽动反

对墨西哥政府的革命战争，或者也许是因为这次失败，但萨帕塔主义者开始发起另一种同样革命性的战争，或者也许更具革命性：民间社会的大众组织和成立 Juntas de Buen Gobierno (善政委员会)。除了前几年的许多全国巡演（以动员民众团结），2006 年，萨帕塔党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在即将到来的竞选活动中会见并动员墨西哥的左翼势力的民众团结：他们称之为 La Otra Campaña（另一场战役）

其目的不是组建政党或选择候选人，而是在墨西哥各地的左翼和激进团体之间建立联系和网络：加强他们共同的解域作用。在持续使用互联网公报、呼吁和回应全球基层支持的同时，萨帕塔人开始举办大型年度国际活动（(Intercontinental Encuentros for Humanity and against Neoliberalism)，并参加年度人民全球行动和世界社会论坛活动，以进一步加强他们与世界各地其他威慑团体的联系和团结。作为一场革命运动，萨帕塔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越来越多地将斗争扩大到自己本土领土之外，并将其他人的斗争视为自己的（反对种族主义、仇视同性恋、性别歧视、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环境破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此前否认非工业工人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特别关注土著自治的革命了。但是通过一种更为激进的相互解域形式，萨帕塔派继续参与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类型的革命序列。

其次，萨帕塔主义者还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了预示性的革命干预。首先，如果他们沒有意识到拉坎东丛林中持续的十年革命活动、培训和土著动员，人们可能会说萨帕塔主义者“突然闯入墨西哥政治舞台”的唯一方式自 1983 年以来。马科斯和其他三人开始作为居住在土著社区之外的 Che 启发的军事先锋，慢慢赢得了土著居民的信任，并使他们变得激进。远非突然出现，土著 campesin@s 的大会做出了一个长期且最终的集体决定，要发动战争。在这段时间里，Zapatismo 事件确实作为一个新的现在存在，它构建了过去（基于 Emiliano Zapata 农民革命的正义）和未来（直接民主自治公社）。“在我们的梦想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过去的梦想，也不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传来的。它来自前面，来自我们将要采取的下一步”（Marcos 1994）。

萨帕塔过去和公社的未来虽然在技术上不存在，但直接作用于萨帕塔的新现状。在这十年中，萨帕蒂斯莫作为一种隐形形式存在，这种隐形形式将一直可见。因此，萨帕蒂斯莫的未来是一种革命性的信念，即过去（萨帕塔）可以复活，并要求我们对墨西哥政府采取后续行动，建立一个自治社区联合网络。尽管“事实”证据与此相反，萨帕塔主义者认为扎帕蒂斯莫将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革命并没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只有坚定的实验性。

第二个例子，也许是最原始的例子，是萨帕塔主义者拒绝“掌权”的规模，而是通过在现在创造他们希望在自己的自治市看到的世界来继续他们的革命。他们于 2003 年 8 月开始创建 Juntas de Buen Gobierno：用于集体和自主决策的直接民主制度框架。在每个 caracoles（区域社区，或“蜗牛壳；‘snail shells’”）中创建了一个 JBG，以促进和批准 compañeros 和 compañeras 的参与。.. 调解自治市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监督 Rebel Zapatista 自治市

的项目和社区工作的实施。...服务和指导国家和国际民间社会，使他们能够访问社区、开展生产性项目、建立和平营地、开展研究等 (Marcos 2004b: 619)

目前，超过 2,200 个社区（超过 200,000 人）被联合成 38 个自治市，每个自治市又分为五个地方自治政府 (JBG)。今天，萨帕塔派仍然致力于自治、参与性自治、共识决策、不使用杀虫剂尊重自然和生命，以及包容“不分党派、宗教、性别或肤色的所有人” (马科斯 2006 年)。

通过轮换自治、社区联盟以及最终团结在共同社会斗争的国际网络中，萨帕塔人继续进行政治干预和替代机构，以预示他们和他们的民主和平等世界的未来。他们的盟友想要居住。反对直接向墨西哥政府宣战并在该州进行政权更迭，或者简单地肯定“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激进可能性，萨帕塔主义者正在建设，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旧世界之内和旁边的另一个世界。

但是，萨帕蒂斯莫“将生成”一个革命性事件的决定，包括我自己的决定，没有客观的地位，只有一个有条件的和实验性的地位：如果你相信萨帕蒂斯莫是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信念在未来会起作用，并且可以得到我上面概述的证据网络的支持。如果不是，那么萨帕蒂斯莫在国家资本主义历史上是一个不重要的时刻，需要被增选或粉碎。此外，“积极”和“消极”的解域化不应理解为评价性、定性或规范性描述“积极”只是指一个新世界的创造，“消极”只是指旧世界的破坏或复制。

结论

在第 1 章中，我认为历史和革命问题不应被理解为继承或偶然性的普遍历史，而应被理解作为一种诊断策略，它同时检查几种特定类型的共存政治过程以评估风险和危险。特定的革命斗争。但在这种诊断实践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干预和政治转型的问题。在诊断的实践中，我们已经在哪里以及如何进行干预？根据给定的权力交叉分析，我们将如何以及在何处指导我们未来的干预，以及我们在旧的政治世界中创造什么样的新政治世界，如果有的话？在本章中，我通过论证当代革命干预的定义主要是由它在未来的前兆联系和结构来回答这个革命干预的问题。借鉴德勒兹和加塔里关于千高原中未来前向 (Aión) 和去领土化的概念，我支持这一论点，表明未来前向干预可以与其他三种类型的政治转型区别开来：相对消极、相对积极和绝对消极去领土化。这些类型的转变仍然不足以支持从组织层面到一致性层面的革命性政治转变。

但是，尽管本章中制定的预先政治干预和威慑化战略可以说明政治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并开始与其他解域化因素相联系，对于理解这些预备元素如何能够凝聚和组织成明显的非代表性政治团体来说，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革命组织不断地冒着重回政治代表模式的风险，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无法代表的转型条件。因此，第三章的任务是避免这两种危险，并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融贯性”概念和萨帕塔主义者的“服从领导”参与实践中提出政治参与理论 (mandar obedeciendo)。

3 政治团体与过程参与

这不是一个担心或希望最好的问题，而是寻找新武器的问题。（德勒兹 1995:242/178）

导言

虽然第 2 章中发展的政治预演策略可能已经说明了不同类型的政治转型如何在几个不同的表征过程（编码、过度编码和公理化）中发生，但它仍然根本不足以理解革命性的预演策略如何，特别是，能够将自己凝聚起来并将自己分配到明显非代表性的政治机构中。例如，如何进行和维持非代表性革命的后果？是否有一种新型的政治体不再以民族国家的党体、资本的市场体或先锋队的领土体为基础？这样的政治机构会在什么条件下运作？一个人如何确定其领域内实践的相对利益或损害？如果没有自知（即代表性）主体的反思、沉思和交流，我们如何理解不同形式的代理的功效？

本章回答了这些问题。1 我认为，非代表性革命并不仅仅为政治生活创造新条件，其基础是“更公正”的政治行动领域，其基本原则由政治代表控制。2 此类革命也不仅仅是旨在建立反机构，其唯一目的是破坏所有形式的代表，并等待可能出现新的、希望更好的东西的可能性。相反，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革命政治体是通过一个表达和参与的过程建立和维持的，其建立条件不断受到各种实践和不同程度受其影响的人的直接和内在的改变。

因此，本章对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政治体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回应。我首先认为，德勒兹、加塔里和萨帕塔派的革命的回归不是基于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代表过程，也不是仅仅基于拒绝所有形式的代表本身。其次，我认为，与代表和反代表的这两种危险相反，这种回归革命的政治体是由其参与性可变性定义的：要素和主体的参与改变了其条件的程度受此类条件的影响。我进一步认为，为了理解参与这个革命政治体的结构和功能，我们需要理解它在政治体的三个不同维度之间表达的独特关系：它的条件、要素和主体种类。代议制、反代议制和参与性政治机构都表达了这三个维度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为了发展一个关于特定革命性和参与性政治机构的理论，我借鉴了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中的融贯性（consistency）概念，但将其应用扩展到革命政治问题。第三，我认为萨帕塔主义者创建了一个基于他们所谓的“服从并领导”（mandar obedeciendo）的类似的革命性和参与性的政治体。德勒兹、加塔里和萨帕塔派共同制定了革命政治参与的战略。

一、政治团体

代表机构政治

如果身份和代表性政治的危机给我们今天带来如此巨大的问题，那是因为身份长期以来为西方政治本身提供了哲学基础和定义。除了少数例外，政治的目标是通过政治统一和被统治者身份的预设来确保集群“占领”这一基础和合法行动的机构：自然、种族或领土机构的身份；上帝、国王、社会契约或现代国家机构的身份；或者资本货币体的身份。虽然这些机构的运作可能不同，但它们都试图维持一种政治分配，这种分配可以将各种政治差异分类和组织起来，不同于代表或代表人们意愿的东西。

因此，在这些情况下，通过预设和随后重复基础机构本身的身份，使代表政治机构成为可能。因此，这个代表机构在填充和重复它的差异表达之前建立了一个政治领域，其政治元素差异化地代表和重复了这个先前领域的普遍性。加强或削弱特定领域的每个“不同”政治因素仅与它们普遍平等和可交换性的预先给定标准有关。这些表征过程在第1章作为地球主体、国家主体和资本主体进行了详细讨论。他们的主体形成也不例外。主体仅在这些条件和元素的预先给定范围内发生，这些条件和元素在共享身份的先验领域的一般冗余参数内代表、识别、反映和相互交流。这种统一的过程使相互冲突的差异能够通过地域共享的“生活方式”、政府强制执行的“权利/合同”体系或以利润为导向的世界“市场”得以融合和调解。当思想在预先给定的政治组织平面上代表不同的选择、思想、声音和欲望时，自我意识、理性和主体性就以这些政治身份模型为前提。例如，我们可以“自由”地买卖，但我们不能自由地结束私有财产。

我们甚至可以在先锋队主义的概念中看到这种政治代表体在起作用，因为它表达了：(1) 历史政治行动的相关条件的历史统一性和必然性：工厂所在地、阶级斗争、劳动力和推翻国家；(2) 以帮助或阻碍这种统一的阶级斗争为条件的要素的实际多样性：“x如何代表阶级斗争？”，“x如何重复其身体的身份？有利？不好？”；(3) 革命主体性、对真实历史物质条件的无产阶级意识和干预的认识论确定性的统一：夺取国家机器和工人阶级专政。先锋队代表着它的阶级，作为一种历史身份，由政治经济学提前决定，正如民选代表代表着他们的公民，由权利保护、选票统计等提前决定，而金钱代表着世界消费者的欲望，由劳动和资本的先验公理结合决定。根据代表权的政治，政治差异总是来自同一方和同一方内部的差异。

但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机构存在三个条件：

1. 代表性政治团体必然是排他性的，因为它们创始原则被排除在它们所构成的政治领域的根本改变之外。例如，根据定义，国家法律的制度本身不能成为法律行为，因为在其制度之前没有任何法律制度。以融贯性和条件相同为基础来创造一个政治领域不仅是自相矛盾的，就法律的创造而言，它是不合法的，它必然将某些人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以至于国家无法改变其建立的基础领土包容的条件。4

2. 因此，如果代议制政治机构成功地确保了对相对有利和不利的政治因素的评估标准，那么他们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些因素的等级制度，无论他们的平等主义主张是什么。⁵ 因为政治差异总是存在的。与其基础实体的初始身份不同，要素或多或少类似于其一般的承认措施：其领土归属、国家法律、其资本的市场价值。

3. 最后，代表性的政治机构只有通过使主体本身无法改变它的本质来产生审议的主体。身份主体只有在预设了与此类决策或行动相区别的无差别主体的身份时，才能够对政治行动和决定进行推理和深思熟虑。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投票给 x 位代表或 y 位代表，但一个人不能自由地拥有参与式民主而不是代议制民主。然后，政治主体要么基于其“自我透明”的愿望主张其积极自由，要么主张其消极自由不受其他人的限制，这些人会限制这种反思性已知的愿望。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只有在它是什么和想要什么的初始不变透明性的前提下，才允许主体改变或不同。⁶

反代表性政治团体

在上述代表权危机和自由主体所谓的死亡之后，基于拒绝一切形式代表权的政治反机构和战略激增。反代表性的政治机构不是将身份视为首要的，并根据它们对这种身份的准确表示来组织政治机构，而是将差异预设为首要的，并将其确认为一种完全外部于所有预先给定身份的政治条件。与其说政治差异与先前的身份不同，不如说它们本身就不同。反代议制的政治机构不是在不同的政治因素之前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政治领域，而是让政治领域对潜在的政治变革和尚未“到来”的人民彻底开放。因此，革命可以被重新设想为“在没有 [实际] 革命的情况下成为革命者” (Read 2009: 98)。

因此，反代表性的政治体将差异本身理解为所有政治转型的条件。因此，“政治”永远向所有可能参与其非排他性社区的人开放：奇点社区。各种不同的政治元素将分析这个社区的优势和劣势、健康和危险，而没有身份或代表性条件来定义等级，而是被理解为如此多的异质元素。所有这些元素都以嵌套关系相互关联，在每个层面都表明政治关闭的不可能，并使我们向进一步转型的潜力敞开大门。

根据这个政治体，主体本身不是仅仅在预先给定的身份政治领域内发生的主观转变，而是更大的“未定义的自由工作”的一部分 (Foucault 1984: 46)：它自身的转变超越了对某事或某事的“不言而喻”的欲望。差异主体不是形成一个统一的平面来评估、审议和决定不同的政治行动，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部分的和非个人的生成过程，由多重驱动和相互冲突的欲望组成，这些驱动和相互冲突的欲望使主体更多地作为结果或部分剩余物产生而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自我”。

但是，如何将“转型潜力本身”的政治付诸实践呢？或者，正如 Thomas McCarthy 和其他人所争论的那样 (McCarthy 1991; Fraser 1989)，差异政治仅具有与身份政治相对立的关键功能，而没有自己的连贯替代方案？因此，反代表性制的政治团体存在三个危险：

1. 由于转型本身不能由任何特定的政治领域来界定，因此它有可能确认参与的矛盾条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对矛盾心理的政治承诺似乎与已经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潜在犬儒主义并没有太大区别（德勒兹和加塔里 1983：266-7/225）。

2. 反代表性的政治机构也可能能够避免由与其原始状态或多或少相同的要素构成的政治所假定的巨大等级“存在链”，但只能以潜在等级“变革潜力”为代价。在元素和它们表达的潜力之间是可。虽然人们可以肯定它们的“平等能变得与它们不同的元素，但在它们具体存在的特殊性中，某些元素或多或少会比其他元素经历转变。这大致是最初在《德勒兹：存在的喧嚣》中的巴迪欧批评德勒兹的前建构主义作品《差异与重复》和《感觉的逻辑》，以及彼得霍尔沃德和齐泽克在他们自己的专著中反对德勒兹（也几乎完全引用德勒兹的前建构主义作品）。7

3. 同样，反表象的政治体避免了表象主体的静态特征，它永远不能改变“自我”的本质，而只能通过将自我扩散到无穷无尽的非个人驱动力中来：不断转变的自我。但是，如果没有预先给定的主体统一性，代理人/多样性如何在不同的政治决策之间进行审议和区分？主体潜力的极端矛盾和不可定位的过程似乎对分析作为许多当代抵抗运动核心的参与式民主的基本功能没有任何帮助（参见无处笔记 2003）。就主体性理论仅由其转化潜力来定义而言，它陷入了一种无休止的潜在变化的瘫痪，其权力不亚于身份政治。或者，正如霍尔沃德针对德勒兹提出的这种批评一样，“他放弃了决定性的主体，支持我们更直接地服从创造性生活的必要性”（2006：163）。

二、革命的政治团体

鉴于这些问题的挑战，我在下一节中提出，德勒兹和瓜塔里影响下的革命回归可以通过创建一个参与性政治机构来定义。我所说的参与性政治团体是指构成社会秩序的一系列政治实践，其中包含最大程度的相互和冲突转变。参与性政治体是一种社会秩序，它既改变了构成主体的主体，也改变了构成主体 8 的客体，并由它们平等地改变。它是一种新型的参与式民主或政治自我管理。⁹

为了进一步发展参与策略，在本节中，我借鉴了德勒兹和加塔里政治哲学中的融贯性概念，并扩展了其对革命政治的影响。我发现德勒兹和加塔里的融贯性概念特别有用，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构想出一个非代表性的社会组织，而不仅仅是基于对代表性的拒绝。早在《差异与重复》之前，德勒兹就已经制定了类似的自我管理哲学概念。“我们仍然是奴隶”，德勒兹说，“只要我们不控制问题本身，只要我们不拥有问题，参与和管理问题”（德勒兹 1994：206/158）。然而，直到《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融贯性理论得到充分发展和政治化。但即便如此，它也没有发展为一种关于革命政治体的理论。因此，本节的目的是扩展这一概念以发展这样一个理论。

但融贯性不仅仅是静态可预测性的另一种说法；恰恰相反。一个革命性的政治体是一致的，因为它 (1) 维持与表征过程的交叉点的建设性断裂或断裂；(2) 连接或巩固一组集群实践或行

动能力，这些集群实践或行动能力都已被类似地解域化；(3) 由构成它的各种元素和代理不断变换。因此，使一个革命团体政治一致的恰恰是它围绕一个地方确定的事件的参与性可变性。这三个特征中的第一个在第2章中详细讨论，后两个将在本节中讨论，借鉴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工作。特别是，我利用他们的融贯性概念及其三个组成概念——抽象机器、具体组合和机械角色——来理解非代表性政治机构的运作方式。¹⁰

激进政治理论的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定义明显非代表性社会秩序的问题。布鲁诺·博斯蒂尔(Bruno Bosteels)认为，革命政治需要“融贯性和持久性”(2005a:594)，也就是说，“事件的实施”(2004:104)，基于对事件后果的仔细“研究”，而不是将事件提升到存在之外的另一个维度”(2004:104)。或者，正如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所描述的那样，“阐明现实融贯性的参数和模式可能是什么，[以及]这种融贯性如何被调节和稳定”(托斯卡诺 2004:215)，而不是被代表。在这里，我当然同意博斯蒂尔和托斯卡诺的观点，除了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德勒兹和瓜塔里找到这样的理论。¹¹

就连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也对这样的任务表示同情。在接受 Cesare Casarino 采访时，Negri 声称德勒兹的政治哲学仍然无法将事件的本体论理论，作为变革的革命潜力，转化为“集群行动的逻辑”(Casarino and Negri 2004: 157)“充分描述权力的积极重组”(2004: 152)。“在德勒兹”中，内格里说——甚至在他最后的作品中——面对奇点总是有一种惊讶的昏迷感，总是无法将本体论事件转化为理性的预兆或图式，转化为结构(constitution)，或者甚至变成一个仅仅包含建设性元素的虚拟结构。总是有惊喜和机会。(2004: 155)

对于内格里来说，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如何将本体论基础转化为逻辑维度?”(155)，也就是说，转化为“集群行动逻辑的发现，在奇点的那一刻这种逻辑的构成”(157)。

无论内格里的批评对德勒兹是否公平，他的关注很好地阐明了当前工作的目标和挑战，尤其是本章；也就是说，尽管德勒兹和加塔里的政治哲学及其批评者的政治哲学存在某些局限性，但要推进从他们的政治哲学中提取的“集群行动逻辑”或融贯性，并与萨帕塔主义的革命实践并驾齐驱。这样做的目的是发现一种替代领土、国家和资本的代表性政治的政治实践，以及投机或自发左派的纯反代表性政治(见 Bosteels 2005b)。为了发展我所说的革命政治体的概念，我依次检查了它的每个组成部分：(1) 这个政治体出现的条件以及决定谁是其一部分的条件；(2) 表达和构成其主体的具体元素的分布；(3) 行为和改变身体的主体类型。或者，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这些组件是抽象机器、具体配置和机械角色。

革命性的抽象机器

一个革命的政治团体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出现并维持下去？是否存在一种不再受领土、国家和资本主义代表的旧模式制约的政治体？

在本节中，我提出了一种替代的政治条件，它既不是有限的、代表性的，也不是仅仅开放的，而是灵活开放的，并且可以由其成员改变。这种包含在政治体中的确定性但灵活的政治条件就

是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革命性的抽象机器。他们说，革命性的抽象机器具有四个不同的特征，我认为每个特征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革命性政治体的条件。

(1) 革命性的抽象机器既是奇点的 (Singular) 又是绝对的 (Absolute)

在诸如 1789 年革命、巴黎公社、1917 年革命等历史现象中，总有一部分事件无法归结为任何社会决定论或因果链。历史学家不太喜欢这一点：他们在事后还原因果关系。然而，事件本身是与 [décrochage] 的分裂，与因果关系的决裂；它是一种分岔，一种无法无天的偏差，一种不稳定的条件，开辟了一个新的可能领域。（德勒兹 2006：215/233）

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革命政治体的条件的出现与当前事态中的任何可识别的合法或合法事物都不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团体政治的条件标志着一个“奇点”事件。作为一个抽象机器，这种条件“不受任何正常或规范的因果关系”的影响，这些因果关系是从政治机构能够做的事情的已知可能性中推导出来的。一个革命性的政治体不仅建立了另一种文化身份、权利的主体或流通中的商品，它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包容条件，这种条件对于代表性权力的拓扑结构来说既是偶然的又是异质的。但这一新条件并不仅仅是拒绝所有条件本身。相反，革命性的抽象机器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和“不稳定的条件，开辟了一个新的可能领域”（德勒兹 2006：215/233）以及支持一系列放大的不稳定性 and 波动的事态（德勒兹和加塔里）1987：127/100）构成了政治体本身的局部斗争。就列宁而言，巴黎公社和 1968 年 5 月都是政治代表过程中偶然和异质的断裂，即奇点的，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革命性的抽象机器。

但革命的条件就像一台抽象机器，不仅在它是奇点的意义上，而且在它是政治体使自身存在合法化的自我参照基础的意义上。没有参考超然的政治权力（上帝、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利润等）来证明其出现的正当性，革命机构的条件仅指其作为自身存在的保证者，必须不断重申。作为概念和事件，”德勒兹和加塔里说，“革命是自我参照的，或者享有自我定位 [auto-référentielle ou jouit d' une auto-position]，使其能够以一种内在的热情被理解，而无需任何东西事态或生活经验能够淡化它”（1994：97/101）。虽然代表性政治机构代表其社会机构的统一，但革命政治条件作为偶然和自我参照，每次新的元素或机构影响它们的“重新部署”时，本质都会发生变化，就像一个永久改造的政治反馈循环。12’ 可能’，与相同的相反，德勒兹说，’ 不预先存在，它是由事件创造的。这是生命的问题。事件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它产生了一种新的主体性（与身体、时间、性、周围环境、文化、工作的新关系）”（2006：216/234）。

但是，革命政治体的条件也是“地方绝对”；也就是说，“一种在局部表现出来的绝对，并在一系列不同方向的局部操作中产生”，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革命性的抽象机器。它是一个奇点的普遍性（1987：474/382）或“绝对调查” [survol absolu]（1994：96/100）的点，其起源是偶然的和局部的，但其后果可能是无限的。

因此，一个革命的政治体从根本上包括任何想在其可变和可重新解释的条件下参与的人，但前提是这种参与改变了整个集群的性质。¹³ 因此，这个抽象机器的绝对不应该与保持不变（和预先给定）的身份的绝对或普遍相混淆，而只是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公理或元素，以在代表性民主和市场中被表示经济体。相反，当德勒兹和加塔里谈到革命的“生成-所有人/一切” [devenir tout le monde] (1987: 588/470) 时，这意味着每个人和一切都可以参与革命的实现和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当他们对事件的要求做出反应时，他们也被它改变了”（德勒兹 2006: 216/234）。

因此，参与革命的政治团体的条件就像一个抽象的机器，它是奇点的、自我参照的、包容的和绝对的。它的偶然性和局部性的出现，只有以自身为支撑，才能产生包容的、无限的后果，没有地域、国家或市场等代表或预先给定的标准或排斥。因此，参与的条件不仅允许每个人都可能变得不一样，它命名了一个奇点和绝对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并塑造与旧世界并驾齐驱的另一个世界的创造。德勒兹和加塔里说，它把革命假定为一个内在的平面，“无限的运动和绝对的勘测 (survey)，但 [仅] 在 [它的] 特征与斗争中此时此地的真实事物相联系的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只要早期的斗争被背叛，就重新开始新的斗争” (1994: 96/100)。

(2) 革命性的抽象机器是其政治体的“零度 (Degree Zero)”

革命性的政治体的状态，或者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革命性的抽象机器，也标志着政治体内部存在的最低限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的革命条件或事件是奇点的，它不能在正常的事态中表现出来。由于这种相对不可见性，德勒兹和加塔里说这样的抽象机器标志着“零度” (1987: 190/157) 或者是政治安排中“最解辖域化的元素” (1987: 177/142)。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仅仅表明这种转变的潜力在任何特定的转变中都无法实现，或者其实现只是背叛或讽刺。这种“零度”有一个特定的名称，这样一个政治领域就可以开始在其周围获得融贯性，形成一个“漩涡”或“循环参考点” (拉图尔 1999)，如“列宁”或“巴黎公社”的名称等等。

德勒兹和加塔里认为，政治融贯性不仅要求其开始具有自我参照条件，而且还要求这个起点带有某种标记，以表明其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安排的角度来看它的不出现在。法律和市场。此外，抽象机器在其自身的政治安排中也是不可见的。没有人完全知道它是什么或它能够做什么。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称其为“抽象”机器的原因。革命条件同样是“抽象的”，因为它并不表现为具体的“事物”。1968年5月不是具体的事物。从国家的角度来看，1968年5月并不标志着新的非国家主义、非资本主义政治的必要性。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使从那些致力于该事件的人的角度来看，1968年5月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这是一个真实而有争议的时刻，它的名字汇集了许多以前被边缘化的政治愿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利说抽象机器是“在每一刻都被给予的东西，在这个或那个状态，在这个或那个时刻”。但...本身不是被给予的” (1987: 324/265)，然而，不像在“梦中，某种没有被实现或只有通过背

叛自己才能实现”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真实的抽象”。.. 这既不是无差别的也不是超然的 (1987: 179/142)。

(3) 革命性的抽象机器支持实在性元素 (Concrete Elements) 的连接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按照德勒兹和加塔里的融贯抽象机器理论，维持一个革命政治机构的条件是：(1) 它的出现是偶然的，并且对所有形式的政治代表都是异质的；(2) 仅参照自身使其出现合法化；(3) 它表明在具体情况中的某种程度的真实的非显现。¹⁴ 但是一个始终如一的革命机构的抽象机器也支持所有具体的“解域化程度”的“结合、组合和连续体”^{15 16} 抽象机器并不代表它所制约的具体元素或解域化程度。它不代表他们或代表他们说话，也不表明他们是纯粹的生成。相反，抽象机器不存在独立于它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积极解域程度。抽象机器不是作为一个原因，而是作为一个吸引子或地平线，具体的行动和代理人围绕着它循环、竞争和相互转化。¹⁷ 在那里有一大群异质的政治不满、问题和权力危机（各种解域要素），一个革命的政治机构，就像一个抽象的机器，作为一个移动和灵活的点或专有名称，如“Zapatismo”、“人民的全球行动”或“占领”，不同的集群和不满可以围绕它联合起来并采取集群行动。

因此，德勒兹和加塔里说，抽象机器“使其他元素 [s it conditions] 跨越阈值，从而使它们各自的解辖域化结合起来，共享加速。这是抽象机器绝对的、积极的解辖域化” (1987: 177/142)。对德勒兹和加塔里而言，解辖域化的结合仅仅意味着在一致的政治安排中插入或“无等级排序”异质元素 (1994: 87/90)。¹⁸ 这使得完全异质的政治元素能够平等地构成一个事件，即使该事件被这个变量构成改变了。同样，革命实践的“共同点”只是它们与它们不断转变的条件的相对区别。因此，像抽象机器一样，革命条件的结合是“将各自的指标转化为绝对值” (德勒兹和加塔里 1987: 91/71)，并赋予多个具体元素一个特定的内在实践领域，无需外部参照领土，国家或资本。一个革命性的政治体不代表任何东西，它充当着一个可变的和有争议的标记，围绕着它，各种解域化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并呈现出融贯性。

(4) 革命性的抽象机器有特有 (Proper) 的名称和日期

最后，革命政治团体的条件有一个适当的名称和日期，作为各种斗争的共享和有争议的共同基础。我们可以在德勒兹和加塔里对这种抽象机器的描述中看到这一点：抽象机器总是单数的，由一个集群或个人的专有名称指定，而表达的配置总是集群的，在个体中就像在集群中一样。列宁抽象机器和布尔什维克集群配置。(1987: 127/100)

此外，抽象的、奇点的和创造性的，此时此地，真实但不具体，实际但未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抽象机器被注明日期和命名（爱因斯坦抽象机器、韦伯恩抽象机器，还有伽利略、巴赫，或贝多芬等）。(1987: 637/511)

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说法，抽象机器是一个“指定的专有名称” [noms propres assignifiants] (1987: 40/28)，它在集群行动的逻辑中运作，以“指定事件顺序的事物，”生成或haecceity（存在的个体性）’（1987: 322-3/264），如军事行动的名称或飓风的名称。专有名称不“代表”或代替其他东西；相反，它们是真实但非具体、实际但未实现的事件的标记，其存在只不过是构成它的所有影响、元素和机构。代表权；相反，它指的是一类“结果”，德勒兹和加塔里说，“这不仅仅是对原因的依赖，而是对领域的占领，以及符号系统的运作”（1983: 103/86）。

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加塔里将《千高原》写成一系列抽象的机器、平面或高原而不是章节的原因；每个章节/高原在开头都有一个名称、日期和一个图像或标语牌，以标记其“意义”的分布。高原的后续页面是实现这个专有名称的具体组合。但这一切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真正的非具体革命机器是如何具体实现的问题。

革命性的实在机械组合

在上一节中，我展示了如何为一个既不基于代表性也不基于反代表性而是基于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融贯性的革命政治体设想一种政治条件，我所争论的是参与式政治的一部分政治战略。如果我们今天真正回到革命的概念，革命政治体的条件不再是静态的、相对一成不变的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契约和权利，甚至世界市场的不可预测的波动。我们也不应该简单地完全拒绝所有政治条件。相反，我所建议的是，我们设想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秩序或革命政体，其基础是构成它的条件、要素和机构之间的最大程度的反馈和相互转换。这个机构不会受到代表制的限制（当一个人代表另一个人时，这通常会阻止政治条件的直接转变），因为一致的政治机构对人民的直接转变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这个身体也不是那么开放和易变，以至于它变成了一切，从而变得矛盾。换句话说，政治融贯性比表征更易变，但比自身差异的政治本体更不易变。

因此，为了理解一个革命性的政治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它的条件是如何运作的，而且还需要了解阐明和实现这些条件的具体因素是如何运作的。这是本节的任务。我所说的“要素”是指所有的行动、武器、工具、干预、口号、要求和职业，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革命序列。独立于这些具体部署的革命政治体是不存在的。

鉴于先前争论的代表性和反代表性身体政治所面临的危险，我在本节中提出了一个政治要素的替代概念，它是非等级的，但仍然是有序的，并且与政治体相互转化。这种在政治体中确定的但灵活的政治效果就是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革命性的具体组合。他们说，革命的具体组合具有三个不同的特征，我认为每一个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革命政治体的要素。

(1) 革命性的实在性组合实现了抽象机器

一个革命政体有一个真实而抽象的条件，它在政治权力的支配矩阵中，甚至在革命政体本身中，都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因此，仍然需要解释的是，一个革命政体是如何以各种不同的具体表达方式（实践、口号、行动、制度等）实现的。但是，这些具体的效果并不是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排序的，要么是身份（领土、州或市场）在顶部，要么是根本性的差异在底部。相反，继德勒兹和瓜塔里之后，实现革命条件的具体元素以不同程度的强度部署，并对其自身的实现条件作出反应。因此，政治体总是在经历一场持续的变革：参与式反馈循环。但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反馈循环掩盖抽象和具体机械装配之间的差异。”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机械装配“与抽象机器完全不同。”但仍然存在一个“共同适应”（1987:91/71）或两者的互惠前提（1994:74/77），允许中心化 (acentered)、非等级化、参与式转变（1987:31-2/21）。

在各个方面，只要抽象机器是在融贯性平面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被包裹在一个层次中，那么机器组合就实现了抽象机器。最重要的问题是：给定某种机器组合，它与抽象机器的执行关系是什么？它是如何实现的，有什么充分性？对组合进行分类。（德勒兹和加塔里 1987：91/71）

给定某种机器组合，谁是谁，谁不是革命的盟友或敌人，或者他们与抽象机器有什么关系，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决定，或者提前决定。这是因为一个革命性的政治机构正在不断地改变其抽象条件及其具体要素，因此 Deleuze 和 Guattari 坚持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人中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不断回答，转化和重新回答的问题。短期，中期和长期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在特定情况下实现它？什么支持革命，什么阻碍了革命，什么与革命无关？

德勒兹和瓜塔里说，不像“任意的或不一致的 [元素]”，“它们不能在一瞬间保持”，“实在性的组装就像机器的配置”，赋予它其融贯性的程度（1994:39/36）。“（内在的）平面”是抽象的机器，这些组合是工作部件”（1994:39/36）。为了把这一概念扩展到革命实践，革命政治团体的具体要素，如口号、示威、要求、行动和职业，都随着他们的条件而改变，正如他们改变了那个条件一样因此，它们不能被理解为仅仅遵循规定条件（法律、利润需求等）的“规范的”或“目标驱动的”效果。但这样的相互转变也不应被误认为是一种务实的“修正主义”，即假设被“检验”，被发现是否有效，然后被合理地（或以其他方式）相应地修正，从而为政治“进步”的叙事奠定基础。20

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融贯性的政治是革命性的，它不是对预先给定的问题（例如，如何确保每个人在一个预设的状态下被公平地代表）应用解决方案，或简单地肯定“其他问题是可能的”，特定问题本身直接由实施这些问题的人以及受这些问题影响的人改变。德勒兹和瓜塔里说，“当人们要求自己表述他们的问题，并至少确定在何种特定条件下，他们可以得到一个更普遍的解决方案”，就存在一种融贯性的政治：没有代表或调解的直接参与（1987:588/471）。因此，这种参与和自我管理提供了一种政治选择，与基于民族血统的领土等级制度、基于主权的国家等级制度（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基于财富和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绝对不相容。

(2) 革命性的实在性组合创造了内融贯性

一个革命性的政体标志着与代表权力的决裂，并创造了一个结合了一套新的具体实践的事件条件。然后，这些实践会重新开启，并在参与反馈的社会秩序中改变他们的状况。但是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这些机械的组合，或者我所说的是一个革命主体的具体实践，也在这个革命主体中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内在融贯性。我们如何确定哪些具体实践或多或少属于同一斗争、顺序、联盟等等的一部分？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在“没有等级的秩序”或“没有同质化的平等”的政治中发挥作用？

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具体的机械装配具有一种内在的或内在的融贯性，“使组件在其内部不可分割”。他们说，有一个 ab 区域，它同时属于 a 和 b，在这里 a 和 b “变得”不可分辨。这些区域、阈值或生成，这种不可分离性定义了安排的内部融贯性 (Deleuze 和 Guattari 1994: 25/20)。就一个革命的政治团体而言，这只不过是说，它的具体实践是有不同的关系的，或多或少的关系的，是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具体实践都不会在不影响某些其他实践的情况下独立行事。因为，正如前面所论证的，对于这样一个革命主体的合法性，历史必然性、上帝、理性、国家等等，并没有先验的或外在的保证，而抽象的机器在它的具体效果之外，也没有存在，那么，这些具体的效果只通过它们的内在关系，即它们的内在融贯性，与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德勒兹和瓜塔里说，“作为零碎的整体”，实在性机器“甚至不是一个拼图的碎片，因为它们不规则的轮廓彼此不对应”。然而，它们确实“形成了一堵墙，但这是一堵干石墙，所有的东西都只能沿着不同的线连接在一起” (Deleuze 和 Guattari 1994: 28/23)。因此，德勒兹和瓜塔里说，实在性机器“没有参照；它是自我参照；它在它被创建的同时设定了它自己和它的对象” (1994:27/22)。

通过在一个政治事件中创造一个不可分离的、成为或一般平等的要素来规避代表性政治主体的等级制度是一回事，但这种肯定虽然重要，但不足以阐明这些要素之间的有序关系。同样，在一个革命的政治机构内，它的所有具体实践也并非同样重要。政治革命可能是“一个融贯性的问题：异质元素的“团结”，但它也是一个创造一个可变社会秩序的问题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398/323)。

因此，Deleuze 和 Guattari 在谈到具体的配置时认为，它是“完全不同的元素的合成，仅由融贯性的程度来定义，这种融贯性使得区分构成聚合的完全不同的元素成为可能 (可辨性)” (1987:424/344)。这些可识别的程度或个体然后就能”与其他程度，其他强度一起进入合成，形成另一个个体” (1987: 310/253) 所有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这个或那个解域化度” (1987:127/100) 的序中能够始终把握安排 (1994:87/90)。一个具体元素越积极地解辖域化或差异化，它在政治安排中的表现或构成就越弱，就越接近零度或抽象机器。“解辖域化”程度越低，它就显得越强大，构成主导的政治安排，也就越接近于建立政治统一。21 同样，革命政体创造了一种非等级秩序，因为它不是因果秩序，也不是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权力秩序，而是

因为社会团体中的某些做法更为重要，或者更容易被权力所左右。一个革命团体的目标是提高其对权力的威慑程度，同时连接、维持和捍卫已经解放的更大程度。

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这些解辖域化的融贯性程度会受到两个限制：一个悲观阈值，或者零度，在此之后融贯性会被打破或消散为不融贯性；以及一个最大的极限，在此之后，它被爆炸或被集合在其他东西之下，比如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在不一致和表现之间存在积极的解辖域化程度的融贯性。德勒兹和瓜塔里说，就像蝗虫的力量一样，“受到两个限制：盛宴结束后的最佳极限，和斋戒等待的悲观极限，有一个最小的革命门槛，在那里，民众的支持，热情或承诺减弱到这样的程度，其融贯性失去了，并且存在一个最大的限制，在此之后，它将不再属于政党或国家机器（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314/257）。革命性的融贯性的目标是相应地用新的元素、机构和装置来占领和填充中间层。因此，存在着要素的非等级性（事件的效果）和要素的非同质多样性（要素在安排中所包含的程度）。元素的排名并不取决于它们如何确认一个预设的身份或自身的差异，而是根据它们在特定事件中创建强或弱融贯性的程度，在局部和非层次上进行排序。

(3) 革命性的实在性组合创造了一种外部融贯性

一个革命性的政治团体不仅创造了其具体实践的內部融贯性，而且也创造了外部融贯性，将其与外部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此称为具体组合的外部融贯性：其内部邻域或融贯性是由其组件在不可区分区域的连接来保证的；它的外部邻居或外部融贯性是由桥梁从一个[机器]抛出到另一个时，其中一个组件饱和……[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在不改变[程序集]性质的情况下添加或提取组件了。（1994: 87/90）

同样，一个具有具体实践的革命政体不仅包括那些参与其内部变革的人，而且还旨在包括尚未参与斗争的其他人。也就是说，革命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广泛性。它有能力在当地建设之外实现内部转型和外部增长。

革命的政治角色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论证过，我们使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融贯性概念，由一个抽象的机器和具体的组合组成，来理解参与过程，它形成了一个革命政治主体的基础，这个政治主体既不同于代表性政治主体，也不同于反代表性政治主体。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人物角色概念如何从其在《什么是哲学》中的有限应用扩展开来。并与革命实践相关。这是本节的任务。

革命学科的概念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方面，主体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相同的基础，以此来行使表达自由或不受支配的自由。问题是，这样一个主体本身不能改变它是什么，只能通过预先给定的思考的自我来支持或反对某物，这种思考是以各种形式的政治表征（领土、国家、

首都)为模型的另一方面,主体可以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转化的一种能力。但这个概念只有把主体性的能动性分散为一种纯粹的可能性,才允许有主体性。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想提出第三个革命主体性理论,这一理论来自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概念人物。23

反对 Peter Hallward 的主张,Deleuze 和 Guattari 的主体性概念是“衍生的”或“溶解在创造性的必要性中”(2006:163),相反,我认为,通过扩展他们的人物角色概念,我们可以阐明一个由“当地操作者的干预”定义的革命主体性理论,该理论将革命主体的状况与其具体后果联系起来(德勒兹和 Guattari 1994: 73/75)。角色并不是经验、理性反思、话语、表征或差异/创造性的主要主体(尽管这些肯定是某种主体性)。它们不以任何方式超越政治机构。相反,他们是一个政治团体的主体,也在这个政治团体之内。它们是抽象条件与具体效果之间联系的内在过程。德勒兹和瓜塔里说,人物角色有三个明显的特征,我认为每一个特征都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新的革命主体性。24

(1) 革命角色对国家进行内在的干预

革命国家是不断变化的条件和具体实践的集合,而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是革命主体。然而,革命条件和它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冲突的过程,因为,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人物角色,有不同类型的人物角色,根据的是他们在同一路径上和集群中发生敌对冲突的可能性。但通常很难确定这是同一集群,同一类型,还是同一家族。(1994: 74/77)

即使在同一个政体内,也有不同类型的人物或主体对社会领域的结域、解辖域化和再结域化的秩序和后果提出质疑。德勒兹和瓜塔里说,这些形式,是三个运动混合在一起的不可解的结,为了解开它们,我们必须诊断真实的类型或人物。商人在一个区域内购买商品,将产品从一个区域内分离为商品,然后在商业线路上重新划分区域。在资本主义中,资本或财产不再被结域化,而是通过生产手段被再结域化;而劳动变成了“抽象的”劳动,在工资方面被重新界定: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不仅谈到资本和劳动,而且觉得有必要描绘出一些真正的社会心理类型,既反感又同情:资本家,无产阶级。(1994: 66 - 7/68)

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物不是自知的主体,独立于“解域化”和“再结域化”的过程,他们在更大的社会团体之外决定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它们也没有完全被吸收到纯粹的转化过程中。相反,“无产阶级”和“资本家”是整个社会集群的特定人物或“终端”,他们定位、区分和连接各种政治实践,并通过社会主体(Guattari 2008: 371)。也就是说,他们的主体性本质上不是有意识的、理性的、情感的、具身的、经验的,也不是建立在任何其他的先验整体之上的。相反,人格存在于他们的社会身体内。

以德勒兹和瓜塔里的马克思主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被用来理解一种具有明显革命性质的主体性。“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格是马克思革命实践的主体。“无产阶级”的形象在“共产主义”这一具体的(最大程度地解辖域化的)抽象机器和“工人集会”这一具体的(解辖域化程度的)机器之间来回穿梭,这些“工人集会”由各种口号、直接行动、工厂复建和自我管理

努力组成。在没有反思、沉思或交流的情况下，一种革命的主体性介入了一个政治代表的过程，并将不同程度的解辖域化劳动力相互联系起来（自我管理），同时防止私有财产和资本的再领土化。因此，根据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观点，政治人物的角色是“在最无关紧要或最重要的情况下，使领土的形成、解辖域化的载体和再结域化的过程变得可察觉”（1994:66-7/68）。因此，一个政治人物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决定了一个政治团体在哪里形成领土，解辖域化那些领土，把那些解辖域化的元素相互连接起来，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代表来避免再结域化。

Deleuze 和 Guattari 说，就像“跑者或调解人”（1994:62/64）一样，“角色需要将逃逸线上的概念联系起来，就像逃逸线本身需要被布置一样”（1994:73/75-6）。“但这两种操作并没有在角色中融合，角色本身是一个不同的操作符”（1994:73/76）。因此，正如 Peter Hallward 对德勒兹早期的代理理论所提出的那样，德勒兹和 Guattari 的政治人物理论远没有被分解成一种纯粹的转变（或否定的解辖域化）的肯定，而是基于两种特定的干预：一个抽象机器的布局，以及它与填充机器的具体机器的连接。

困难就在这里：没有革命，就没有革命的主体性；没有革命的主体，就没有革命的主体性。然而，德勒兹和瓜塔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相互假设对方的前提下，两种干预同时发生；他们说，问题和解决方案是共同给定的（1994:75/ 78,79 /82）。“有时”德勒兹和瓜塔里声称，“人物角色似乎在平面之前，有时在平面之后——也就是说，它出现了两次；它干预了两次”（1994:73/75）。一方面，政治人物提取抽象机器的决定，“好像它抓住了一把骰子的机会，以便把它们扔到桌子上”，另一方面，它在掷骰子的每一次与占据桌子这个或那个区域的成分（实在性组合）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Deleuze 和 Guattari 1994:73/75）。因为，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革命中“只有内在的标准”，这些运动的政治人物在表达和决定这些标准时也是内在的（1994:72/74）。

人物角色对这些相互决定的标准的奉献从而形成了政治“承诺”或“信仰”的结构。“人格关注那些相信世界的人，”德勒兹和 Guattari 说，不是世界作为一个事物的存在，而是它的特殊可能性和强度，从而再次产生新的存在模式（1994:72/74）。在对德勒兹的采访中，安东尼奥·内格里问德勒兹，他认为他的主体概念的政治后果将是一种新的军事实用主义。德勒兹回应说，我们最缺乏的是对世界的信念，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世界，它已经被夺走了。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你会促成一些事件，无论它们多么不起眼，多么难以控制，你会创造出新的时空，无论它们的表面或体积多么小。”（1995:239/176）政治人物正是这个新世界的内在信念，这个世界既是“现在此地”，在用来实现抽象机器的具体机器中，也是“无处不在”，在不断被改造的抽象机器中。因此，作为革命主体的人物，致力于创造新的生存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有多小，都将与他人联系起来，以构建一个新的革命政治团体。

(2) 革命角色具有不同的特征

革命的政治人物没有基于他们意识的主观融贯性的心理或人格特征，他们也不仅仅是断裂或解体的“自我”。相反，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它们具有截然不同的病态、关系、动态、法律和存在特征。因此，革命人物在具体的和抽象的机器之间创造了具体的不同种类的融贯性和关系。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什么是哲学？我想在本节中对这些人物进行扩展并明确政治化(1994:68-71/70-3)。但在依次发展这些特征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类型的局限性，并澄清其缺乏任何对全面普遍的政治人物列表的自负。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没有一个概念性人物角色的特征列表是详尽无遗的，因为它们不断出现，并随着内在层面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的逃逸线上，不同类型的特征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物角色。”角色不是没有冲突的统一的静态存在，它们也不适合任何详尽的类型列表。因此，“在特定社会的特定时刻，很难决定哪种类型是好的类型”(1994:67/68)。尽管困难重重，表达它们的任务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更像是一种创造或参与，而不是一种代表。

首先，政治人物具有可悲的特征：白痴，一个想要为自己思考的人，是一个可以改变并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人物。但也有疯子，一个麻痹的思考者或“木乃伊”，他们发现自己在思想中没有能力思考；或者一个伟大的疯子，一个疯狂的人，他在寻找先于思想的东西，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却在思想本身的核心。(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4:68-9/70)

这些可悲的人在政治领域中有着特定的激情、性格或痛苦，这影响了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建立的各种联系。这些可能有助于理解革命政治人物的悲剧性特征：革命悲观主义者，为了保持道德优越感，只要求不可能；像“木乃伊”一样在革命中发现一切集群行动的无望的失败主义者；或者甚至是被内疚驱使着不断采取行动的狂热激进分子。

第二，政治人物具有关系特征：“朋友”，但只是通过所爱的事物与朋友建立关系，这就带来了竞争。”争论者”和”竞争对手”就事物或概念发生争吵。(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4:69/71)

可以根据角色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来定义角色。考虑一下“compa”(compañer@的缩写，或伙伴/同志)的政治角色，萨帕塔斯特创建它是为了指定某种类型的主体性。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的关系，只有在双方都在为相似的条件、原则或具体的行动而斗争的情况下才成立。这就带来了关于“革命目标”或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的冲突。“革命的”和“反动的”则为斗争的目的和手段而争吵。

第三，角色在经历转变或移动时具有动态特征：

如果前进，攀登和下降是概念人物的动力，那么像克尔凯郭尔那样跳跃，像尼采那样跳舞，像梅尔维尔那样跳水，对于哲学运动员来说是不可减少的。(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4:69/71)

就政治人物而言，我们可以将直接行动、破坏和大规模示威(以及其他)视为集群主体动态。撤退、妥协、占领、躲藏、攻击、防御和组织都可以被视为政治人物的动态。马科斯副司令的托词、《San Andrés Accords》的谈判和萨帕塔斯塔自治学校的教学都是该协定的动态特征。

第四，政治人物具有司法特征，因为集群行动“对属于他们的权利提出要求，并从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起就面临正义” (Deleuze 和 Guattari 1994: 70/72)。但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思想中并没有一种超越性的观念，即通过法律或价值甚至良心的美德来进行判断。相反，政治人物的司法特征是法官和无辜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审判发生在事件存在的纯粹内在标准之内 (Deleuze 和 Guattari 1994: 70/72)。内在正义可能意味着超越善与恶，但并不意味着超越善与恶。想想萨帕塔派领地的 caracoles 和人民法庭。这些领土的村民 (以萨帕塔的名义) 没有由司法部队 (索解阵线) 进行非正式审判，而是开始轮流参与人民法院，以便对毒品和人口贩运、森林材料的非区域使用等法律问题作出反应，还有各种各样的社区纠纷，他们声称是自己的权利: 自治。社区成员 (男女都有) 轮流学习如何使用他们在墨西哥政府或企业利益之外建立的价值观和法律所固有的这些法律特征。

最后，政治人物具有存在特征: 日常生活的小方面构成政治斗争的意义。德勒兹和瓜塔里提供了哲历史上的一个例子: “康德的吊裤带难道不是适合于理性体系的重要轶事吗?” 他们建议。斯宾诺莎喜欢蜘蛛之间的战斗是因为伦理学中模式的关系 (Deleuze And Guattari 1994: 71-2/72-3)? 我们还可以考虑列宁在音乐方面的品味、马科斯对诗歌和艺术的运用，还是马克思的健康问题，或是 Copas 对 PoZoL (发酵玉米粥) 的品味等等? 这些特征如何有助于角色的运作和事件的实施?

虽然有很多政治人物更多的功能，它仍然是一个革命性的主体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阐明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不同种类的角色工作和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特定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肯定他们成为其他能力。

没有规则，最重要的是，没有讨论，会提前说这是好平面，好角色，还是好概念; 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决定了其他两个是否成功，但每一个都必须基于自己的目的构建——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发明，另一个是布局。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构建，我们可以说，“失败……“成功……”但这只是随着我们的前进，并建立在它们协同适应的基础上。(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4:79/82)

(3) 以第三人称表现革命人格

革命主体具有竞争和参与其条件和后果的直接转化的各种类型的主体性。但是，这些人物的行为或说话并不是从第一人称的自主自我的角度出发，而是以第三人称 (他、她、他们) 和不确定的 (一个、每个人、任何人等等) 作为革命国家的内在代理人。第一人称通常表示自觉的表达主体，对独立于它的政治安排做出决定，第二人称指明第一人称的投射，第三人称人格角色表示一个不确定的集群主体，总是与国家共同适应。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说，我们相信……不确定的第三人称，HE, THEY, 从这个观点来看，并不意味着不确定; 它将声明与集群代理联系起来，作为其必要条件，而不是声明的主体。Blanchot 是正确的，他说，一个人正在死亡，他不快乐，不能取代主体，而是废除任何主体支持的个体性布局 (agencement

haecceity) 类型, 或带出事件只要未成形的, 不能被人刺伤 (的事情发生在他们, 他们只能控制又说我放手的能力)。高等教育并不代表一个主体, 而是描绘一个主体的作用。(1987: 324/265)

因此, 与纯粹的转化潜能的“不确定性”, 或表述的表征第一人称 (基于沉思、反思和交流) 相反, 第三人实现或制作事件的图表, 只有在集群集合中是内在的。人物’ 无限期 (indefinite)’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不是人独立于事件看, 法官决定应该如何进行, 但它们’ determinate (固定)” 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是由第三人表示, 与集群布局。因此, 人物角色从来不是一个人或意识, 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他们”或“每个人”, 影响着抽象和具体机器的生成、折叠或共同适应。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说, 我不再说我了。“我再也不说那个字了; 这太愚蠢了。每次我听到这个词, 我都会用第三人称代替。”重要和讽刺的一点是, 它不是一个永远不会再使用代词第一人, 但角色的言语行为总是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言语行为 [s] 在第三人总是说“我”的概念角色 (德勒兹和 “1994:63/64)。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我”和“你”并不是没有意义; 更确切地说, 关键在于它们是由事件的更主要的第三个角色派生或制约的。“我”和“你”作为政治事件的不同特征发挥作用, 这些政治事件参与了当前集群集会内在的谈判和冲突, 而不是作为独立意识、自我、激进的他物或超越集会之外的特征。

比起代表或谈论一个政治事件, 角色或化身始终是一个操作的内在代理, 并与它帮助创建和连接的抽象和具体机器有关, 在局部确定 (参见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3: 22-3/16)。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 革命的政治“主体”并不是简单的“去中心”; 它是一个特定的集群表述或政治融贯性的共同适应的组成部分。在扩展并明确政治化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人物角色概念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解释一种不同于表征型和反表征型的新型革命政治主体的。伴随着德勒兹和瓜塔里所发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回归, 革命主体概念的回归。这一主体的结构不是基于静态和预先给定的政治条件 (领土、国家和资本) 的身份, 也不是仅仅分散的, 而是一致和参与性政治机构的第三人部分。

三、萨帕塔主义与参与性政治体的创造

在上一节中，我论证了，相对于代表性和反代表性这两种危险，存在着第三种类型：参与性政治主体。这个新的政体是由它的参与性可变性来定义的：它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被它所影响的要素和主体的参与所改变。我进一步认为，为了理解这个参与性和革命性的政治主体的结构和功能，我们需要理解它在三个不同维度之间的独特关系：它的条件、要素和各种主体。代表性的、反代表性的和参与性的政治团体分别表达了这三个维度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但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发展。

在下一节中，我将论证萨帕塔斯在实践中创造了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参与性的政体。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就是我所说的革命参与战略。萨帕塔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它不能被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所理解。萨帕塔主义放弃了建立在政治和司法代表基础上的主权概念，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先锋队主义、国家夺取、阶级斗争和“最终”决定经济的基本原则。马科斯和 EZLN 早期，到达在恰帕斯，发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Leninism，猫主义偏见’完全不足与当地交流”，并最终得出结论，原来计划’霸权和专制的斗争（罗斯 2006:14）。但萨帕塔主义不是一场“后现代”革命，因为他们只是拒绝这些形式的代表，或者支持所谓自发的或投机的左翼主义。相反，他们构建了一种基于参与的新型政体。他们称这个过程为服从 *mandar obedeciendo*，或通过服从来领导（*leading by obeying*），但是什么是服从来领导，它又是如何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实践发挥作用的呢？

也许，新的政治道德是在一个新的空间中建构的，这个新的空间将不是夺取或保留权力，而是包含并迫使权力“服从统治”的制衡和反对力量“服从统治”不在“政治科学”的概念之内，它被定义我们所遭受的政治活动的“效率”道德所贬低。（马科斯 2004b:217）

因此，萨帕塔主义者发明的新政治体，其社会秩序和包容的条件必须服从于具体的要素，服从于同样的社会秩序。萨帕塔主义的定义是这种互惠治理，而不是采取代表性权力或拒绝所有政治组织。因此，服从并领导表达了一种政治眩晕或参与式反馈循环，在服从并领导者的领导者和必须领导领导者并服从的领导者之间。*Mandar obedeciendo* 打破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传统政治区别；它“通过行动来制定规则”。服从并领导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三个不同维度的相互转换：革命条件、具体实践和革命主体性的形式。

革命状况：“萨帕塔，1994年”

作为一个国家，萨帕蒂斯莫为社会秩序和包容创造了新的条件。就像1789年的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1917年的革命一样，萨帕蒂斯莫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因为它无法还原为历史上必要的因果链。1994年，在墨西哥，Zapatismo认为在目前的“事态”中没有任何可认可的法律或合法的政治事物，也就是说，没有政治代表（政党）、市场代表、语言代表（他们的语言不被政治代表使用或承认）或由当地土著领导人（领袖）代表。Zapatismo的存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它不可能从它产生的“权利”、“商品”或“阶级斗争”的领域中推断出来。从墨西哥政治的代表性角度来看，萨帕斯被边缘化和没有代表的萨帕塔斯派没有“合法”的存在，但无论如何，他们在政治安排中内在地和异质地共存。因此，萨帕塔斯莫的独特事件并不以“权利”、国家的推翻、新的市场经济或新的民族主义等代表要求为条件，而是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自己的自我参照或自治。

但是萨帕塔斯的政体的条件也是普遍的，因为它的结果是包容和无限的。“生成-萨帕塔人”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由EZLN代表，或者你必须土著，甚至来自墨西哥。但是Zapatismo不能代表任何人想要的任何东西。Zapatismo的意思是参与到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程度上进行直接自我管理。没有一个先验的或不可改变的排除条件，萨帕塔派已经明确表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萨帕塔派，只要他们能分享他们的斗争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随后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欧洲、亚洲、北美等）参加了这个世界性的活动。因此，萨帕塔斯特不是简单地肯定他们的差异和不可代表性，而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绝对事件/干预，并赋予其自身的特定融贯性，与政治代表制度相异质。这种独特的普遍性实际上是通过Encuentros（国际聚会）²⁷的创立而形成的，该组织旨在包括其他的人，这些人每次见面都会改变Zapatismo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性质（见Chatterton 2007）。

但是Zapatismo并不代表任何人。相反，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政治体条件，Zapatismo动员一个适当的名称或标志作为一个吸引子或地平线为所有那些不合法的元素在萨帕斯’存在’，他们在政治上的看不见的，他们被边缘化或消失或被政府（收入过低，没有土地，non-Spanish-speaking，土著campesin@s）1994年，“zapatismo”这个正式的名字开始流行，不是为了代表这些人，而是为了标志他们在墨西哥政治中的不可见性。恰当的名称“zapatismo”提供了一种标志，人们可以通过它说话。因此，当马科斯与墨西哥政府对话时，他并不代表萨帕塔斯派，而是被称为“其他运动”的“零代表”当一名普通代表代表或代表墨西哥人民时，“零代表”则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标志，即在墨西哥看来不属于合法的政治存在。这个零是一个积极的指示，指示了正在被说话的东西，没有指称或表征。它表明了“其他政治”的条件。

这个条件标记“Zapatismo”并不代表Emiliano Zapata、Marcos或无数Zapatista的总和，而是像一个纯粹的不定式“to Zapatista”，在一个具体的集群行动领域中，循环和改变以这个名字为标志的政治体。因此，萨帕蒂斯莫在实现和相互转化它的具体实践之外是不存在的。作为集群行动的一个条件，它必须一步一步地加以阐述，而且总是不断变化的。口号

“Todos somos Zapatistas!” (“我们都是萨帕蒂斯塔人!”) 证明了这一进程的普遍性。这一口号创造了一种无形的转变，也就是说，世界的真正变化不一定或立即是物质的或物质的。作为一种与革命政治体的条件相联系的言论行为，它汇集了全世界所有“不存在”和边缘化人民的团结行动、示威和庆祝活动。每次“我们”中包含新的人或事物时，Zapatismo 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并变得更强烈，就像节日的不同重复一样。³⁰ 这是我所说的参与性政治体的一个特征，发生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和萨帕塔斯主义者的政治实践中。这就是为什么萨帕提斯人有如此多的庆祝活动和洲际活动：不是提供新的法律或计划，而是每年“重新部署”并改变萨帕塔本身的性质。”正如德勒兹（1994:8/1）所说，他们不会在第一次权力基础上增加第二次和第三次权力，而是将第一次权力赋予“第 n 次”权力。

Zapatismo 还创造并结合了不同重要性、邻近性和强度的各种具体实践。例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劳工活动人士都可以被平等地视为萨帕塔主义者，如果他们采取并遵循其后果：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直接民主而斗争。它们的重要性和强度都不同，都是有序的，但不是由权力和控制的等级制度决定的。

革命的具体实践：萨帕塔自治市

萨帕塔斯创建的国家不仅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普遍的条件，通过这个条件，在其社会秩序中结合并包括各种具体的实践，而且还创造了各种具体的实践，这些实践对他们的条件产生影响并作出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具体的实践是“服从”的，因为它们政治上受到萨帕塔特有的普遍事件的制约，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领导”的，因为它们能够通过直接参与来改变这种条件。例如，萨帕塔人建立了 38 个自治市，覆盖恰帕斯州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以具体实现其政治体真实但“无形和抽象”的状况（罗斯，1995 年）。这些自治市是萨帕塔派对 1996 年《San Andrés Accords》的执行，该协议在拒绝执行后于 1996 年 12 月被放弃。《协定》保障土著人民组建和管理自己城市的权利。在组成市政当局时，居民拒绝官方当局的代表，选举他们自己的轮流和可罢免的行政人员。他们称自己为“当地健康促进者 [和] 土著议会，并根据不同族裔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性别平等制定自己的法律”（Mora, 1998 年）。市政当局根据其选民的参与和直接共识，通过军政府（裁决争端的委员会或内阁）的轮流治理，做出自己的决定。分配资金并登记工人合作社）和秘密革命土著委员会（Comité destino Revolucionario Indígena, 或 CCRI）。但这种参与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萨帕塔斯派还在以集群所有制、工人控制和自我管理为基础的工人合作社的具体实践中发挥其政治主体的作用。这里没有老板、地主或资本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共享繁荣的参与式经济。他们的条件的这些具体效果无论如何都不是完美的，但他们创造这些具体表达的目的，正如 Guattari 所说，是为了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联系的结构和装置：一种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一系列问题，

不从中心点开始安排元素, 将它们插入控制网格或建立一个议程, 但是, 恰恰相反, 允许各种奇异过程尝试根茎的展开。这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它不工作。(“2008:178)

萨帕塔斯对其政体的具体实施是他们为最大程度的参与和“在被证明无效的正式民主标准之外构想的自我管理”(Guattari 2008: 391)。

萨帕塔人为他们的活动创造了一系列具体的表述: 废除酒精, 在军政府中实行轮流参与式自治, 收获咖啡和蜂蜜, 在合作社中编织和工作, 接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以“我们都是萨帕塔主义者”的口号, 参与与他们在世界各地进行“公平贸易”的横向合作经济。正如马科斯所说, “孩子、鸡、石头, 这里的一切都是萨帕塔。”³¹, 在马科斯看来, 萨帕塔不是政治意识形态; 它没有规范性的规定, 也没有在其表达之前给出必要的结果。它既不是政党, 也不是先锋队。相反, 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和具体分布: 孩子、鸡和石头都成为 Zapatismo 的具体身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具体元素都是完全相同的。campesin@s 以“萨帕塔派”的身份进行种植、生产、饮食、销售、教育、学习和管理的人, 当然, 不应该与那些在欧洲、美国或其他地方与他们团结一致、撰写有关他们的学术文章、给予他们帮助等的人混淆。Zapatismo 的每一个元素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并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和利害关系, 尽管每一个元素都有助于构成另一个元素。然而, 这些要素并不存在于权力和知识的层次结构中。它们是根据强度和重要性来排序的, 而不是等级。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项目站在最高的位置来命令这样的等级制度。

即使在萨帕特斯塔的领地内, 也存在着与萨帕塔主义相关的强度程度。caracol Oventic 的“一月一号靴子合作社”必须从亚洲进口靴子鞋底, 但 Yachil 咖啡合作社完全是 Zapatista 拥有和管理的。进口靴底可能会显示出较小程度的萨帕塔的力度(相对于当地生产、自我管理和经济公正的目标而言), 而当地生产的咖啡合作社则会显示出较大程度的萨帕斯蒂莫的力度或强度。Zapatismo 的这种部署程度在不断变化, 例如, 当加拿大的无政府主义靴子合作社开放销售 Zapatista 的靴子鞋底时, 这种部署程度就会增加; 或者当销售 Zapatista 咖啡的合作社 cafés 因为星巴克的进驻而倒闭时, 这种部署程度就会减弱。因此, Zapatismo 被执行的要素和程度是多种多样的, 其融贯性的程度并不构成权力的等级制度, 而是一种与事件相关和事件内部的关系秩序。但是,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萨帕塔主义者创建的参与性政治体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创造了具体实践的融贯性, 而且还将这些具体实践与融贯性之外的实践联系起来。萨帕塔斯派已经具体地将他们的斗争扩展到本土以外, 并扩展到整个世界。如果萨帕塔主义者制造了一场完全本土的、种族的或民族主义的起义, 它将有可能成为萨帕斯或墨西哥边界内有限的、局部的、饱和的斗争。然而, 1994 年以后, 情况变得很清楚, 萨帕塔斯可以造反, 但如果没有来自墨西哥境外的国内和国际民众的支持, 他们就无法与墨西哥军方竞争。因此, 萨帕塔斯要求世界把萨帕塔斯莫看作是每个人的斗争。他们说’ Detrás de nosotros estamos ustedes(“我们是你的后盾”) 和 todos somos Marcos(“我们都是马科斯”)。

没有媒体的关注和人权观察，使准军事部队陷入困境，没有资金支持、合作网络、急救和国际社会的供应，萨帕塔在几个方面面临内部饱和的风险。它冒着物资耗尽的危险，被迫对墨西哥军队采取绝望的暴力行动；出于对政治改善的绝望，它冒着成为改革运动的风险；它冒着成为没有任何全球视野的宗派、民族主义或本土运动的风险；它甚至冒着倒退到军事先锋队和社区内的父权等级制度的风险。

具体的实践创造了这种外部和广泛的联系包括萨帕塔斯接收来自恰帕斯各地的难民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举办跨洲的 Encuentros 活动，帮助墨西哥各地许多左翼社会运动的斗争，并为非萨帕塔派人士，甚至是其社区内的反萨帕塔派人士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尽管萨帕塔斯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与他们共享某些活动或资源的所有团体或个人，但至少萨帕塔斯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地方建立桥梁。超越了意识形态、地理位置、身份认同，当然也超越了对自身差异的肯定，萨帕塔斯派建立了一个由外部融贯性组成的庞大全球网络。

革命政治主体: The Compa

服从并领导不仅意味着创建一个革命的政治团体，实施一套具体的实践来维持它，并遵循它的后果，还意味着创造一种新的主体性形式，使两者在相互转化中相互联系。为此，萨帕塔人发明了称为 compa 的革命性主体。萨帕塔主义有一种奇怪的双重存在。要实现萨帕塔斯莫事件，必须有 compas 这样做，但要有萨帕蒂斯塔 compas，萨帕塔斯莫必须已经存在。每一个的出现都以另一个为前提；因此，两者同时出现：1994 年 1 月 1 日。³²

作为萨帕塔主义的革命对象，compas 的目的是阐明和确定萨帕塔主义的各种过程：它的危险在哪里，它的机会在哪里，它的对立和冲突点在哪里，等等。例如，作为将事件条件“Zapatismo”与其具体后果联系起来的受试者，compas 必须决定可以从丛林中取走多少棵树以避免森林砍伐，取走太多树的惩罚是什么（多种两棵并照顾它们），或者萨帕塔干涉的结果是四十名州警逮捕了一些环保人士，这些环保人士抗议为了在莫雷洛斯建一个购物中心而破坏了一片有 200 年历史的森林。一些是口号，一些是示威，而不是其他。但是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服从并领导的过程，反过来又改变了萨帕塔。它在其作用之外不存在。这种“zapatismo”条件的转变然后转变了 compas，compas 必须根据这种改变重新部署新的具体的效果。因此，Zapatismo 通过在一种没有先头部队掌舵的情况下服从自己来领导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参与的过程，事件、结果和主体相互转化。

萨帕塔也打破了以个人主义和自律为基础的革命主体性传统。相反，compa 以第三人称出现，创造了一种新的规则：事件的集群规则。当然，这并不是说罗盘从来不说“我”或“你”；这只是意味着，这些特征是衍生的，或次要于更主要的第三人，即充当事件及其结果之间联系的代理人。冲突和协议仍然发生在特定的“我”和“你”之间，但只是作为他们参与的事件的冲突和协议：不是在它之外，也不是在它之上，而是在它内部和通过它。

就像使用零代表来取代代表和排斥的政治条件，或者使用自治市来取代私有和公有财产的具体实践一样，萨帕塔主义者创建了 COMPA 来取代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代表主体。compas 通过使用黑色滑雪面罩来实现这一点。

compas 使用黑色面具和大手帕来创造一个集群和“不确定的”集群主体。“为了让他们看到我们，我们把脸蒙起来；为了叫我们的名字，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名字；我们用现在来换取未来；为了生活……我们死了” (Marcos 2004b: 115)。虽然马科斯对多年来使用这些口罩给出了几个不同的理由，从确保没有人试图成为领导者，到描绘墨西哥掩盖其真正的墨西哥，这种集群的掩蔽行为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革命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并不存在于代表自我的意识中，而是存在于事件中：存在于萨帕塔本身中。Zapatismo 的集群戴面具的做法是对先锋队主义的敌意，因为它在没有领导者的情况下创造了主体之间的视觉平等。它使第一人称主体去个体化，而有利于第三人称集群主体的事件。我们可以想象，当每个人都戴着同样的黑色滑雪面具时，试图跟随一个人是多么令人困惑。“是你在带领我们吗？”不，我以为是你在引导我们。每个人通过服从来轮流领导 (马科斯，2006 年)。关键是创造萨帕塔的局部通用主体性，并集群地表达它，也就是说，领导，但领导是通过服从你领导的人。“因为”，正如副指挥官马科斯所说，“在 EZLN 中，错误用第一人称单数表示，而成就用第三人称复数表示” (Ramírez 2008: 307)。与其肯定“你” (Buber 1958) 的“脸” (Levinas 1979) 中发现的纯粹的他性或“这样的转变”的潜力，对抗表征的“我/你”的对立，萨帕塔斯派提出了一个不确定但确定的事件第三人称。萨帕塔主义者将遮住自己的脸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他们能够创造一种独特的政治匿名 (对任何人开放，但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拒绝自由主义和批判性的主体性模式，而支持事件本身的主体。这种做法已被世界各地的其他人采用，以实现类似的集群代理形式 (见汤普森 2010)。

在这一节中，我认为萨帕塔主义者创造了一个以服从并领导为基础的革命和参与性政治体。特别是，他们创造了一个具有适当名称和日期“Zapatismo, 1994”的单一普遍事件的条件，在自治市维持并实现了其具体后果，并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革命主体性，这种革命主体性在第三人身上起作用：蒙面公司。他们的革命政体的这三个方面不仅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融贯性政治哲学平行，而且也表达了我在本章中制定的更大的参与战略。

结论

在前一章中，我们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创建一个替代政体来维持革命性的干预，而不成为具有代表性或仅仅是反代表性的政体。本章论证了理解当今政体概念的第三种方式：作为参与最大程度的相互和直接转变的条件、要素和机构的集合。这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和萨帕塔斯派的实践中都可以看到。

针对由一套预先给定的政治参与规范性标准所界定的政治代表的排他条件，或由一般变革能力所界定的潜在的矛盾条件，我曾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抽象机器，论证过政治条件的概念。由于抽象机器是事件（而不是事物）的单一标记，它既能创造条件，又能被它所创造的政治元素所转化，因此它没有预先设定的排他标准，只有基于什么或谁直接参与的参与性标准。由于这个抽象的机器标志着一场针对特定权力形式的地方性斗争，它也是一个明确的承诺，不仅仅是改变本身：它是特定的新元素和机构的创造。

层次排序的元素中发现的政治代表，由他们的距离，或繁殖，行驶规范或身份，以及元素的层次顺序的政治潜力，由他们的距离定义纯粹的过程生成或自身差异（difference-in-itself），我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具体机械组合概念的基础上论证了政治要素的概念。

由于实在性机械以相互转换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复制预先给定的标准）实现其条件，因此，就每个元素都可以改变整体条件而言，实在性机械具有参与性和非层次性。此外，由于它们表示“融贯性程度”（在纯差异和纯身份之间），它们也可以有意义地按照抽象机器的顺序排列，而不是肯定“生成他人的能力”的一般程度。

同样地，反对主体的瘫痪，这种瘫痪是通过将主体的转化限制在它可能理性地希望从身份政治中解脱出来或自由出来而造成的，也反对通过将主体性分散到一种纯粹的生成或转化形式而造成的瘫痪，我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人格”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主体性的概念。由于政治人物是由其内在干预的同时性以及抽象和具体机器之间的联系来定义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在给定事件的政治领域内改变自己的愿望，但它们的本质也在于它们的行为改变了它们存在的初始条件。除了局部干预之外，人物角色还有一些特殊的特征，使其区别于纯粹分散的转型形式：它们在法律、生存、关系等方面相互结合和冲突。因此，抽象机器、具体集合和政治人物角色这三个概念为代表性和反代表性政治机构提供了真正的概念选择，正如萨帕塔在服从并领导的实践中为它们提供了实际的选择。

但是，尽管这一章能够展示在一个参与性政治主体中，革命性的干预是如何维持的结构和功能，但它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姿态，即这些政治主体如何与其他政治主体联系起来。是一回事，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创建一个内部一致性之间的抽象的条件，具体的后果和主体，甚至连接其后果之外的几个地方斗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Zapatismo，但完全异构革命政治机构如何连接到另一个，如果他们能做到呢？什么新情况？我们如何调和它们可能相互排斥的具体承诺？这是一个政治亲和力和普遍团结的问题，将在本书的下一章，也是最后一章讨论。

4 政治亲和力 (Affinity) 与奇点-普遍联合

显然，一个革命性的机器不能满足于局部和偶尔的斗争：它必须同时是超级集权和超级欲望。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统一的本质，它必须通过多样性以横向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垂直的方式，因此容易粉碎符合欲望的多样性。(Deleuze 2004: 278/199)

导论

参与式政治体的理论发展在第三章可能已经能够占三分之一的实践和理论现实类型的政治机构，它未能理解依据这种革命性的身体能够连接到另一个和组装一个更大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品。如果革命政治团体的条件是奇点的和不具代表性的，那么这些异质的政治条件在什么基础上具有共同的亲和力或归属感呢？这种在第三章中提出的政治参与的包容性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际地扩展为一场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在越来越大的参与范围内，一个条件或政体是简单地吞噬另一个条件或政体，还是它们并行存在？

被定义为两种或两种以上异质政治条件之间的联系，我所谓的革命性政治亲和力面临着两种危险。一方面，它的风险被合成为一个全球条件异构条件可以沟通，但只有当特定的元素在一个更大的表征条件下（在民族国家公民的亲和力，组成同盟国和轴心国国家之间不平等/垂直亲和力等等）。另一方面，革命政治团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有可能分散为多个互不关联的奇点，这些奇点唯一的归属是它们的根本差异的普遍非归属。在这一章，我认为，在我所说的当代回归革命中发现的政治团结，不仅仅是通过简单地调整公民身份的标准，将那些目前被排除在外的人纳入其中，将边缘化的需求重新纳入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机器。这也不是承认所有存在的普遍奇点的问题，而成为他们本来之外的其他东西。相反，这种革命的团结发生在参与性政治团体（见第三章）将彼此的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时。这种团结不是一种认可、施舍，甚至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差异，而是多个奇点、普遍的政治机构之间的联邦和横向联系。

因此，本章对在多个非代表性政治机构之间建立团结的问题提出了三种回答。首先，我反对将公民身份和差异的概念作为理想的政治归属模式，因为前者在结构上具有排他性，而后者无法从理论上说明多重共存条件之间的任何具体关系。其次，我认为，为了反对这两种公民身份和差异的危险，定义当代回归革命的团结，是由多重奇点普遍性条件之间的联邦联系所定义的，而不是整体。为了发展政治团结的第三个概念，我借鉴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主义概念，并将其含义扩展到革命问题上。第三，我认为这种对团结的战略利用也表现在萨帕塔斯派的全球

网络政治实践和洲际聚会 (Encuentros Intercontinentales)。萨帕塔游牧主义理论和全球共同团结的实践共同定义了我称之为“奇点-普遍团结”的战略。

一、普遍性政治亲和力

公民身份与结域民族国家

在二十世纪，政治亲和力的概念主要由公民这一人物所主导。尽管公民身份的概念远没有表达出一种同质的政治亲和力，但它已经成为一个丰富而关键的场所，在政治代理、包容和排斥方面的争论日益分歧。然而，今天，一个世纪的争论已经升级为完全不稳定，因为公民身份受到三种越来越不可调和的现象的围攻：

1. 跨国家和非国家组织通过提供通常由国家公民提供的许多亲和、保护、服务和商品，对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干预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些组织包括像欧盟或南美玻利瓦尔联盟这样的跨国实体；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实体；像非政府组织这样的全球性实体，以及由医生、教师、记者、农民、律师和“无国界”组织组成的不断增长的网路；私营企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实体；以及像改变全球化运动和世界（和区域）社会论坛这样的积极实体。

2. 在经济、政治和环境方面被迫移徙者（主要来自全球南部）的全球流动日益增多，他们在其新国家往往被剥夺完全政治地位（公民身份）和获得服务的机会。仅过去十年就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有记录以来最多的移民数量。但是，这一现象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移民正变得不正常或无身份。如果公民身份和法律地位是民族国家理解一个民族的政治机构和权利的条件，那么世界上超过 5000 万人生活在没有身份的环境中意味着什么？（联合国 2008；国际移民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8.)¹ 越来越多的不稳定、被定罪和被剥削的人对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亲和力的愿望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为非社会地位人士的人口不断增加，造成了一个许多人无法投票、他们的劳动受到剥削、尽管如此，这些都是经济和国家运转所必需的。公民身份的许多好处（平等获得代表权和经济商品/财产）是基于对非公民的剥削和去政治化（见尼尔斯和瑞吉尔 2011 年）。

3. 民族国家自身带来的大规模的公民内部不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去国有化；整个 20 世纪，埋葬营、工作营、难民营和集中营的建立；阿布格莱布监狱对囚犯的酷刑和虐待；关塔那摩湾拘留营的人身保护令的暂停以及爱国者法案，等等。这些都表明，公民权已落入日益永久的司法政治例外和行政控制状态。如果不能相信国家能够保证只有它们自己才有权保护的唯一政治亲和力概念，那么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将永远受到质疑。

公民身份，作为一种政治亲和力或归属感的形式，旨在解决多种政治条件（领土、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在奇点条件下捕获它们，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国家人民领土的老三位一体”，这构成了欧洲文明的基础（阿伦特 1979:282）。只要多重政治条件及其代理人接受特定的归属标准（出生、权利等）的执行，国家就可以调解和确定合法的政治代理形式（投票、财产、

家庭等) 和非法的政治代理形式 (革命、盗窃、歪曲等)。但只有在多种政治条件被牺牲而成为奇点国家条件的组成部分时, 它才会这样做: 公民身份。

然而, 领土民族国家矩阵的理论堡垒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尚未在它们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而在于这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术语本身从根本上都是排他的政治概念。事实上, 试图在这样一个矩阵中建立一个激进的包容性政治理论的哲学工作, 应该被正确地认为是一种“矛盾修辞法”(Levinson 和 Tamir, 1995)。政治理论由领土空间分隔开的亲和力一定不包括这些境外和限制人民的自由流动的逻辑政治包含和排除任意地缘政治路线 (见 Balibar 2002: 2)。香港是先天条件迁移及其控制。因此, 以国家认同的特殊性为基础的政治亲和理论, 无论它有多么“分化”, 同样会边缘化域外的、国家外的亲和和团结, 而这些不能局限于国家。

一个被主权国家合法化的政治亲缘关系也排除了它自己的合法权力从它的司法立法。从逻辑上讲, 也就是说, 国家不能把自己的条件 (其基础的例外和执行暴力) 包括在自己的法律之内。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现代国家宪法 (民主、社会主义或极权) 都有自相矛盾的法律, 允许在紧急状态或国家安全时期暂停宪法本身 (见 Agamben 2005: 11-19)。

最后, 将政治分析限制在领土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隐藏了自由多元文化主义无可置疑的前提: 它与多国资本主义共谋 (见 Žižek 1997)。现代民族国家应该是多文化代表性的中立场所或“空洞的普遍性”的论点通常仅仅意味着, 在国家保护的资本主义经济中, 少数群体被容忍为消费市场或同等剥削的工资劳动 (作为经济排斥) 来源 (Žižek 1997:44)。尽管领土民族国家自称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 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它本质上都是排斥性的。

生物政治和普遍奇点

然而, 支撑基于公民的政治亲和概念的地域民族国家的内在排他困境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揭示它的悖论或困境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此外, 当代的民族外亲缘现象、移徙和政治紧急状态加剧了这种情况。例外论的逻辑结构并没有削弱排他性的权力模式, 而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下, 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多元化、去中心化和永久性的形式——由于其灵活性和“矛盾性”而变得更加强大。今天, 政治排斥的力量“不仅发生在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上”, 而且已经扩散到更加灵活的边界结构中, 使生活本身 (不仅仅是公民) 成为多种权力形式交叉的场所 (见 Balibar 2002: 75-86)。今天, 为了加强对不明敌人 (恐怖主义) 的安全, 呼吁司法-政治暂停法律和权利, 允许跨国公司自由穿越国家领土边界, 而穷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则被“拒绝”, 各州和企业已经动员了一种先进的结构隐形。2

因此, 边界是这种被动员的例外的现代政治表达。边境不像屏障或墙, 更像一条通道或筛子, 让资本通过一个非常特殊的边界分布 (为了利润、控制、安全等), 同时加强其他边界以抵御移民或恐怖分子。在目前恐怖主义和证券化的政治气候下, 越来越明显的是, 边界不再仅仅存在于两个主权领土之间的地理空间; 随着当地警察执法部门、消防员、医院、学校、私人公司、机场、银行和个人开始独立监控和战略性报告非身份和“可疑”人员, 今天的“边界”正

在变得更加“自我调节”和“自我转化”[调节, 普遍共同体]: 德勒兹称之为“控制社会”(德勒兹 1995:243/179)。边界已经成为多重调节约束, 不仅是为了阻止外部的移动, 而且是为了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不可预测的环境或环境中, 在一定程度或概率上调节和稳定内部人口(见 Balibar 2002: 5)。

但是, 如果领土民族国家的排他性自由主义日益转变为生物政治和控制的更为多元和异质的例外主义, 那么这会为新的包容性政治亲和力和战略带来什么(如果有的话)机会呢? 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 以国家为基础的公民身份的下降揭示了难民的形象是一种新的政治亲和力理论的起点。值得在这里详细引用他的话: 鉴于民族国家目前无法阻挡的衰落和传统政治司法类别的普遍腐蚀, 难民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唯一可以思考的人物, 也是我们今天可能看到的唯一一类人——至少在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解体进程完全完成之前——即将到来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和限度。甚至有可能, 如果我们想胜任今后的全新任务, 就必须毫无保留地果断放弃, 到目前为止, 我们通过这些基本概念代表了政治主体(人、公民及其权利, 但也包括主权人民、工人等), 并从难民的唯一形象开始重新构建我们的政治哲学。(1996: 158-9)

虽然“民族国家势不可挡的衰落”在这一点上还远未确定, 但阿甘本在这里的洞察力是要强调这样一个潜在的分离地点: 难民。由于难民的形象“脱离了国家-民族-领土(State-nation-territory)的旧三位一体”, 表达了人与公民、出生与国家之间的分离, 阿甘本认为, “它将主权的原始幻想带入危机”, 并允许“公民能够认识到他或她是难民”(阿甘本 1996:164)。

如果生物政治真的创造了一个永久的例外和调节控制的状态, 那么每个人都至少可能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所有特殊性的裸体生活。公民不再是政治管理的中心主体。如今, 环境和人口正日益成为政府理性调控和灵活控制的焦点。这种生活或奇点的形式, 在难民或无身份移民的形象中可见, 实际上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在内部被排除在公民身份和民族国家的主导政治之外。因此, 阿甘本认为, 这种奇点化为一种全新的、完全包容的政治亲和形式打开了机会, 这种形式的基础是“互惠治外法权(或者更好的是治外法权)的矛盾条件”。可以概括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模式’(1996:164)。尤金·霍兰德(Eugene Holland)也对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哲学(2006:203)中的游牧者(nomad)概念(“解辖域化的卓越”)表达了类似的希望。

虽然将政治亲和建立在互惠领土或解辖域化的普遍奇点上, 可以避免民族国家普遍和特殊关系中固有的代表性和排他性问题, 但它仍然是, 不足以理解这些奇点是如何组织和相互联系的, 或者它们自身是如何变得具体普遍的。在这个理论中, 奇点似乎仍然是完全有限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不确定的。虽然我们可能认为普遍奇点或绝对结域化条件’那些没有“资格”形成新的非总体性(non-totalising)关系网络, 这样, 尽管如此, 失败这样奇点理论形成的内在关系或多或少的一致性(Ranciere 2004: 305)。例如, 如果我们同意阿甘本的观点, 即公民身份在本质上是排他性的, 我们都是相互的领土难民,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亲和的新做法将有助于这些奇点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呢? 奇点之间有什么不同类型的关系, 它们的危险是什么? 这样一

种新的国际关系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普遍-奇点或解辖域化的理论未能提供政治关系的理论, 因此理解政治亲和不仅仅是有限的和矛盾的开放, “新的可能性的视野以前没有梦想的国际国法” (德里达 2001:7)。

二、团结与奇点-普遍

在这些问题之后, 我在本节中指出, 当代革命的回归 (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者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由奇点的普遍团结来定义的。我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异质政治团体通过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实践而团结在一起的程度。然而, 这种团结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团结; 它只是基于特定数量的相互共享的实践的某种程度的身份。团结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制定德勒兹表示: “一个人怎么能维护权利的显微分析 (扩散、异质性、碎片) 和仍然允许某种统一的原则, 不会变成像国家或政党, 整体化或代表?” (2006:120 - 1/132 - 3)。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本书前面的所有章节来解答。在第一章中, 我定义和区分了面对这种统一性的代表的不同危险; 在第二章中, 我定义了四种类型或程度的变化, 它们逃脱了这些表征的一致性; 在第三章中, 我认为这些变化的程度可以在一个由其独特的普遍条件、具体的效果和内在的主体性或人格所定义的参与性政治体中联系在一起。但是, 我们还没有看到, 奇点-普遍条件本身是如何连接在一起, 形成更大的、全球性的革命性网络的。我们还没有理解团结的战略: 正如马科斯所说, 创造一个“许多世界都适合的世界”。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区分了两种普遍性: 代表性的普遍性 (发现于有领土的民族国家) 和奇点的普遍性 (发现于无领土的难民或游牧民的潜力)。但我在本章中提出的归属感或团结的概念也应该与四种常见的团结理论有所区别:

1. 团结不是施舍的问题。慈善假定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因此, 拥有这些权利和财富的人可能会暂时减轻那些没有权利和财富的人的痛苦, 而无需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存在的条件。

2. 团结不是利他主义。利他主义是基于对特定群体或个人的需要、兴趣和性格的认同。因此, 利他主义也不能理解或改变一个特定群体或个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

3. 团结也不是一项普遍的责任原则。这一原则将破坏多个条件的奇点性和偶然性, 并将其置于奇点抽象条件 (职责) 之下, 而不可能参与该条件的转换 (如第 3 章所述)。

4. 最后, 团结不是同盟者为了相同的目标 (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等) 而斗争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代革命条件在进行过程中经历了其目标的参与性转变。此外, 每个奇点的普遍条件都有其自身的目标, 而服从奇点的目标则会削弱这些目标。

不考虑负面的定义, 本章的其余部分提供了两个阶段的团结的正面叙述。第一部分通过借鉴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提出的游牧主义概念, 在不假设第一章中讨论的代表性统一性的前提下, 发展了一个理论, 阐述了多重独特普遍条件如何能够联系在一起。第二部分认为,

萨帕塔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洲际经济共同体”(Encuentros Intercontinentales), 在多个独特的普遍政治条件之间调动全球联系, 从而表达了这种新型的政治团结。

奇点、通用、包容

在讨论多个奇点-普遍条件如何相互联系的问题之前, 我想提醒读者什么是奇点-普遍的革命政治条件, 正如在第三章中定义的那样。我认为, 当代革命的政治团体, 能够将各种各样的反抗行为统一起来, 而不让它们服从于一种政治代表形式(国家, 政党或先锋派), 因为它利用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参与式政治理论, 作为一个抽象机器、一个具体的集合和机器角色的相互决定(融贯性)。特别是, 抽象机器作为一个可变的革命政治条件, 并例证了革命政体的局部但绝对的维度。

革命条件, 或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抽象机器, 在政治代表性的主导矩阵(领土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预先假定的身份、因果关系或位置的情况下, 是奇点的, 但它是绝对的,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从本质上被排除在其无限后果的参与之外: 它是最大程度的包容和最小程度的认同。它是地方性的, 因为它有一个特定的名称, 地点或日期(Zapatista 1994, 巴黎公社, 1968年5月等), 但它是绝对的, 因为这个合适的名称是开放的, 可以普遍参与和重新解释。因此, 抽象机器的绝对不应与身份的绝对或普遍性相混淆, 它们保持不变(并预先给定), 同时增加越来越多的公理或表征元素(如代表性民主、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更确切地说, 当德勒兹和瓜塔里谈到革命的“生成-每个人/每件事”(1987:588/470)时, 这意味着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以参与到响应事件的实施和转变中。总之, 一个奇点-普遍事件完成了三个基本操作:(1) 它澄清了在政治表征的主导矩阵中奇点的距离或不可调和性;(2) 它要求对特定的“不可决定的”和无代表的奇点做出革命性的决定(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590-1/473);(3) 然后, 它通过构建新的实在性(concrete)组合和机器角色来实现这个事件的“不可数的无限”结果(1987:588/470)。

但是, 在什么意义上, 这样的条件是必然包含的呢? 在《什么是哲学?》德勒兹和瓜塔里将这种内在条件描述为一个平面, 其唯一的区域是通过局部操作、逐点操作、在彼此成为的一般关系中发展它的要素。内在的平面, 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 因此有一个“无穷的(infinite)”或“绝对”运动, 或萨那 nonlimited 位置”(1987:474/382)”定义的来来去去, 因为它没有提前向目的地本身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针也极”(1994:40/38)像“vortex”(1987:635/509)。因此, 如果一个革命性的条件只由那些通过参与而构建它的人来定义, 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本质上排他的(它没有参与的基本标准, 只有可变的标准)这是与公民权相反的, 公民权不是由一个人对某一事件或地点的参与来定义的, 而是由一个人在一个与国家主权相联系的权利法律体系中的代表来定义的。因此, 当代回归革命所体现的革命政治主体的类型具有独特性、普遍性和包容性。

德勒兹，瓜塔里和游牧团结

在前几章中，我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进行了三篇论述：(1) 我们应该将他们的历史拓扑概念作为一种革命政治诊断理论；(2) 我们应该利用他们的解辖域化概念作为一种理论来带来先兆性的政治变革；(3) 我们应该扩展他们的融贯性概念，将其用作政治参与理论。在这一章中，我提出了我最后的解释论点，即，他们的游牧主义概念应该被用作政治团结的理论。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游牧主义用最基本的术语来定义，是一种“没有分割的无限分配模式”。游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理论。它描述了奇点的普遍事件，如革命的政治主体，如何相互联系，并可以以一种相互包容的方式分配，而不需要总体化或代表性。

但为什么德勒兹和瓜塔里称其为游牧民族呢？游牧主义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将异质政治条件之间的包容性和流动性联系理论化？德勒兹和瓜塔里根据法国历史学家拉罗彻（Emmanuel Laroche）在《Histoire de la racine nom- en grec ancien》（1949）中所作的工作，定义了“游牧民”一词的起源。在这里，拉罗彻认为，希腊语词根 $\nu\epsilon\mu$ 意味着一种“分配模式”，而不是对已分配或划定的土地的分配。“nomos 的意思是法律，这是五、六世纪希腊思想的产物”，打破了原来的荷马词根 $\nu\epsilon\mu\omega$ ，意思是“我分配”或“我安排”（1949:255[我的翻译]）。即使是“[追溯] 提出的翻译”“刹碎的土地，土地的地块，块”在所有情况下都不适合荷马诗歌，并假定一个古老的 $\nu\epsilon\mu\omega$ “我划分”，我们应该拒绝。古代的牧场通常是一个无限的空间 [espace illimité]；这可以是森林、草地、河流、山坡。”

德勒兹说，“nomos”因此“首先指定了一个被占用的空间，但没有精确的限制（例如，城镇周围的面积）”（1994:54/309 n6）。根据拉罗什、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游牧的原意与此相反，而不是将一块由道路、边界和墙壁分隔的封闭空间分割开来，分配给每个人一份财产 [部分]，并通过一个司法机构调节股份之间的联系。游牧主义“将人们分散在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空间 [indéfini] 和无沟通”，没有划分、边界或城邦（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472/380）。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轨迹中被抹去和移动的“特征”：接力点、水、食物、住所等等。但仅仅因为游牧分布没有划分或边界，并不意味着游牧空间是不分布或不一致的。确切地说，正是因为 nomos 定义了一个具体的被占领但不受限制、不确定的空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将异质政治条件视为相互的、可连接的、没有对立的。如果没有明显的划分或分隔的“块” (des morceaux)，那么就不可能有互斥。

如果每个群体团结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无穷”或无限制的分配 [distribution illimité]（Deleuze 和 Guattari 1994: 26/21），并且有无限个这样的无限分布，那么必然在这些“不可数的无限集”之间没有演绎的连续体。因此，无限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决定的：革命决策的根源和地点”，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1987:590-1/473）。正是无限事件之间的这种不可决定性使团结成为可能。如果在所有事件之间存在一个可演绎的连续体，那么我们会简单地复制表征性（和排他性）普遍性的第一个形象——使得团结既不必要又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

任何形式的统一连续体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团结就只会是矛盾和无效的。团结必须介于这两种立场之间。

但是，在共存的和无限的分配之间，团结实际上是如何构建的呢？虽然必须承认德勒兹和Guattari很少提到“团结”这个词，但我想强调一段特别有启发性的段落和《千高原》中“游牧论”一章中的一个脚注(1987:453-4/366)。在这里，他们直接将团结的概念与它的游牧起源以及它在创建“集体机构”(反对国家、家庭或政党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联系起来。

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团结概念的游牧起源可以在伊本·哈尔顿(Ibn Khaldun)的可达性(asabiyah) 5 概念中找到。在《Muqaddimah: 历史导论》([1377]1958)一书中，哈尔顿对贝都因(Bedouin)游牧民的定义主要不是根据他们的种族、地理、国家或家族谱系，而是根据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将各种异质的人和家庭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团结。有趣的是，对于哈尔顿来说，团结并不是由任何预先给定的、族谱上的或甚至是静态的包容/排斥标准来定义的，而是由这些人之间的偶然关系来定义的。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分享一种团结的感觉”(1958: 第8节)。“通过在群体[团结]中占据他们的特殊位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那个特定群体[团结]所属的共同血统”(1958: 第13节)。根据哈尔顿的说法，群体团结的唯一条件，不仅是对特定群体团结的“承诺”，而且这种相互团结创造了新的共同血统(同样对其他群体的团结开放)。因此哈尔顿可以宣称：“家谱是一种知道是没有用的东西，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坏处……”【因为】当共同血统不再清晰，成为科学知识的问题时，它就不能再推动想象，也不能再拒绝【团结】所引起的情感。它已经变得无用了”(1958: 第8节)。即使是国家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团结在它背后，它也是无用的(1958: 第12节)。因此，根据哈尔顿的观点，社会归属最基本的形式既不是定居(国家)，也不是宗谱(家庭)，而是偶然的和流动的(游牧)。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哈尔顿关于团结的游牧起源的理论中发现，每个游牧的贝都因家庭的行为不是一个等级的或单向的族谱的条件，不是家族之间的婚姻联盟，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官僚的血统，而是作为一种“频带矢量或中继器，表达团结的力量”，将他们团结在一起(Deleuze和Guattari 1987: 453/366)。因此，家庭主要是通过相互的、水平的团结关系聚集起来的，与“有机权力的垄断[pouvoir]或地方代表无关，而是与游牧空间中漩涡体的潜在[权力]无关”(1987:454/366)。

因此，将游牧民族团结仅仅理解为纯粹的解域化或无限空间的问题是错误的：国家权力的逃离线或内部转换。更确切地说，我是在说，继哈尔敦之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主义概念是一个在不同种族之间归属和统一的问题。“革命运动”，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是“流动的联系，不可数的聚合的组成，每个人/每件事的少数派”。这不是分散或分裂”(1987:590-1/473)。因此，哈尔顿根据两个归属感轴定义了游牧团结(badiya asabiyah): 群体/家庭(共同血统的条件)和团结关系(群体之间相互支持和接力的具体实践)。

因此，正如革命条件内在地将各种有条件的具体因素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一样，它与其他条件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比如贝都因人的团结: 没有领土、家庭或国家的外部刺激。由于这个事件

条件总是一个单普遍或局部绝对的，只能通过局部操作来实现，所以不可能存在所有事件中的事件。如第二章所述，这样的事件是超越的，是在事件本身之外或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如果有无限的无限事件⁶，它们的关系是不可决定的，但它们的条件是可决定的普遍开放和平等的，那么至少有可能，即使这些事件是不可数的和异质的 (*illimité*，对拉罗彻来说)，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更大或更小的 (无限) 是根据……它们连接的组件、阈值和桥 (1994:26/21)。如果每个事件都对普遍参与和转换开放，那么事件，根据定义，就不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添加、结合或相互加强，而不会完全相同。也就是说，由于政治条件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可决定的”关系，实际的劳动是要遵循团结关系的局部后果，而不仅仅需要一个革命的“决定”，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革命政治团体是“团结一致的”。

横向性中继器 (Transversal Relays)

因此，如果团结是可能的，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所说的“团结”是指至少两个异质事件序列之间的内在的、逐点的联系 (一个内在条件，它的具体元素和它的中介形式)。我所说的联系，是指一个具体的环节或个体性被确认为两个事件条件的结果或个体性的程度。正如我在第3章中指出的那样，仅仅“决定不可决定”不足以维持这种决定的参与性后果和代理人，因此仅仅“决定两种不同政治条件之间的不可决定”关系也是如此。因此，为了事件的团结，必须将一个事件的至少一个结果或因素与另一个事件的至少一个结果或因素联系起来。一个事件的元素与另一个事件的元素联系得越具体，每个事件的无限大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团结程度就越大。在什么是哲学？德勒兹和瓜塔里称之为事件的“外部邻居或外部融贯性”。它的横向或“横向”关系是“由从一台 [机器] 跳到另一台的桥梁所保证的” (Deleuze 和 Guattari 1994: 87/90)。这是一项无足轻重的团结劳动。

但由于每一种革命条件都是奇点的，连接之间的“联系”或“横向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认同。相反，这种革命是“一块一块地构建起来的，地点、条件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7: 190/157)。因此，通过无限系列的具体政治实践，两种不同的情况或多或少地相互联系/识别，这些实践作为非通信的中继。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这是因为“对于游牧民”，地方是没有界限的；因此，绝对并不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成为一个非限制的局域。地方与绝对的耦合不是在一个集中的、面向的全球化或普遍化中实现的，而是在一个无限连续的局部操作中实现的。(1987: 475/383)

但这种无限的继承并不是对团结的无限期拖延；它是越来越大程度的积极的具体的联系，而不是绝对的统一。正如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所言，“每个人都成为少数派主义者”可以被建构……通过一个普遍的过程，不涉及“生命”或“历史”的自发涌动……但是通过不对称的生成-块茎，在那里一个项可能变成-其他感谢另一个项的生成-他者本身连接到一个开放序列的 *nth*…不再是一种广泛的、可量化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密集的、不可量化的普遍性，即主体

在其同一固定点消失的过程中变得共同，利用这一概念和新的少数民族国际主义所要求的激进的建构主义自治实践。(Sibertin Blanc 2009:134-5)

正如两个不同的贝都因游牧家庭在某些特定的习俗上或多或少地分享着团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彼此家庭的共同血统”(斜体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异质政治条件，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彼此的条件中，因为它们共享一些相同的具体结果或传递。有了这个定义，我们更接近于单词 *nomos* 作为一种非有限分配模式的早期政治意义，而不是五、六世纪希腊对 *nomos* 的派生定义，即法律 (*loi*)、判断 (*juger*) 或治理 (*gouverner*) (拉罗彻 1949:256)。有了这个定义，一个人也有可能同时占据多个异质条件，以达到共享承诺桥梁的给定分布跨越横向多个政治条件的程度。这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称的建构主义，或“图解主义”，通过确定问题的条件和问题之间的横向联系来运作：它既反对资本主义公理的自动化，也反对官僚程序。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谈论“不可决定的命题”时，我们并不是指结果的不确定性，而结果必然是每个系统的一部分。相反，我们指的是系统所共轭的东西的共存性和不可分性，以及那些随着它们本身是可连接的直线不断逃离系统的东西。(1987: 590 - 1/473)

我们现在终于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一个人如何能够维护微观分析的权利（扩散、异质性、碎片化），并且仍然允许某种统一原则，这种原则不会像国家或党，总体还是代表？’（德勒兹 2006: 120-1/132-3）。答案要求一个革命性的政治团体至少具有四个具体特征：奇点性、普遍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结构（在第 3 章中定义并在上文重新表述）。它必须是与境性的和确定的，具有适当的名称，其后果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并且可以被任何人在没有预先定义的标准的情况下进行修改。鉴于这四个特征，我已经展示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如何通过拉罗什和哈尔敦之后的游牧团结来定义“集体政治体”。拉罗什通过其早期荷马式根源将 *nomos* 定义为一个集体在无限和包容的空间中的开放分布或安排。森林、牧场、山地草原及其居民都表达了这种不可分割但明显异质的分布统一。因此，Khalidun 不是通过家庭、国家或领土，而是通过两个不同的轴来定义异质贝都因家庭之间的联系：共同血统和中继群体团结关系。虽然共同血统的群体从未完全融合，但它们的融合程度或多或少取决于特定时期群体团结的具体关系。最后，我们得出了游牧民族团结的定义，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异质政治条件（从未合并，但在横向上变得或多或少相同）下，共同具体行动的一块一块无限连接（桥接）。

三、萨帕塔与 Los Encuentros Intercontinentales（洲际会议）

“一个适合许多世界的世界”

作为政治团结理论的游牧概念不仅仅适用于游牧民族的历史现象。作为一种“分销模式”，它可以用于其他地方和其他目的。因此，在下一节中，我认为萨帕塔主义者正是通过他们的全球相互团结实践来做到这一点的。这种团结是不可简化的，不仅对于公民身份和差异的实践，而且对于其他现有的政治团结模式也是如此。我首先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团结——国际主义、第

三世界团结、权利团结和物质团结——并解决了 Thomas Olesen (2005) 的论点，即它们都共享一种不平等团结的单向模型。然后我认为，萨帕塔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打破这些模式，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并提供所有这些类型的团结，但最终主要依赖于全球团结的实践，而不是由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不是由北方和南方，但通过奇点普遍之间的相互关系。除此之外，我认为他们创建 Encuentros Intercontinentales (洲际聚会) 和 Puentes de Solidaridad (团结之桥) 的做法不仅仅是定义全球团结的“相互”关系；它们定义了一种通过协调的具体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包容性团结的独特普遍做法。

既不是公民身份也不是差异

然而，萨帕塔人的奇点普遍的团结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现代公民身份和其他团结实践一起出现在现代主义普遍主义概念的发展中：全球意识、共享人性和将世界视为一个地方的愿望。不管现代民主国家在实现这种普遍性方面取得了多么成功，萨帕塔主义者在其理论和实践上都表现出新的发展。与本章前面批评的基于领土民族国家的现代公民理论不同，萨帕塔主义者没有政治包容/排斥的基本标准，例如出生在哪个领土，一个人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授予一个人权利等等。“尊严是没有国籍的国家，”他们说，“彩虹也是一座桥梁。”... 嘲弄边界、习俗和战争的反叛不敬” (Marcos 2004b: 642)。

此外，与 Simon Tormey (2006: 146) 提出的作为差异的政治亲和性理论相反，我认为萨帕塔主义者并不仅仅坚持普遍的奇点性或差异的政治团结，而是坚持一种有组织的全球团结在 Encuentros 的独特结构中发现，必须通过特定的混凝土桥梁网络来建造，以对抗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建立基于参与条件和具体行动的革命政治机构和桥梁的纪律，仅仅肯定全球自治和差异就毫无意义。“共享差异”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不落入再现陷阱的情况下组装奇点所需的组织类型。因此，正如萨帕塔主义者所说，“一个有许多世界适合的世界”不能仅仅通过确认“存在一个世界的多重性 (普遍奇点)，但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构建，即许多世界可以结合在一起 (通过具体的桥梁和相遇)，而不会像领土、民族、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那样创建具有代表性的等级制度。对于萨帕塔主义者来说，这种方式并不是普遍的差异。这种方式就是通过网络横向主义实现参与性民主和全球团结。

四种团结

萨帕塔人使用的奇点的普遍团结不同于其他四种团结：国际主义、第三世界团结、权利团结和物质团结。左翼国际主义，尤其是在 20 世纪初活跃的左翼国际主义，提出社会主义世界主义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它由两个特征定义：首先，它假定工业工作条件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因此具有高度的全球阶级意识，为革命做好了准备，这可以从“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口号中看出。其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国家政党和拥有社会主义政府的国家纵向构

建的。然而，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这种类型的国际团结实际上已经消失了（Waterman 1998: 236）。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团结源于 1960 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并且在支持 1970 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尤为重要。它也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关注贫富之间的经济和结构性不平等；第二，虽然它把世界分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或南北），但它仍然反映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全球意识。

权利团结主要关注国家或法外力量对人权的侵犯和其他形式的压制：权利团结工作通常旨在向侵犯人权者施加压力。这可以通过游说违法行为发生国的政府直接完成，但通常会通过其他政府或政府间组织施加压力，这些政府或政府间组织预计会对违法行为发生的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奥尔森 2005: 256）

权利团结基于普遍人权的强烈概念，但通常较少政治化，因为它侧重于对个人的侵犯，而不是更多的结构性原因。物质团结主要针对自然灾害（干旱、地震等）或人为灾难（战争、难民等）的受害者以及不同形式的欠发达。

物质团结反映了一种全球意识，因为它构建了一个世界，远方的人们的命运不再可以被忽视。与权利团结一样，物质团结通常由在特定冲突中采取中立立场的组织进行。（奥尔森 2005: 256）

根据奥列森的说法，这四种类型的团结都显示出不平等的因素。这些形式都以提供团结的人和从中受益的人之间的单向关系为基础。提供团结的人通常更富有，并且有更多资源来提供给没有团结的人。基于慈善和利他主义的团结可能会产生有益的后果，但只要它们的目的不是改变它们目前存在的结构条件，它们就有可能使允许它们存在的不平等永久化。虽然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国际团结可能会更加政治化，因为它们要求对当前的全球不平等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它们也依赖于冷战时期的一些二元历史观点，其中团结的提供者大多来自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确认提供者战略的条件下获得援助。

相比之下，全球团结的定义是活动家之间的高度互助，模糊了团结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区别，并更加强调非物质团结（灵感、教育、感情等）。据了解，所有团结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同一个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影响。因此，全球团结强调远离社会的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同时尊重地方差异。通过这种方式，全球团结旨在在奇点和普遍之间移动，而不是从属于另一个。这是萨帕塔主义者所实行的那种团结。

The Encuentros（邂逅）

然而，认为萨帕塔主义者总是以纯粹相互的方式给予或接受团结是不准确的。Zapatistas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物质援助，人权组织继续在恰帕斯州存在。虽然全球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确实对全球相互团结的目标构成了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团结不应成为革命运动的更大目标和实践。⁷ 萨帕塔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因此旨在创造第一个基于这种互助模式的全球团结网络。他们为此发明的网络被称为 Encuentro Intercontinental。

1996年7月27日，来自40多个国家的3000名活动家聚集在墨西哥恰帕斯的萨帕塔领土上，举行了第一次面向人类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洲际会议。第一次会议的目的是聚集“世界上的少数群体：土著、青年、妇女、同性恋、女同性恋、有色人种、移民、工人、农民等”（Marcos 2004b:642），并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分享他们的斗争，建立全球团结的桥梁。在这里，声援萨帕塔叛乱委员会（the Committees in Solidarity with the Zapatista Rebellion）成立，并负责在未来几年在五大洲（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进一步组织更多的Encuentros。第一个Encuentro（第二次现实宣言）的结束语定义了这个新网络的两个核心目标：首先，建立一个所有奇点斗争和抵抗的集体网络：这个跨洲的抵抗网络，承认差异和承认相似之处，将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抵抗力量一起寻找自己。这一洲际阻力网络将成为不同阻力相互支持的媒介。这种跨洲的抵抗网络不是一个组织结构。它没有中央主管或决策者；它没有中央命令或等级制度。我们是网络，我们所有人都在抵抗。（马科斯 2004b: 645）

第二个目标是在所有斗争和抵抗之间建立一个替代性交流的洲际网络，“将寻找编织渠道（tejer los canales），以便文字可以传播所有抵抗的道路（camine todos los caminos）。... [并且] 将成为不同阻力相互交流的媒介”（Marcos 2004b: 645）。

1997年，第二届Encuentro在西班牙南部举行，吸引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活动家。正是在这里，该计划起源于创建一个名为“人民全球行动”（PGA）的分支组织，以“超越辩论和交流，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行动运动”（de Marcellus 2001）。从1998年开始，PGA在各种全球精英峰会（G7、WTO等）上组织了一系列直接行动和干预，这些峰会现在被认为是另类全球化运动。多年来，关于全球抵抗的类似论坛——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至今）、区域社会论坛等——都在强调第一届Encuentro提出的核心建议：横向（非等级）组织和全球替代没有集中化的通信（参见Khasnabish 2008: 238）。

扎帕蒂斯莫深刻影响了过去15年来世界上最大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行动和集会，这一事实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并在几本关于改变全球化运动历史的重要书籍中进行了叙述（Notes

from Nowhere 2003; Khasnabish 2008; Curran 2006; Engler 2007），但正是因为其历史影响如此广为人知，其更大的战略决心仍然如此模糊。因此，除了对这段历史的经验描述之外，我提议分离和提炼萨帕塔实验中产生的两种实用策略，这两种策略使我们能够理解当前革命序列中更大的政治亲和性理论，并在其他地方发展和深化其实践。这两种做法是Encuentro（遭遇战）和Puente（桥牌）。

Encuentro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边缘化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现象或经验性聚集；这是一种异质的共同血统和横向性的政治战略。它与当时的其他国际会议不同，因为它平等地肯定了世界上所有异质的斗争（不仅是阶级斗争，或女权主义，或反种族主义等等），并将这些斗争普遍化为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新自由主义：Encuentros是第一次改变全球化的集会。它们的创建是为了替代基于国家和边界的错误普遍性的排他性公民身份，以及仅基于共享差异的对普遍单一性的纯粹肯定。Encuentro还发明了一种新的革命团结，这种团结在历

史上不同于其他基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革命团结。根据第二宣言，Encuentro 是一个非等级和非集中的空间，不同群体在没有领土、国家或经济归属的先验条件的情况下分享他们的冲突和协议。⁸ 这是一个多重奇点-普遍的空间条件（见第二节）作为自身权利和自主性的不可减少的斗争共存。因此，Encuentro 本身并不是一个决策机构；它不像第 3 章中讨论的革命团体政治（基于参与和轮换民主等）。根据第二个宣言，Encuentro 是一种媒介（el medio），其中不同的阻力位于某种不可分割的东西的中间，在一起。

但如果没有任何决策或纳入/排除标准，Encuntero 的含义是什么？他们在一起的中间是什么？根据第二份宣言，Encuntero 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媒介，但也不是一个新的政治条件，所有与会的政治条件现在都必须接受它。“欧洲议会”不是一个新的组织、乌托邦的理论化、世界革命的全球计划、计划或国际秩序的列举。正如萨帕塔主义者说所说，这确保了所有人都有一个职位、一项任务和一个头衔”（马可斯 2004b:645）。相反，Encuntero 是“为了人类和反对新自由主义”。

我们应该注意区分 Encuentro 的名称，作为将许多单一普遍的政治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横向操作，既与政治意识形态（代表性或纲领性内容），也与所有革命团体政治的新革命团体政治（由一个新的更大的条件、一组元素和机构）。相反，“为了人类，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口号是一个通用名称或可变指称，用于两个或多个异质政治条件共同的血统，例如贝都因家庭之间的特定群体团结。通过以尽可能最通用的方式制定人性和新自由主义，Encuentro 能够以最少的代表性和参考性实现最大的包容和相互支持。⁹

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在拉罗什（Laroche）之后争辩说，“游牧”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根“nem-”，最初暗示了一种在无限或不可分割的空间中的分配或代理方式，所以萨帕塔派有创造了 Encuentro 的实践，平等分配不同的政治事件（妇女、土著、教师、环保活动家、所有种族的人等），而不是按等级划分或基于国家、党或先锋队发明的排除标准。也许另一种描述山脉、位面或森林的无限游牧空间的另一种方式是“一个可以容纳许多世界的世界”：一个与其他地方一起变得无限的地方。同样，在哈尔顿的团结理论中，贝都因游牧民族“家庭”表达了一种共同的血统，不受家谱或国家的影响，并分布在一个共享的媒介（l' esprit de corps）中，其中几个异质群体共享一个“集体体”的群体团结（德勒兹和瓜塔里 1987: 453-4/366）。总之，Encuentro 是多个单一普遍的政治条件之间的通用横向关系的名称，没有划分、等级或决策能力。它是一个开放的、非分割的游牧空间，但却是一个明确而毫不含糊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为人类服务的空间。

然而，正如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如果没有“外部融贯性”（将不同抽象机器之间的具体机器连接起来）的概念，就不可能理解团结的概念一样，因此，如果不理解将不同政治事件的具体行动和后果联系起来的“桥梁”概念，就不可能理解萨帕塔主义的团结概念。

因此，第二次宣言提出了第二个层面的团结，以支持 Encuentro 的第一个非等级、非决策、集体空间：’ 编织通道 [或桥梁] 网络，以便言语 [和行动] 可以传播所有抵抗的道路’。首

先，第二个宣言中讨论的网络概念应在拓扑上区分为“全渠道网络”（每个人都可以与其他人以非线性系列水平连接：像根茎一样），而不是“链式网络”（自上而下的通信以分层方式进行调解：像一棵树）以及“星形或枢纽网络”（参与者与单个中央但非分层的参与者相关联，并且必须通过该节点才能与之通信其他：像块茎）（Ronfeldt et al. 1998: 7）。其次，虽然 Encuentro 提出了一个包容性的网络或“特定斗争和抵抗”（单一普遍条件）之间的相互相遇，但这并不能保证这种相遇会在它们之间产生任何具体的联系或协调的行动。因此，Zapatistas 提出的 Encuentro 的第二个维度是创建一个替代媒体网络，用于协调（编织）世界各地的具体言辞和行动。正如 Ronfeldt 等人。亮点：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与“知识”有关——关于谁知道（或可以不知道）什么、何时、何地以及为什么。冲突将较少围绕使用原始权力而围绕使用“软实力”，如通过“信息运营”和“感知管理”应用，即旨在吸引而不是胁迫并影响安全程度的媒体导向措施社会、军队或其他行动者对自己和对手的了解有感觉。心理社会破坏可能变得比身体破坏更重要。.. 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体现了 [这种] 解决社会冲突的新方法，我们称之为社会网络战。（1998: 7）因此，马科斯说，这一媒体网络“不是关于沟通，而是关于建设一些东西”（马科斯 2001a）。媒体不仅产生知识，而且产生改变现实的效果。因此，它可能是“通向他者的桥梁”（Zapatistas 1998:8），但在“延伸连接相同者的桥梁，[使之]不同”（Marcos 2004b:437）。

桥的概念，经常出现在萨帕塔的著作中，因此不是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统一体。它是两种常见事物之间的差异化因素，将它们分开并将它们以差异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帕塔主义者说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座桥梁，世界上的许多叛乱都可以在上面来回走动”（Marcos and the EZLN 2008）：一座连接和区分的桥梁其他人相互转化，公报接公报，直接行动又直接行动。跨越这座桥的世界叛乱的“来来去去”是萨帕塔团结的游牧、流动和互惠互利的特征。但在全球层面上，团结并不能作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普遍遭遇来实现。它必须采取具体协调的言语、口号和行动，即一座或多座将两个或多个单一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桥梁。通过这种替代媒体网络建立的具体桥梁或连接越多，网络就越强大和更大。因为网络只不过是实现它的连接或桥梁，所以没有党、国家或官僚机构在头；它是无头的。因此，它为全球联合决策过程奠定了最大可能的条件。

正如哈尔顿的贝都因游牧民族的不同血统通过具体的“接力点”或群体团结（没有家庭或国家的基本决定）被修改和或多或少地合并，所以萨帕塔人激发了全球团结的恩昆特罗斯人，他们改变和通过具体的媒体和行动网络（没有等级制度、集权、领土、国家或政党），或多或少地融合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异类斗争。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融贯性平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将其具体机器内部结合在一起，外融贯性将其与外部其他融贯性平面上的其他“游牧特征”或“中继点”连接起来，所以萨帕塔主义者通过其参与性的内部机构（JBGs）以及与其他地方的其他具体斗争的外部桥梁来定义他们的政治融贯性平面：Puentes de Solidaridad。因此，革命事件“仅由它们的相互团结来定义”，而不是独立于它（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60/45)。与基于国家和政党机构的静态和单向团结模式相反，萨帕塔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由游牧团结定义的相互集体：行走、相遇和桥接。10

总结

从全球集会到峰会抗议，Zapatismo 的多形精神在空气中弥漫。（马卡尼 2006：109）

在上一章的结尾，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参与性团体政治中已经确立的革命性变革如何能够与其他此类机构联系起来，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替代方案。如果不再有斗争的中心轴，而是各种具有自身条件、要素和机构的斗争，如何在不采用传统形式的国家、政党和代表制的情况下将它们统一或组织成一场全球斗争？本章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三方面的。

首先，我认为目前基于领土民族国家的自由公民模式无法提供普遍解放/团结的理论，因为（1）现在取代许多非国家组织和超国家组织的日益扩散公民身份提供的福利；（2）越来越多被刑事定罪的移民被剥夺公民身份；（3）民族国家越来越频繁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暂停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宪法权利。此外，领土民族国家必然是排他性的，因为它们受到特定地理、身份和主权法律的限制。相反，我认为，普遍奇点理论（每个人普遍具有的共同点是差异/自身的奇点）只能提供政治亲和力的不正确定义，而没有关于这种奇点如何能够组装的理论进入特定的政治分配。

其次，我认为德勒兹和加塔里（继拉罗什和哈尔顿之后）在他们基于非分割分布和点之间的联合中继的游牧团结理论中为这些模型提供了概念上的替代方案。鉴于第 3 章中定义的革命性政治体的三个特征（局部的和确定的，具有专有名称，其后果是绝对的和无限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预先确定的标准的情况下进行修改），德勒兹和加塔里定义了一个“集体政治体”’团结是两个或多个异质政治条件之间的一个或多个共享的具体行动的逐个无限连接（桥接），从不合并，而是在横向上或多或少地相同。最后，我认为 Zapatista Encuentros（与 JBGs 相结合）为公民身份和基于差异的亲缘关系以及不平等的团结形式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我认为，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的游牧团结概念是基于非分割分配和联邦接力一样，萨帕塔人的全球相互团结实践也是基于包容性的横向主义和协调行动的网络桥梁。虽然第一个为相互支持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通用网络提供了条件（“一个不，很多是”），但第二个将这些多个中继和渠道编织在一起（联合）成为具体的行动决策。Encuentro 的 Zapatista 概念实践旨在创造一个没有国籍的国家，一个没有领土的人民：“一个世界上适合许多世界”。

但是，虽然本章已经能够通过借鉴德勒兹、加塔里和萨帕塔派的工作来概念化作为当前革命序列特征的革命政治团结，但它也面临着全球相互团结运作的两个内部维度之间的最终张力：开放（非决策）横向主义的需要和决策导向行动的协调网络的需要。虽然异质的参与性政治团体有可能管理自己，在全球 Encuentros 分享他们的方法和斗争，甚至通过替代媒体协调全球行动，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如何制定和实施决策的问题并在全球层面进行修改，而无需创建全

球国家、政党或代表形式。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集会——世界社会论坛，如何能够开始并强制实现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有意义的过渡？尽管本章没有回答全球转型和决策的问题（或者在实践中由萨帕塔主义者或世界社会论坛），但这里发展起来的团结理论确实为回答这个问题奠定了丰富的基础。在本书的结语中，我对每一章的相对成就和整本书论证的成功进行了重构和反思，并概述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结论

今天，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回归。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在性质上远非同质化，这一新理论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信念，不仅认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超越资本主义，而且“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制造”，以使以前革命者的错误努力不会重复：夺取国家、党的代表或先锋队的特权知识。在哲学上，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和瓜塔里历史拓扑学、建设性去领土化、政治一致性和游牧团结的概念的这种新转变。在政治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萨帕塔主义者对痛苦的多中心诊断的使用、在他们创建的 Juntas de Buen Gobierno、在他们的服从领导和在全球相互团结的实践中看到这种选择。

但是德勒兹、加塔里和萨帕塔主义者既不是所有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的模型，也不是它们实际如何进行的代表。相反，它们只是当今活跃于革命政治中的四种独特而有影响力的策略出现的两个特别丰富的来源。我在本书中所论证的是，德勒兹、加塔里和萨帕塔派创造了几种概念/实践策略，这些策略既指示又有助于进一步创造一种不再服从于革命进程的新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基于差异和潜力的投机左派的政治代表或纯粹的批评。我遵循了一个条件命令：如果你想挣扎，这里有一些策略可以做到。因此，我提出并捍卫了从德勒兹、加塔里和萨帕塔派的工作中提取和重组的四种策略的使用：(1) 对政治权力的多中心诊断；(2) 政治转型的预兆战略；(3) 建立政治团体的参与策略；(4) 基于相互全球团结的归属政治战略。只要这些策略澄清并进一步发展了萨帕塔主义、德勒兹和瓜塔里作品中非代表性革命过程的实际存在，而不仅仅是可能的存在，本书就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一、方法与解释

这四种策略是通过提取和重组方法创建的。围绕历史、转型、政治体和亲和力等革命主题组织，本书的四个中心章节中的每一章都从德勒兹、加塔里和萨帕塔派中选出了一些概念和实践，并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新的实践-理论策略，以回应手头的问题。在第 1 章中，我根据编码、过度编码和公理化的内在过程以及 Zapatistas 在 La Otra Campaña 期间部署的交叉诊断，采用了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历史拓扑，并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和重组我所说的多中心政治诊断有助于确定历史和革命行动的危险和潜力。在第 2 章中，我展示了如何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去领土化概念以及萨帕塔党的布恩戈比尔诺军政府中组装出一个发生在未来前面的政治转型的象征性战略。在第 3 章中，我展示了如何利用德勒兹和加塔里的一致性概念以及萨帕塔党在军政

府中使用的直接民主实践来构建革命机构的参与战略。最后，在第4章中，我展示了如何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主义概念以及萨帕塔主义者创造的洲际恩库特罗斯（Intercontinental Encuentros）中组装出基于全球相互团结的归属政治战略。这种提取和重组的目的不是展示理论是如何从实践中衍生出来的，或者实践是如何从理论中衍生出来的，而是将两者置于一种战略关系中，以应对革命实践中的问题。一个可能有点笨拙、撞墙或留下一个问题的地方，另一个突破并向前推进。在本书中，我试图将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围绕四个革命战略问题的中继系统。

这些策略的制定也是通过对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的学术文献进行解释性干预来完成的。对于两者，我都做了类似的干预：拒绝将他们的工作解释为仅仅试图调整或强化政治代表性（国家、政党等）的过程，或者仅仅表达另一种后代表性政治的潜力。相反，我将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者视为政治建构主义者；也就是说，我认为它们为创建一个新的集体政治机构做出了具体贡献。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案例中，我在《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并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提取出对革命理论的积极和当代的看法。特别是，我从什么是哲学？在第3章中，他们将哲学（作为一种建构主义）的定义扩展到政治领域。这是在什么是哲学？然而，在主题和概念上，我已经表明，这种扩展并非没有文本支持，并且可以促进革命战略的发展。这种干预的真正动机是，如果没有这种建设性的焦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就会冒着批评者清楚表达的各种危险：政治矛盾、虚拟等级制度、主体性麻痹等等。

我选择以类似的方式阅读萨帕塔主义者，重点关注他们后来（2003年至今）的著作和活动，以突出类似的建构主义转向。2003年，萨帕塔人后退了一步，认真听取墨西哥人民的意见，批评和改进萨帕塔的政治进程（妇女和EZLN‘军事’的地方），并开始一项维持萨帕塔自治领土和它们与世界各地其他左翼组织的关系。这是他们的建构主义转向。除了萨帕塔起义夺取国家或从中获得权利的“失败”或“成功”之外，我还分析了在传统方法失败后发展起来的新革命实践：拒绝先锋队，象征性地创建自治公社、全球互助网络等。正是从这些实践中，我总结了当前回归革命的四种策略。

二、困难和影响

这种提取和重组方法的一个困难是，在不授予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特权或解释力的情况下，阐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概念与扎帕塔斯的实践之间的异质性。与其提取一组概念并展示其对政治哲学史的影响，或提取一组实践并展示其对社会运动史的影响，我选择从德勒兹集合，Guattari和Zapatismo提出了四种策略，以展示他们对当代革命策略中四个问题的启示。我的希望是，这些战略装配将在未来产生更多的继电器。因此，我在每一章中制定的策略更像是针对异质概念和实践的循环参考点或奇怪吸引子，而不是以实践为例的理论表示。每一章都试

图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保持真正的差异，而不是综合两者。正是这种差异让我提出的策略有了进一步的变异。如果读者了解这种继电器式的装配，那完全是有意。

本书的任务是详细回答当前（尽管还很年轻）革命序列所面临的四个问题：（1）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工具来理解当前的权力历史形势，从而使政治变革是可取的？（2）如何改变当前的权力格局？（3）什么样的新的社会主体可以代替旧的社会主体或与旧的社会主体并列？（4）谁可以属于或参与这个变革性的社会团体？我通过借鉴德勒兹、加塔里和萨帕塔派所表明的是，我们可以为这些问题找到一套新颖且一致的答案。我打算从这项努力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拒绝“除了全球资本主义和代表性政治之外别无选择”和“另一个世界只是可能的”的流行观念。我的结论是，另一个世界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旧世界内部和旧世界旁边进行。现在的任务是发展和捍卫它。

这一结论的更大含义是，对理解当前形势感兴趣的当代政治哲学应该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另一种政治可能的概念性结论。此外，它应该为我们提供对实际现有策略的哲学审问：他们面临什么危险，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替代方案，以及他们创造了哪些更大的联系。这些努力的目的，即福柯所谓的“当下的历史”，是批判性地发展已经在此时此地行动的理论 and 实践，并迫使哲学适应当代政治斗争。这本书表明，这样的审问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回答经常向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家和当代革命者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方面也是富有成效的。如果不是资本主义，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值得肯定的不仅仅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必须能够说，“另一个世界实际上正在旧世界的下方和旁边进行”，这里是它的一些维度和特征。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哲学可以实现它的“唯一目标”，“成为值得举办的活动”（1994:151/160）。这一研究议程的未来不仅需要哲学家努力创造概念，动员政治斗争中获得的见解，还需要武装分子自己努力在有用的地方运用政治哲学的见解。

在本书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策略似乎有一个秩序或顺序：首先是对权力的诊断，然后是这种权力的干预和转变，然后是它在一个政治体中的建立，最后是它的全球性或普遍性联系。但这只是本书中呈现的逻辑顺序，而不是这些活动发生的存在共存。在革命运动中，诊断、预兆、参与和团结往往同时发生，程度不同。

此外，由于本书侧重于非代表性的革命战略，读者可能想知道在这样的过程中是否有任何国家政治的空间。这本书是否完全否定了国家政治在革命斗争中的力量和地位？绝对不。虽然我在第1章和第2章中最直接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作为第二种政治转型（德勒兹和瓜塔里称之为“相对积极的去领土化”），但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革命政治是否应该始终并在所有情况下拒绝代表过程（领土、国家和资本）内部的相对的、部分的或改良主义的转变？即使是最小的改革、抗议和愿望也可能在更大的过程中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吗？去领土化不一定是好或坏；然而，革命的问题是，这些危机、偏离的路线甚至改革在何种程度上开始呈现出超越国家的替代性和象征性的一致性。因此，国家本身也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领土、国家和资本主义进程能够并且确实释放了不应被忽视的潜力，但这些潜力也需要具有新的一致性才能成为革命性的。比如，

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目前正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威慑来创造一场革命，同时通过直接民主的邻里议会和工人合作社，自下而上地创造国家碎片的一致性。在阿根廷，失业工人占用了废弃的工厂，并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建立了工人自我管理机制。就其本身而言，这些都不是革命，但它们是重要的解域过程，可能有助于并合并为一场革命。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根本没有一个拥有特权的权力场所，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开始一场革命。因此，所需要的是在不同的战线上同时采取不同的战术。即使包括国家和正在转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本身，这也是事实。

三、未来研究方向

在本书提出的四种策略中，有两种特别有效，需要进一步发展。第一个是创建参与性政治体的策略，在第3章中提出。参与性政治体由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组成：(1) 它出现的条件，并决定谁是其政治体的一部分；(2) 表达和构成其主体的具体元素的分布；(3) 连接和转化这些条件和要素的主体类型。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主义者提议用什么样的社会团体来代表政治进程？他们建议在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持续和相互转变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政治体。

在这一战略中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是这种互惠决定发生的不同维度。例如，政治关系、性别关系、经济关系、生态关系等等，需要根据每个领域进一步阐述。然而，第3章只能针对创建一个专门的政治机构来制定这一战略。因此，对作为政治代表和单纯潜力的替代方案的参与概念的进一步研究将需要对这些领域特有的条件、要素和机构进行分析。例如，根据德勒兹、瓜塔里和萨帕塔派的说法，第三人称形式的政治机构的存在不仅仅是人类的特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生态实体在一个直接民主的革命政体中扮演什么角色。例如，如何将生态实体纳入政治决策？

本书中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战略是全球相互团结。第3章认为，后代议制革命政治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在进行中。第4章认为，革命团体政治可以分享彼此的斗争，并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反资本主义行动。然而，这并不能完全回答在不创建全球国家、政党或代表过程的情况下，如何在异质群体之间的全球层面做出、实施和修改决策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集会——世界社会论坛，如何能够开始并强制实现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有意义的过渡？第4章已经为此类事件的出现提供了哲学和政治工具，但它并不能完全预测下一步。对后代表性和反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进一步研究需要澄清和质疑这个问题，因为它目前正在世界社会论坛和其他地方发生。将这个横向网络转变为联合决策机构的理论和实践是什么？总之，对当代革命回归的进一步研究，不能仅仅从肯定它的潜力开始，而是从具体建构它的革命现实开始。

参考文献

- Agamben, Giorgio (1993),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gamben, Giorgio (1996), 'Unrepresentable Citizenship', 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59–66.
- 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Kevin At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li, Tariq, Claudia Jardim and Jonah Gindin (2004), 'Naeem –Tariq Ali on Anti-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Green Left Weekly*, <<http://www.16beavergroup.org/mtarchive/archives/001208print.html>> (accessed 4 March 2011).
- Alliez, Éric (2004), *The Signature of the World, or, What Is Deleuze and Guattari's Philosophy?*, trans. Eliot Ross Albert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Continuum.
- Alliez, Éric (2006), 'Anti-Oedipus –Thirty Years On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trans. Alberto Toscano, in Martin Fuglsang and Bent Meier Sørensen (eds), *Deleuze and the Soci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151–68.
- Althusser, Louis (1994), *Sur la philosophie*, Paris: Gallimard.
- Arendt, Hannah [1951] (1979),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Badiou, Alain (1985), *Peut-on penser la politique?*, Paris: Seuil.
- Badiou, Alain (2000), *Deleuze: The Clamor of Being*, trans. Louise Burchil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diou, Alain (2004a), 'The Flux and the Party: In the Margins of Anti-Oedipus', *Polygrap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 Politics*, 15/16, pp. 75–92.
- Badiou, Alain (2004b), *Theoret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Continuum.
- Badiou, Alain (2005a), *Metapolitics*, London: Verso
- Badiou, Alain (2005b), *Being and Event*, trans. Oliver Feltham, London: Continuum.

- Badiou, Alain (2008a), “‘We Need a Popular Discipline’ : 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the Crisis of the Negative’ , Interview by Filippo Del Lucchese and Jason Smith, *Critical Inquiry*, 34, pp. 645–59.
- Badiou, Alain (2008b), *The Meaning of Sarkozy*,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 Badiou, Alain (2009a), *Logics of Worlds: Being and Event II*, trans. Alberto Toscano, London: Continuum.
- Badiou, Alain (2009b), ‘Existe-t-il quelque chose comme une politique deleuzienne?’ , *Cités: Philosophie, Politique, Histoire*, 40, pp. 15–20.
- Badiou, Alain (2010a),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trans. David Macey and Steve Corcoran, London: Verso.
- Badiou, Alain (2010b), *La relation énigmatique entre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Meaux: Germina.
- Badiou, Alain, and François Balmès (1976), *De l’ idéologie*, Paris: F. Maspero.
- Balibar, Etienne (2002), *Strangers as Enemies: Further Refl ections on the Aporias of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MCRI Globalization andAutonomy.
- Bell, Jeffrey A., and Claire Colebrook (eds) (2009), *Deleuze and Hist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ensaïd, Daniel (2004), ‘Alain Badiou and the Miracle of the Event’ , in Peter Hallward (ed.), *Think Again: Alain Badiou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London: Continuum, pp. 94–105.
- Beressem, Hanjo (2009), ‘Structural Couplings: Radical Constructivism and a Deleuzian Ecologies’ , in Bernd Herzogenrath (ed.), *Deleuze/Guattari and Ecolog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 57–101.
- Bonta, Mark, and John Protevi (eds) (2004), *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 A Guide and Gloss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oron, Atilio (1995), *State,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Ri- enner.
- Boron, Atilio (2003), ‘Poder, contra-poder y antipoder. Notas sobre un extravío teórico político en el pensamiento crítico contemporáneo’ , *Revista Chiapas*, 15, pp. 143–82.
- Bosteels, Bruno (1998), ‘From Text to Territory: Félix Guattari’ s Cartographies of the Unconscious’ , in Eleanor Kaufman and Jon Heller Kevin (eds), *Deleuze and Guat-*

- tari: *New Mappings in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45–74.
- Bosteels, Bruno (2004), ‘Logics of Antagonism: In the Margins of Alain Badiou’s “The Flux and the Party”’, *Polygrap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 Politics*, 15/16, pp. 93–108.
- Bosteels, Bruno (2005a), ‘Post-Maoism: Badiou and Politics’,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3 (3), pp. 575–634.
- Bosteels, Bruno (2005b), ‘The Speculative Left’,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4 (4), pp. 751–67.
- Boundas, Constantin V. (ed.) (2009), *Gilles Deleuze: The Intensive Reduction*, London: Continuum.
- Buber, Martin (1958), *I and Thou*, trans. Ronald Gregor Smith, New York: Scribner.
- Buchanan, Ian, and Nicholas Thoburn (eds) (2008), *Deleuze and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Burbach, Roger (1994), ‘Roots of the Postmodern Rebellion in Chiapas’, *New Left Review*, 205 (May/June 1994), pp. 113–24.
- Burbach, Roger (1996), ‘For a Zapatista Style Postmodernist Perspective’, *Monthly Review*, 47 (March), pp. 4–41.
- Burchill, Louise (2007), ‘The Topology of Deleuze’s Spatium’, *Philosophy Today*, 51 (5), pp. 154–60.
- Carrigan, Ana (1995), ‘Chiapas: The First Post-Modern Revolution’, *The Fletcher Forum*, 19 (1), pp. 71–98.
- Casarino, Cesare, and Antonio Negri (2004), ‘It’s a Powerful Life: A Conversation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Cultural Critique*, 57, pp. 151–83.
- Chatterton, Paul (2007), ‘The Zapatista Caracoles and Good Governments: The Long Walk to Autonomy’, *State of Nature* (Spring 2007), <<http://www.stateofnature.org/theZapatistaCaracoles.html>> (accessed 4 March 2011).
- Curran, Giorel (2006), *21st Century Dissent: Anarchism, Anti-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Deleuze, Gilles (1972), *Seminar Cours Vincennes 07/03/1972*, <<http://www.web-deleuze.com/php/texte.php?cle=160&groupe=Anti%20Oedipe%20et%20Mille%20Plateaux&langue>> (accessed 3 March 2011).
- Deleuze, Gilles (1989), *Cinema-2: The Time-Ima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rans. H. Tomlinson and R. Galeta from *Cinéma-2: L’Image-temps* (1986),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leuze, Gilles (1990), *The Logic of S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rans. M. Lester with C. Stivale from *Logique du sens* (1969),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leuze, Gilles (1994),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rans. P. Patton from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1968),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Deleuze, Gilles (1995), *Negotiations 1972–199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rans. M. Joughin from *Pourparlers 1972–1990* (1990),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leuze, Gilles (2004),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New York: Semiotext(e), trans. M. Taormina from *L' Île déserte et autres textes: textes et entretiens 1953–1974* (2002),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leuze, Gilles (2006), *Two Regimes of Madness*, New York: Semiotext(e), trans. A. Hodges and M. Taormina from *Deux régimes de fous: textes et entretiens 1975–1995* (2003),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rans. R.
- Hurley, M. Seem and H. Lane from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tome 1: L' Anti-Oedipe* (1972),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rans. B. Massumi from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tome 2: Mille plateaux* (1980),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94), *What Is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rans. G. Burchell and H. Tomlinson from *Qu' 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1991),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1987), *Dialog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rans. H. Tomlinson and B. Habberjam from *Dialogues* (1977), Paris: Flammarion.
- Derrida, Jacques (2001), *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 trans.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Hughes, New York: Routledge.
- Dewey, John (1906), 'Beliefs and Realiti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5 (2), pp. 113–29.

- Egyed, Bela (2006), 'Counter-actualisation and the Method of Intuition', in Constantin V. Boundas (ed.), *Deleuze and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74–84.
- Engler, Mark (2007),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Defined', *The Encyclopedia of Activism and Social Justice*, <www.stwr.org> (accessed 4 March 2011).
- Esteva, Gustavo (2001), 'The Traditions of People of Reason and the Reasons of People of Tradition: A Report on the Second Intercontinental Encuentro', in *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 (ed.), *Auroras of the Zapatistas: Local and Global Struggles of the Fourth World War*, New York:Autonomea, pp. 55–63.
- Evans, Brad (2010), 'Life Resistance: Towards a Different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Deleuze Studies*, 4 (supplement), pp. 142–62.
- EZLN (1994), 'Women's Revolutionary Law', in *¡Zapatistas!: Documents of the New Mex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utonomea.
- EZLN (2005), Sixth Declaration of the Lacandón Jungle, trans. irlandesa, <www.inmotionmagazine.com> (accessed 4 March 2011).
- Foucault, Michel (1977),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onald F. Bouchard,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84),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p. 32–50.
- Foucault, Michel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 ed. Michel Senellart, François Ewald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 Graham Burchell,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Foucault, Michel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79*, ed. Michel Senellart, François Ewald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 Michel Senellar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Fraser, Nancy (1989),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uentes, Federico (2007), 'Subcomandante Marcos: Capitalism's "New War of Conquest"', *Green Left*, 705, <www.greenleft.org.au/node/37314> (accessed 4 March 2011).

- Golden, Tim (1994), 'Rebels Determined "to Build Socialism in Mexico"', New York Times, 4 January 1994 (late ed.), A3.
- Golden, Tim (2001), 'Revolution Rocks: Thoughts of Mexico's First Postmodern Guerrilla Commander', New York Times Review of Books, 8 April 2001, <www.nytimes.com/reviews/010408.08goldent.html> (accessed 3 March 2001).
- Goodchild, Philip (1996), *Deleuze and Guattar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Desire*, London: SAGE.
- Graeber, David (2002), 'New Anarchists', *New Left Review*, 13 (January/ February 2002), pp. 61–73.
- Graeber, David (2011), 'Occupy Wall Street's Anarchist Roots', Aljazeera, 30 November 2011, <www.aljazeera.com/1/2011112872835904508.html> (accessed 7 February 2012).
- Grubic, Andrej, and David Graeber (2004), 'Anarchism, or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f the 21st Century', <makeworlds.net/node/84>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2).
- Guattari, Félix (1984), *Molecular Revolution: Psychiatry and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Guattari, Félix (1996), *Chaosophy: Soft Subversions*, ed. Sylvère Lotringer, New York: Semiotext(e).
- Guattari, Félix (2008), *Molecular Revolution in Brazil*, ed. Suely Rolnik, trans. Karel Clapshow and Brian Holme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Guattari, Félix, and Antonio Negri (1990), *Communists Like Us: New Spaces of Liberty, New Lines of Alliance*, New York: Semiotext(e).
- Hallward, Peter (2003),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llward, Peter (2006), *Out of This World: Deleuz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on*, London: Verso.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10),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11), 'The Fight for "Real Democracy" at the Heart of Occupy Wall Street: The Encampment in Lower Manhattan Speaks to a

- Failure of Representatio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011, <www.foreignaffairs.com/ght-for-real-democracy-at-the-heart-of-occupy-wall-street?page=show> (accessed 4 February 2012).
- Harvey, David (2010), ‘Organizing for the Anti-Capitalist Transition’, talk given a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2010, Porto Alegre, <davidharvey.org> (accessed 4 March 2011).
- Holland, Eugene (1991), ‘Deterritorializ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From Anti-Oedipus to A Thousand Plateaus’, *SubStance*, 20:3 (66), pp. 58–9.
- Holland, Eugene (1998), ‘From Schizophrenia to Social Control’, in Eleanor Kaufman and Jon Heller Kevin (eds), *Deleuze and Guattari: New Mappings in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65–76.
- Holland, Eugene (1999),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Holland, Eugene (2006), ‘Nomad Citizenship and Global Democracy’, in Martin Fuglsang and Bent Meier Sørensen (eds), *Deleuze and the Soci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191–206.
- Holloway, John (2002),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 Pluto Press.
- Holloway, John, and Eloína Peláez (eds) (1998), *Zapatista!: Reinventing Revolution in Mexico*, London: Pluto Pres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8), <www.iom.int/jahia/Jahia/about-migration/facts-and-figures/lang/en> (accessed 5 March 2011).
- Johnston, Adrian (2007), ‘The Quick and the Dead: Alain Badiou and the Split Speeds of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Žižek Studies*, 1 (2), pp. 56–84.
- Katzenberger, Elaine (ed.) (1995), *First World, Ha Ha Ha!: The Zapatista Challenge*,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 Kersten, Axel (1997), ‘Tour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exico and Chiapas after NAFTA’, *Planeta*, <www.planeta.com/planeta/97/0597lacandon2.html> (accessed 5 March 2011).
- Khaldun, Ibn [1377] (1958),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 Franz Rosenth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Khasnabish, Alex (2008), *Zapatismo Beyond Borders: New Imaginations of Political Possibili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Kingsnorth, Paul (2004), *One No, Many Yeses: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Resistance Movement*, London: Free Press.
- Klein, Naomi (2011), 'Occupy Wall Stree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Now' , *The Nation*, 6 October 2011, <www.thenation.com>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2).
- Lacoue-Labarthe, Philippe, and Jean-Luc Nancy (1997),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ed. Simon Sparks, London: Routledge.
- Laffey, Mark (2002), 'Retrieving the Imperial: Empi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Millennium*, 31 (1), p. 109.
- Lampert, Jay (2006), *Deleuze and Guattar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Continuum.
- Land, Nick (1993), 'Making It with Death: Remarks on Thanatos and Desiring-Production' ,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4 (1), pp. 66–76.
- Landa, Manuel de (2006),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New York: Continuum.
- Laroche, Emmanuel (1949), *Histoire de la racine nem- en grec ancien (nem, nemesis, nomos, nomiz)*, Paris: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 Latour, Bruno (1999),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zarus, Sylvain (1996), *Anthropologie du nom*, Paris: Seuil.
- Levinas, Emmanuel (1979),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The Hague: M. Nijhoff Publishers.
- Levinson, Sanford, and Yael Tamir (1995), 'Is Liberal Nationalism an Oxymoron? An Essay for Judith Shklar' , *Ethics*, 105 (3), pp. 626–45.
- Maccani, R. J. (2006), 'The Zapatistas: Enter the Intergalactic' , *Upping the Anti: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3, pp. 105–22.
- McCarthy, Thomas A. (1991), *Ideals and Illusions: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ackenzie, Iain M. (2008), 'What Is a Political Event?' , *Theory & Event*, 11, p. 3.
- McNaughton, Colm (2008), 'A Critique of John Holloway's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 *Capital & Class*, 32 (2), pp. 3–28.

- Marcellus, Oliver de (2001), 'Peoples' Global Action: Dreaming up an Old Ghost' , in 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 (ed.), *Auroras of the Zapatistas: Local and Global Struggles of the Fourth World War*, New York: Autonomedia, pp. 105–17.
- Marcellus, Oliver de (2003), 'Peoples' Global Action: The Grassroots Go Global' , in Notes from Nowhere (ed.), *We Are Everywhere: 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Global Anti-Capitalism*, London: Verso, pp. 96–101.
- Marchart, Oliver (2005), 'Nothing but a Truth: Alain Badiou' s "Philosophy of Politics" and the Left Heideggerians' , *Polygrap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 Politics*, 17, pp. 119–20.
- Marcos, Subcomandante (1994), 'In Our Dreams We Have Seen Another World' , *Zapatista Communiqué*, March 1994.
- Marcos, Subcomandante (1995), 'Durito: Neoliberalism the Chaotic Theory of Economic Chaos' , trans. Peter Haney, <flag.blackened.net/revolt/mexico/ezln/marcos_durito_neolib_jul95.html> (accessed 4 March 2011).
- Marcos, Subcomandante (2001a), 'Entrevista a Sub-Comandante Marcos' , *El Historiador*, <www.elhistoriador.com.ar> (accessed 4 March 2011).
- Marcos, Subcomandante (2001b), *Our Word Is Our Weapon: Selected Writings*, ed. Juana Ponce de Leon,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 Marcos, Subcomandante (2001c), 'Punch Card and Hourglass' , *New Left Review*, 9, pp. 69–80.
- Marcos, Subcomandante (2004a), 'Reading a Video Part Two: Two Flaws' , trans. irlandesa, <flag.blackened.net/marcos/flawsAUG.html> (accessed 4 March 2011).
- Marcos, Subcomandante (2004b), *Ya Basta!: Ten Years of the Zapatista Uprising*, ed. Žižka Vodovnik, Oakland: AK Press.
- Marcos, Subcomandante (2006), *The Other Campaign/La Otra Campaña*,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 Marcos, Subcomandante (2009), quoted in 'The Dream of a Better World Is Back' by Alain Gresh, *Le Monde Diplomatique*, 8 May 2009,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31942>>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2).
- Marcos, Subcomandante, and El Kilombo Intergalactico (2010), *Beyond Resistance: Everything –An Interview with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 Marcos, Subcomandante, and EZLN (2008), 'Communiqué from the Indigenous Revolutionary Clandestine Committee –General Command, of the Zapatista Army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 15 and 16 September 2008.

- Maxwell, Kenneth, and Neil Harvey (1999), 'Review of The Chiapas Rebellion: The Struggle for Land and Democracy' , *Foreign Affairs*, 1 March 1999, <www.foreignaffairs.com/the-chiapas-rebellion-the-struggle-for-land-and-democracy> (accessed 10 February 2012).
- May, Todd (1997), *Reconsidering Difference: Nancy, Derrida, Levinas, and Deleuz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engue, Philippe (2003), *Deleuze et la question de la démocratie*, Paris: L'Harmattan.
- Mengue, Philippe (2009), 'From First Sparks to Local Clashes: Which Politics Today?' , in Constantin V. Boundas (ed.), *Gilles Deleuze: The Intensive Reduction*, London: Continuum, pp. 161–86.
- Mentinis, Mihalis (2006), *Zapatistas: The Chiapas Revolt and What It Means for Radical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 Miller, Christopher L. (1993), 'The Postidentitarian Predicament in the Footnotes of A Thousand Plateaus: Nomadology, Anthropology, and Authority' , *Diacritics*, 23 (3), pp. 6–35.
- Mora, Mariana (1998), 'The EZLN and Indigenous Autonomous Municipalities' , <http://fl.ag.blackened.net/revolt/mexico/comment/auto_munc.html> (accessed 4 March 2011).
- Neill, Monty (2001), 'Encounters in Chiapas' , in 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 (ed.), *Auroras of the Zapatistas: Local and Global Struggles of the Fourth World War*, New York: Autonomedia, pp. 45–53. Notes from Nowhere (ed.) (2003), *We Are Everywhere: 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Global Anti-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Nyers, Peter, and Kim Ryeig (eds) (2012), *Citizenship, Migrant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
- O' Brien, Karen (2000), *Sacrificing the Forest: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ruggle in Chiapas*,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 Occupy Together (2011), <www.occupytogether.org> (accessed 7 February 2012).
- Olesen, Thomas (2005), *International Zapatismo: The Construction of Solidar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Zed Books.
- Patton, Paul (2000), *Deleuze and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Patton, Paul (2006), 'Order, Exteriorities and Flat Multiplicities in the Social' , in Martin Fuglsang and Bent Meier Sørensen (eds), *Deleuze and the Soci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21–38.

- Patton, Paul (2008), 'Becoming-Democratic', in Ian Buchanan and Nicholas Thoburn (eds), *Deleuze and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178–95.
- Patton, Paul (2009), 'Events, Becoming and History', in Jeffrey A. Bell and Claire Colebrook (eds), *Deleuze and Hist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33–53.
- Pellejero, Eduardo (2010), 'Minor Marxism: An Approach to a New Political Praxis', *Deleuze Studies*, 3 (supplement), pp. 102–18.
- Pleyers, Geoffrey, and Alain Touraine (2010), *Alter-Globalization: Becoming Actors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 Prigogine, Ilya, and Isabelle Stengers (1997), *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Protevi, John (2006), Review of *Out of This World: Deleuz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on* by Peter Hallward,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 <ndpr.nd.edu> (accessed 7 February 2012).
- Proyekt, Louis (2003), 'Fetishizing the Zapatistas: A Critique of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Herramienta: debate y crítica marxista*, <www.herramienta.com.ar/izing-zapatistas-critique-change-world-without-taking-power>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2).
- Ramírez, Gloria Muñoz (2008), *The Fire and the Word: A History of the Zapatista Movement*, trans. Laura Carlsen and Alejandro Reyes Aria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 Rancière, Jacques (2004),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s of Ma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3 (2/3), pp. 297–310.
- Read, Jason (2008), 'The Age of Cynicism: Deleuze and Guattari on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Capitalism', in Ian Buchanan and Nicholas Thoburn (eds), *Deleuze and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139–59.
- Read, Jason (2009), 'The Fetish Is Always Actual, Revolution Is Always Virtual: From Noology to Noopolitics', *Deleuze Studies*, 3 (supplement), pp. 78–101.
- Rodríguez, Alfredo Valadez (2011), 'The Indignados Offer Hope for Humanity: González Casanova', *La Jornada*, 17 October 2011, <<http://www.jornada.unam.mx/2011/10/17/politica/014n1pol>>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2).
- Ronfeldt, David F., John Arquilla, Graham Fuller and Melissa Fuller (1998), *The Zapatista 'Social Netwar' in Mexico*, Santa Monica: Rand. Ross, John (1995), *Rebellion from the Roots: Indian Uprising in Chiapas*, Monroe: Common Courage Press.

- Ross, John (2006), *¡Zapatistas!: Making Another World Possible: Chronicles of Resistance, 2000–2006*, New York: Nation Books.
- Sauvagnargues, Anne (2010), *Deleuze: L'empirisme transcendant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Sellars, John (2007), 'Deleuze and Cosmopolitanism', *Radical Philosophy*, 142 (March/April 2007), pp. 30–7.
- Sibertin-Blanc, Guillaume (2009), 'Politicising Deleuzian Thought, or, Minority's Position within Marxism', *Deleuze Studies*, 3 (supplement), pp. 119–37.
- Smith, Dan (1998), 'The Place of Ethics in Deleuze's Philosophy: Three Questions of Immanence', in Eleanor Kaufman and Jon Heller Kevin (eds), *Deleuze and Guattari: New Mappings in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251–69.
- Smith, Dan (2008), 'Deleuze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 in Simon O'Sullivan and Stephen Zepke (eds), *Deleuze, Guattari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 London: Continuum, pp. 151–61.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2010),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Spivak and Rosalind C. Morris,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rnicek, Nick (2008), 'What Is to Be Done? Alain Badiou and the Pre-Evental', *Symposium: Canadian Journal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12 (2), pp. 110–26.
- Starr, A., M. E. Martinez-Torres and P. Rosset (2011),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Action: Practices of the Zapatistas and the Movimento Sem Terr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8 (1), pp. 102–19.
- Stivale, Charles J. (1998), *The Two-Fold Thought of Deleuze and Guattari: Intersections and Anim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tivale, Charles J. (trans.) (2004), '“D” is for Desire', in *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 avec Claire Parnet*, directed by Pierre-André Boutang in 1996, <www.langlab.wayne.edu> (accessed 4 March 2011).
- Thoburn, Nick (2009), 'Weatherman, the Militant Diagram,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Passion', *New Formations*, 68, pp. 125–42.
- Thompson, A. K. (2010), *Black Bloc, White Riot: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Genealogy of Dissent*, Edinburgh: AK Press.
- Tormey, Simon (2006), '"Not in My Name": Deleuze, Zapatismo and the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 *Parliamentary Affairs*, 59 (1), pp. 138–54.

- Toscano, Alberto (2004), 'From the State to the World? Badiou and Anti-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 Cognition*, 37 (3 & 4), pp. 199–224.
- Toscano, Alberto (2006), *The Theatre of Production: Philosophy and Individuation between Kant and Deleuz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8), 'United Nations' Trends in Total Migrant Stock', <esa.un.org> (accessed 4 March 2011).
- Virilio, Paul (1993), *L' 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 Paris: Galilée.
- Virno, Paolo (2003),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Cambridge: Semiotext(e).
- Walker, Simon (2005), 'Oventic Boot Cooperative Exports Boots to Canada', Casa Collectiva, <www.casacollective.org oventic-boot-cooperative-exports-boots-canada> (accessed 4 March 2011).
- Waterman, Peter (1998), *Globaliz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s*, Washington: Mansell.
- World Social Forum (2001), *Charter of Principles*, <www.wsfindia.org> (accessed 4 March 2011).
- Yakubu, Owusu (2000), 'A Commune in Chiapas? Mexico and the Zapatista Rebellion, 1994–2000', *Aufheben*, 9, <libcom.org/ library/commune-chiapas-zapatista-mexico> (accessed 8 February 2012).
- The Zapatistas (1998), *Zapatista Encuentro: Documents from the 1996 Encounter for Humanity and against Neoliberalism*, New York: SevenStories Press.
- Zižek, Slavoj (1997), 'Multicultur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225, pp. 28–51.
- Zižek, Slavoj (2004), *Organs Without Bodies: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 Zižek, Slavoj (2011), 'Slavoj Zižek speaks at Occupy Wall Street: Transcript', transcribed by Sarahana, *Impose*, <www.imposemagazine.com>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1).
- Zižek, Slavoj, and Costas Douzinas (eds) (2010),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Verso.
- Zourabichvili, François (1996), *Deleuze, une philosophie de l' événemen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Thomas Nail

回到革命

德勒兹，瓜塔里与萨帕塔主义

2012

zh.book4you.org

机器翻译加校对：局外人

zh.anarchistlibraries.net